

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

月刊 · 一九八四年九月號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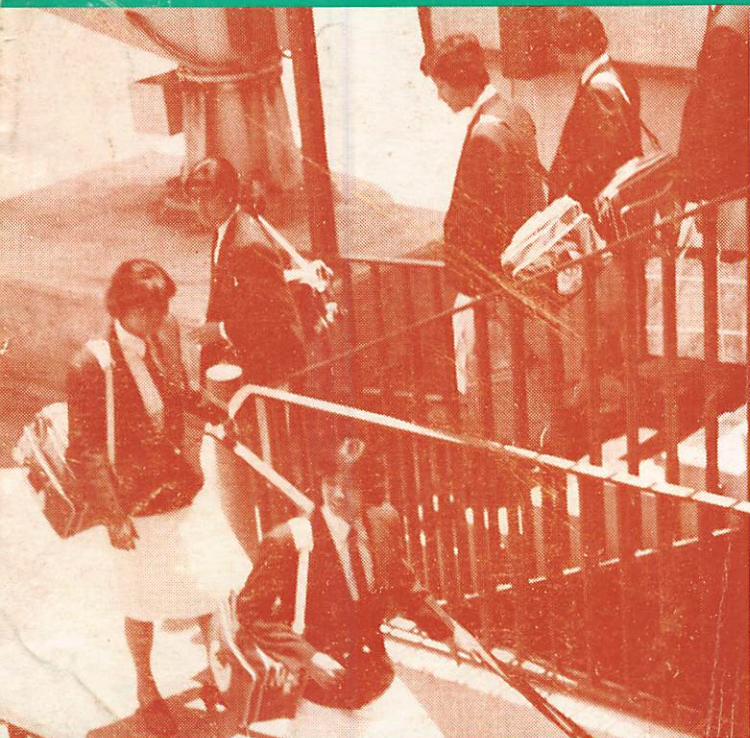
- 本期專題：
 - ① 肯定鄧小平 · 批評鄧小平 · 超越鄧小平
 - ② 中國如何統一

- 自本期起 **開闢鄧小平權利交接專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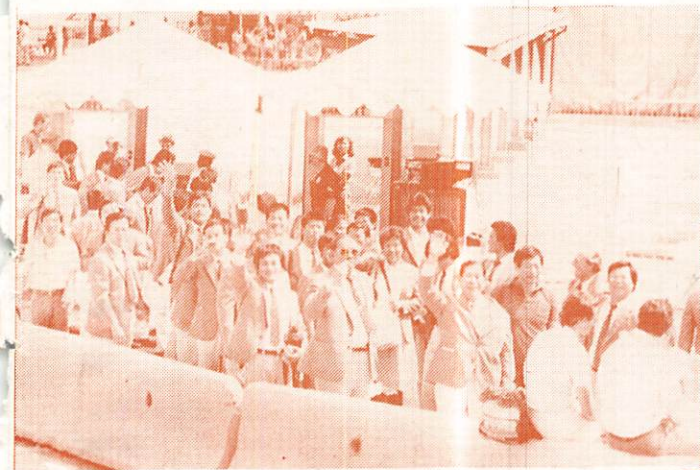
追蹤報導鄧小平權力轉移問題

快訊：· 胡耀邦接班受挑戰 · 華國鋒欲東山再起

- 論中國的白色革命 ● 評新洋務運動



歡迎台灣海峽兩岸奧運代表隊



中國台北奧運代表隊的成員到達洛杉磯機場，向歡迎的人們招手致意。



參加奧運會的中國女排，英姿勃勃走出機場大樓。



中國大陸運動員參加洛杉磯僑界為他們舉行的歡迎餐會。

中國台北奧運代表團技術督導紀政和她的女兒。



歡迎中國大使館訂閱《中國之春》

本刊評論員 瓊 旺

本刊最近接到中國大使館的訂閱單和支票，這本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然而回顧中共以往的態度，却又令人不勝感慨。

「中國之春」是中國大陸留學生在北美創辦的，以宣傳「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為宗旨的一份雜誌。中共在毛澤東長期的獨裁專制之下，對「民主」二字諱莫如深。中國老百姓不敢提「民主」，有如末莊人不敢在阿Q面前說「疤」。君不見，魏京生貼了幾張要求民主化的大字報，就立即以現行反革命罪判以十五年重刑。「中國之春」問世以來，中共也如國民黨對共產黨的「三不」政策一樣，不訂閱、不接觸、不許進口。去年七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給美聯社駐北京分社一項通告說：「根據郵遞條例，我們已充公了兩本由美國寄給你們的『中國之春』雜誌，因為這份刊物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道德上和衛生上，都會對中國有害的。」，中共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時間會告訴人們，駝鳥行徑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民主運動也不因時間的推移，而自行消失。現在，中共當局不得不面對現實，開始要訂閱「中國之春」了。這至少是一個進步，我們對此表示歡迎。

同時，我們還要借這個機會告訴中共當局，你們不是要對台灣搞統戰嗎？你們不是公開說要跟國民黨第三次合作嗎？人們會問，你們對自己派出的留學生，只是叫了幾聲民主，就不能容忍，難道你們真的還有誠意跟自稱為「反共堡壘」的台灣國民黨當局合作嗎？所以你們對待「中國之春」的態度，確實是很不高明的。

既然現在有了良好的開端，我們希望大使館尊重憲法，尊重人權，保障言論自由，不要干涉留學生自由訂閱「中國之春」。在此我們

《中國之春》訂閱單

姓名：英文 TIAN, ZHIFANG 中文 田志芳
NAME
地址：2300 Connecticut Avenue N.W.
ADDRESS Washington, D.C. 20008

零售：每本 \$2.0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12.00
學生訂戶：\$9.00
贊助訂戶：\$30.00 以上
學校機構：\$30.00
海外訂戶另加郵資
航空：\$12.00
平郵：\$4.80

附支票以訂之期

支票請寄： CHINA SPRING

(美國)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還要呼籲廣大的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及其他外事工作人員，積極地投入當前的民主運動中來。請大家不要忘記，在我們的身上，寄托着十億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的責任，不僅是學習西方的先進科技，我們最終的目的，乃是改變整個落後的中國社會。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DC 20008		1121 15 55 540
PAY TO THE ORDER OF <u>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u>		<u>June 15, 1984</u>
<u>TWELVE AND 00/100</u>		\$ <u>12.00</u>
AMERICAN SECURITY BANK, N.A. 15TH STREET AND PENNSYLVANIA AVENUE, N.W. WASHINGTON, D.C.		DOLLARS
FOR _____		<u>李馬</u>
⑈001121⑈ ⑆054000551⑆53⑈861 63 110⑈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New York,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機關刊物 N. Y. 10185. Tel: (212) 429-6777

一九八四年九月號目錄

● 短評	● 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	● 報導	● 本期專題 肯定鄧小平 批評鄧小平 超越鄧小平	● 本期專題 中國如何統一	● 聲援民運	● 人物專訪	● 思想論壇
歡迎中國大使館訂閱「中國之春」……………本刊評論員 3	快訊：胡耀邦能順利接班嗎？……………（北京）龔千山 6 快訊：華國鋒欲東山再起……………（北京）柳平 11	中國之春歡迎您……………本刊記者（中國留學生）徐孟流 15	肯定鄧小平、批評鄧小平、超越鄧小平……………（中國留學生）王警蟄 18 百問鄧小平……………（中國大陸旅港學者）孟歌 22 白色革命……………國內來稿 28 新舊「洋務運動」的前因後果……………（大陸新移民）白芒 33 跛腳的社會在蹣跚……………國內來稿 36 評鄧小平體制的幾個問題……………（旅美作家）李望如 40	論和平民主統一中國……………（中國留學生）吳儉祥 44 中國統一之構想……………（中國訪問學者）雪城 50 也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香港）柏仁 53 國共和談與民主運動……………桑梓 54 中國和平統一的基本問題……………（西德）魯鳴 55 紫陽君，怎麼商量……………（香港）陸明 57	回憶學生運動中坐牢的日子……………（國內）耿晨 58	訪女作家叢甦談世界筆會與中國現代文學……………（中國留學生）李昂整理 61	中國迅速發展經濟最有效的形式是什麼……………（加拿大）兆立 66

本期第一個專題「評鄧小平的改革」，組織了來自國內外的數篇力作，對鄧小平近年的改革給予了客觀的評價。我們的基本態度是「肯定鄧小平、批評鄧小平、超越鄧小平」。鑒於本期雜誌出版發行之際，正值洛杉磯奧運會期間，我們特別發表了中國民聯特別工作組，在洛杉磯歡迎台灣海峽兩岸運動員的活動紀要。我們還特別編輯了「中國如何統一」專欄，希望讓各界人士能更清楚地了解我們對「統一」問題的基本觀點。

為引起人們對鄧小平權力交接班的關注，自本期起，我們開闢專欄，以國內快訊為主，報導和分析此專題。

本期還有人物專訪，續「回憶學生運動中坐牢的日子」及小說「在厄運中相遇」等，既有知識性，也有文學性，都是可讀性較高的作品。

● 台灣專欄

「毛澤東書信選」與胡喬木……………(香港) 遲耕 68

中國人的形象是誰改變的……………(美國) 王亦令 70

對大陸經濟的淺見……………(澳門) 丘岳 71

● 僑社專欄

台灣當前的政治問題僅在於自由民主不足嗎……………(美國) 政光 73

旅美雜感……………(美國) 王魯生 76

楊蘇死因判明……………(日本) 劉理新 79

● 讀者來信

一個台灣人對中國統一的意見……………(美國) 喬志揚 80

對「科學民主主義」一文的一點不同意見(中國大陸留法學者) 朱明 72

「貴妃醉酒」不是國歌……………(美國) 克珍 78

● 譯文專欄

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自我批評和重新評價(中國大陸訪問學者) 余力 81

在厄運中相遇……………(中國大陸旅港學者) 孟歌 84

● 文藝園地

牆(詩)……………(香港) 華旒 88

烟(詩)……………(國內民刊摘選) 無名草 87

我是一朵野花(詩)……………(國內民刊摘選) 無名草 87

動物園隨筆——老虎……………(國內民刊摘選) 無名草 87

有表情的機器人……………(香港) 白逸鴻 78

秋……………(美國) 一旦 89

封面：中國大陸及台灣運動員分別到達洛杉磯
封二：歡迎台灣海峽兩岸的奧運健兒

胡耀邦能順利接班嗎？

龔千山



開關「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的說明

中國實際的黨政軍領袖鄧小平年事已高，他一旦撒手塵寰，遺留的權力真空將由誰填補？鄧小平能否在有生之年完成權力交接？中國各派政治勢力移向權力中心的動向如何？鄧小平辭世之後，中國是否會出現毛澤東逝世後的戲劇局面？有沒有軍方混戰的可能？這些是北京權力中心關心的問題，也是全國人民關心的問題，甚至是全世界注目的問題。

為研討這些問題，本刊決定自十五期起開關「鄧小平權力交接」專欄，國內快訊以報導、分析此專題為主。中國民聯的國內小組，已在這方面調查到不少資料，並將繼續進行調查工作。根據這些資料，本刊將推出一系列文章分析、報導鄧小平權力交接問題，直至鄧小平辭世之後，敬請讀者留意，跟上國內形勢發展。

為辦好此專欄，本刊也公開征求稿件和資料，凡有關鄧小平權力交接問題的信息，分析、評論、預測、座談記要，訪問記等，均表歡迎。另外，民主運動在鄧小平權力交接前後應採取何種策略，如何應對形勢發展，本刊也歡迎民運人士就此問題展開討論踴躍投稿。

最近，北京中央機關幾個大院裏，空氣變得漸漸緊張起來，人們的議論也多了。議論的焦點是鄧小平的權力交接問題。從最近鄧小平幾次露面看，他的性情有所改變，常有不耐煩的情緒流露。有消息講，近些日子，鄧小平在聽取下面匯報時，常發脾氣，愛訓人。這種現象，在以前較少見到。不少知情者說，鄧小平的確老了，別看他見外賓時還強打精神，但一見完，就疲憊不堪。最近，鄧小平的確較為煩惱，毛澤東留下的這個爛攤子，太難收拾。但是，他煩惱的真正原因，是他自知餘日不多，權力交接問題還沒有安排妥當。他的主觀願望是把權力平穩地移到胡耀邦手中，讓趙紫陽一心一意輔佐胡耀邦。但是，胡耀邦能夠順利接班嗎？鄧小平關心的就是這個問題，人們關心的也是這個問題。

圍繞這個問題，我們準備推出一系列文章，從黨、政、軍各個方面加以報導、分析。前些日子，我們提供了胡耀邦與趙紫陽在外交方面競賽、爭奪的資料。這次，則報告胡耀邦的權力基礎並簡單研討其穩固性，同時報告一些有關引人注意的新發展。

胡耀邦派子出遊

胡耀邦最近異常忙碌，他主要忙在人事問題上。為了鞏固他的實力，他親自四處訪友，

八方串聯，指派一些信得過的人，包括他的子女外出活動。據一位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有密切關係的人士透露，胡耀邦目前主要是拉軍隊關係。為了拉軍隊關係，胡耀邦使出了他的全套本領，動用了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六月份，胡耀邦的子女中，大兒子劉湖，二兒子胡德平，三兒子胡德華均離開北京外出串聯，僅留下女兒李衡在家，幫助胡耀邦跑跑連絡。

胡耀邦派三個兒子外出幹什麼？他們所在的機關外貿部、歷史博物館講，是公差外出去了，但是何等公差，就無從知道了。據我們了解，胡耀邦三個兒子這次分頭赴華東、華南地區，主要是奉胡耀邦之命，去聯絡各地軍方，爭取軍方的支持。

人們或許要問，胡耀邦已有了一幫子人，形成了團中央領導黨中央的局面，實力已經不小，為什麼這麼着急去拉軍方？回答這一問題，不得不分析胡耀邦的基本班底。

胡耀邦的幫派班底

誰都知道，胡耀邦的班底是原團中央的幹部。他執掌大權之後，大力提拔原共青團派系的幹部，形成了獨特的一派。目前，共青團派已在黨中央、政府、地方黨組織中擁有相當的實力。

所謂共青團派，應包括共青團及共青團附屬的組織。共青團領導的組織有全國青年聯合會（青聯）和全國學生聯合會（學聯）。在共青團、學聯和青聯工作過的人，均與胡耀邦有着組織關係。另外，六十年代的亞非團結委員會，與團中央也有密切關係。胡耀邦當前重用的人，都是與這些組織有過淵源的。

共青團派系的勢力，近年在胡耀邦的大力扶植下，膨脹極快。除團中央幹部外，原來各省市的共青團領導幹部，也紛紛走上黨的領導崗位，個別省份形成「省團委」領導「省黨委」的局面。現就我們調查到的共青團派勢力滲透如下，重點在於原團中央班底的升遷，對於地方省市原共青團勢力的膨脹，資料尚不完整，暫不包括。

一、中樞機構

首領：

胡耀邦：現年六十七歲，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中央常委。胡耀邦很早參加革命。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等職，對組織工作富有經驗。一九五二年至一九六六年，胡耀邦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主持共青團工作達十三年之久，培養了一大批幹部。

中央書記處：

胡啟立：五十五歲，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委員，中央整黨辦公室副主任，是胡耀邦的得力的左右臂。五十年代初，胡啟立曾任北大學生會主席，青聯副主席。後升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和書記。

喬石：六十歲，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六十年代初曾任中共杭州市委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後調至北京，在與團中央有密切關係的「亞非團結委員會」任候補書記。與胡耀邦有多年的上下級關係。

郝建秀：四十九歲，六十年代任共青團中央委員。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委員。郝建秀五十年代時，僅是山東青島一家紡織廠的普通工人，因成績優秀樹為勞動模範和青年學習的樣版。後來，胡耀邦看中郝建秀的憨厚，將她節節提升。

中共中央直屬機關

中央組織部：

喬石：中央組織部長（已介紹於前）。
王照華：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現年六十五歲。五十年代曾出任全國青聯副主席、主席，後調任團中央書記。

中央辦公廳：

王兆國：四十五歲，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委員。王兆國為六十年代大學畢業生，直升飛機式幹部（詳見中國之春十四期——編者）。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

錢李仁：五十四歲，現任中聯部部長。六十年代曾任「亞非團結委員會」副主席和全國青聯副主席。他的外交經驗，系從亞非團結委員會工作時獲得，該組織受團中央部分領導。錢李仁跟胡耀邦甚緊。

李淑鏞：五十四歲，現任中聯部副部長。六十年代曾任全國青聯國際聯絡部部長，後升任團中央候補書記。

朱良：五十三歲，現任中聯部副部長。六十年代的青聯委員兼秘書長。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

宋振庭：六十四歲，現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教育長。曾任吉林省委書記，執掌文教及青年工作，雖不算正牌共青團出身，但深獲胡耀邦信任，親調至黨校控制實權。

國務院各部委：

外交部：

吳學謙：六十三歲，現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中共中央委員。六十年代任亞非團結委員會副主席，團中央常委。對胡耀邦忠貞不二。

國家體委：

李夢華：六十一歲，現任體委主任，中共中央委員。曾任全國青聯副主席。

徐寅生：四十三歲，現任體委副主任。我國乒乓球老運動員，曾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六屆世界乒乓球比賽時立下戰功，成為英雄。六十年代初，他的一篇談話《談談如何打乒乓球》被毛澤東賞識，被譽為「活學活用辯證法的樣版」。後被選為團中央委員、全國青聯副主席。

路金棟：六十歲，現任體委副主任。曾跟隨胡耀邦出任團中央候補書記和書記。

衛生部：

王偉：六十二歲，現任衛生部副部長。胡耀邦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時，他任青聯主席兼團中央書記。

地方黨政系統：

河北省：張曙光：六十三，河北省委書記，河北省長，中共中央委員。曾在胡耀邦領導下任共青團中央常委。

高占祥：五十三歲，河北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曾出任共青團中央常委兼農村青年工作部部長。

天津市：

李瑞環：四十九歲，現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兼天津市市長。李瑞環文革前為北京第三建築公司工人，因技術革新聞名全國，被譽為「青年魯班」。當上勞動模範後，被選為團中央委員而步入政壇。隨後，胡耀邦大力提携他當上了團中央常委、團中央書記，隨之，李瑞環

放棄了原先專業，當上了職業黨團領導幹部。

山東省：

梁步庭：六十四歲左右，現任山東省委書記兼山東省省長。梁步庭曾在團中央工作多年，為胡耀邦的得力助手。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他任團中央書記達七年之久。一九八〇年，胡耀邦當上書記處第一書記後，曾立即調任梁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

山西省：

李立功：五十九歲，現任中共山西省委書記執山西省大權。李立功有長期共青團工作經驗，歷任山西省團委書記，北京市團委第一書記等職，深得胡耀邦賞識。

福建省：

項南：六十五歲，現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五十年代，項南在團中央工作，與胡耀邦私交甚厚，曾任團中央書記兼宣傳部長。現在幫助胡耀邦看守東南大門。

陝西省：

章澤：六十四歲左右，現任陝西省委書記，控制秦漢。章澤長期跟隨胡耀邦任團中央書記。

安徽省：

楊海波：六十歲上下，現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候補中央委員。六十年代任亞非團結委員會副主席，團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團中央書記等職。

貴州省：

王朝文：五十八歲左右，現任貴州省委書記兼貴州省省長。王朝文曾任團中央委員、常委。

西藏自治區：

多吉才讓：四十九歲，現任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兼西藏自治區政府前主席。曾在共青團西藏自治區委員會工作，並被選為共青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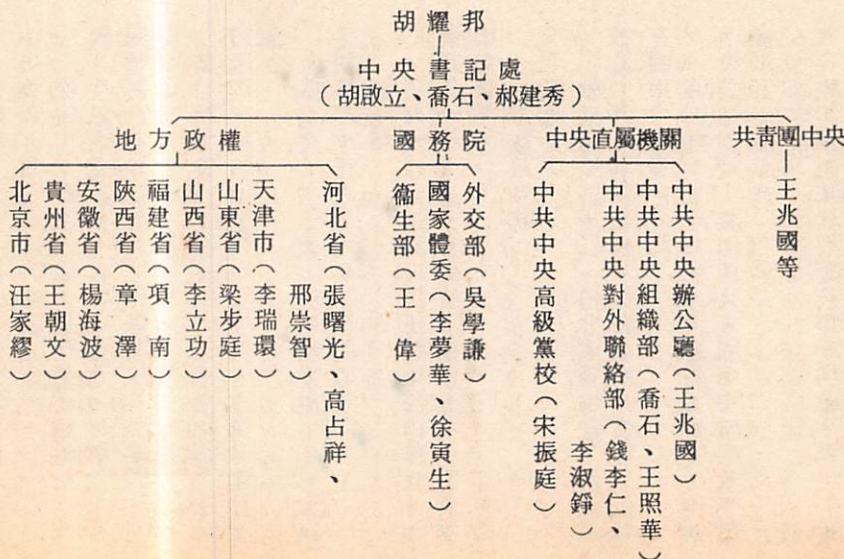
中央委員。

北京市：

汪家繆：五十歲，女，現任北京市委常委，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文化大革命前曾任北京市委副書記。

當然，原共青團中央的幹部，並不只上述的這些。上述者均為胡耀邦信得過的人。還有一些胡耀邦信不過的人，他們大多沒有受到特別的提拔。例如胡克實，文革前任團中央書記，是團中央的第二把手。現任中國科學院黨委書記，是個無權的閒職，級別較文革前沒有提升。為什麼他升不上去，就是因為胡耀邦信不過他，「二胡」有深刻的矛盾。據有關人士指出，文革初期，胡耀邦、胡克實雙雙被整，關在北京市西口團中央宿舍。胡耀邦和胡克實是前後院鄰居，以前處得還不錯。可是，在兩個人同時被軟禁、隔離審查時間，胡克實曾向四人幫打小報告，匯報胡耀邦的「不法」活動和頑固態度，以求立功贖罪。結果，胡克實換取了較多的「自由」。胡耀邦對此事耿耿於懷，胡克實也自知有愧，不敢高求。當然，胡克實僅是一個例子而已，凡是和胡耀邦有過較大矛盾的原團中央幹部，近年均未有顯著升遷。

從上面分析，可總結出胡耀邦共青團派系的權力結構圖：



胡耀邦的權力結構特點

胡耀邦派系的權力膨脹及權力結構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把住黨中央的要害部門，如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組部，胡耀邦抓住不放。胡耀邦當上總書記後，立即任命胡啟立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後胡啟立專職抓書記處和整黨辦公室，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由喬石接替。在喬石接手組織部後，辦公廳又易手於王兆國。三任辦公廳主任的人都是胡耀邦的，看來，辦公廳的權力，胡耀邦是抓定了。

第二，把住關鍵省份。河北省古稱直隸，環繞京城，位置十分重要。林彪時代，河北省由林彪、陳伯達的親信李雪峰執掌；華國鋒時代，河北由華的親信劉子厚控制。現在，胡耀邦則放了三個共青團派大將於京城周圍，占據河北。之所以下這麼大力量，按胡耀邦講，是因為河北歷來是林彪、四人幫和凡是派的基地，問題太多，非一人可解決。置李瑞環於天津，以便與河北連成一片，不給北京造成裸面。此外，令項南鎮守東南大門，目的是搞好對台統戰及發展福建金三角計劃（參見中國之春第十四期——編者）。

第三，國務院控制力尚薄弱。胡耀邦對「黨」的控制力很大，對「政」（國務院）的控制力極小，僅吳學謙一人任正部長。就吳學謙來說，由於其外交能力和水平有限，外交部裏多有不服。國務院有二十多個部、委、局，為什麼胡耀邦的勢力打不進去呢？阻力來自哪裏？就這個問題，我們展開了一系列調查，初步的結論是，趙紫陽、彭真等守住了國務院的地盤，處處設防共青團勢力，尤其是趙紫陽，他用巧妙的辦法扼止了胡耀邦勢力過多地進入國

務院。關於此問題，我們將在以後的文章中分析。

第四，胡耀邦共青團派系對軍隊無控制力。從胡耀邦的權力結構圖一眼即可看出，胡耀邦對軍隊根本沒有控制力。胡耀邦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曾長期在軍隊裏作政治工作，按說應有一定的基礎。可是，胡耀邦做的，多為機關工作，他並不像親自帶兵打仗的將領那樣，手底下有團長、營長、連長等一大串親自提拔的幹部。另外，胡耀邦解放後一直脫離軍隊作共青團工作，因此，胡耀邦原有薄弱的軍隊基礎也就丟盡了。鄧小平把胡耀邦扶上總書記的位置後，一直試圖幫助胡耀邦建立軍隊基礎，但截止目前，收效甚微。

胡耀邦能順利接班嗎？

衆所周知，鄧小平生前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安排胡耀邦接班。可是，胡耀邦能夠順利接班嗎？根據目前我們所做的調查，北京機關大院裏的輿論，多持懷疑態度。其原因，可歸納為如下幾項：

一、胡耀邦拉幫結派，致使共青團派勢力快速膨脹，遭到非共青團派系的普遍嫉恨。在有權就有一切的社會裏，有權力慾的人把權看得比命還重要。共青團派搶了權，別的派就受到冷落，感到沒有安全感。一位在中共中央聯絡部工作過多年的老司局長幹部就公開說：「錢李仁算老幾，他不就是借胡耀邦的光才當上部長。論資格，我們這幾個老局長哪個不比他高？論經驗，我比他多幾倍。論才幹，幾個局長都不比他差。」外交部裏的議論更是不斷，禮賓司的一個幹部曾對他兒子講：「外交部裏的人才濟濟，怎麼偏叫吳學謙當部長。你看他那窩囊像，拿出去也不怕外國人笑話。外交部

裏的人都說，建國來的幾個外交部長，包括周恩來、陳毅、姬鵬飛、喬冠華、黃華、吳學謙，就數吳學謙最窩囊。當過我們禮賓司司長的韓敘，現在只是個副部長，他的資歷和能力都超過吳學謙，為什麼他不能當部長，還不就是不是共青團綫上的人？」這位幹部所流露的情緒，在中央機關裏很普遍。據一位國務委員的家屬透露，中央機關之所以出現這些非議，是上面有人慫恿。陳雲、彭真對胡耀邦的拉幫結派，都有微詞。

二、文革既得利益派已在利用胡耀邦的拉幫結派進行輿論反擊。鄧小平、胡耀邦是堅決而全面的否定文革的人。在全面否定文革的思想指導下，文革既得利益者紛紛下野，他們被扣上大大小小的四人幫派分子的帽子。一位失勢的吳德的老下級（原北京市的局級幹部）到處散佈說：「現在每天叫嚷清除三種人，其中有一條就是清除幫派思想嚴重的人，這一條使我們都倒了霉。其實，我看胡耀邦的幫派思想比誰都嚴重，他最信任共青團幫派，一人得勢，雞犬皆升。為什麼只允許他們拉幫，不允許我們結派？」現在，北京各機關有一個相當「解放」的現象，那就是，大家都可以公開口頭批評胡耀邦，雖然他名義上是黨第一號領導人。就是誹謗兩句，也沒人大驚小怪地跑到領導那裏去告狀。這反映出，人們對胡耀邦並不尊重。過去，毛澤東當主席時，要是有人當眾說他一個「不」字，簡直有被當場打倒、撕碎的可能。一位原中央某機部的副部長說：「胡耀邦提拔共青團派的人，搞得太明顯。這實際上種上了惡果。你批評別人有幫派思想，別人會用同樣的理由打倒你嘛！」

三、胡耀邦難以獲得軍方支持。剛才已經分析，胡耀邦在軍中並沒有多大勢力。儘管鄧小平在說動軍方支持胡耀邦方面，做了大量工

胡耀邦今年春節前夕檢閱廣西邊防部隊



幾點評論

對於胡耀邦是否能順利接班的問題，國內最近議論頗多，我們也十分憂慮。我們將盡量收集資料，及時加以綜合、分析，供民主運動制訂戰略戰術提供參考。在討論鄧小平權力交接問題時，我們小組有以下幾點認識，談出來，供大家研討：

作，但就目前情況看來，鄧小平在辭世之前難以達成既定目標。裝甲兵大院裏某位失勢的副部長級幹部曾講：「別看胡耀邦拉了一批人，到處進行安插，那些白面書生沒什麼用，到時還是必須聽軍隊的，如果不聽，只要一個連的人馬，就可以全部送他們回家休息。張春橋、姚文元的筆杆子比他們不知硬多少，到頭來還是鬥不過槍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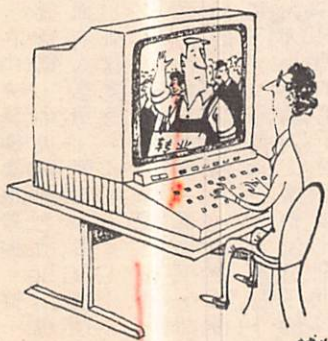
我們小組在北京的一些幹部子弟中，進行了有限的口頭民意調查。結果顯示，約百分之七十的人認為鄧小平百年之後，胡耀邦會喪失權力。難怪胡耀邦派他三個兒子四處串聯，加緊活動。

一、關於「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一套。中國共產黨在任用幹部問題上，仍然沿襲舊官僚專制「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一套。這本身並沒有多大非議，外國民主政體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法國密特朗總統一上台，新上任的多是他社會黨的人選。美國更突出，換一屆總統，內閣全部換馬，總統一定要任用自己的親信。專制制度與民主政體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問題上有兩點不同。其一，「天子」（或稱第一把手）上台方式問題。在封建專制的社會裏，「天子」上台一般有三種，一種是血統世襲，如毛澤東想傳位於孫子毛遠新，金日成想傳位於兒子金正日等；一種是陰謀奪權，如勃列日涅夫打倒赫魯曉夫，華國鋒逮捕四人幫等；第三種是內部交易，推出過渡性妥協人物。專制社會從來不敢用民意選舉來確定領導人。在民主政體中，中央和地方的第一把手（甚至第二把手等），是用選舉產生的。其二，在集權專制國家，由於以「人治」為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結果，往往造成「一朝天子一朝法」。基本國策常有大幅度搖擺，甚至要修改憲法，容易導致社會的動蕩。所以，中國民聯提出廢除人治，提倡法治是十分必要的。

二、關於軍隊在國家政權中的地位。按照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說法，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這種學說給軍隊

介入和控制國家政權提供了理論依據。實踐表明，軍隊介入國家政權，常是造成政局動蕩的一大因素。在民主國家，軍隊的職責只是保衛國家，不能干預政治。中國民聯雖已提出軍政分家的主張，但在理論上的批駁「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份」這一觀點的危言，做得還不夠，值得今後加強。

鄧小平不久就要辭世，各派勢力的權力大爭奪已拉開帷幕，中國政治舞台的演變，將會再次使世界大吃一驚，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越按越多

方成画

華國鋒欲東山再起

柳平



圖為華國鋒大權在握時，宴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春風得意的姿態。

一九七六年十月，華國鋒在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的支持下，發動宮庭政變，逮捕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幫」，一下子變成了「英明領袖」，集黨政軍大

權於一身。可是，四年之後，即一九八〇年，華國鋒的權力竟被鄧小平剝奪殆盡，成了名存實亡的「皇帝」。

掌權人物地位的沉浮不定，權力轉移的快速多變，是歷史大變革時代的規律性現象。處身在由專制制度向民主政治轉變的特定歷史階段的華國鋒，其命運也沒有逃出歷史規律的支配。

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之後，華國鋒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逐漸消聲匿迹。官方報刊提到他的名字，也是把他當作批判的「反面教員」。人民群眾對他的議論，也逐漸減少。

可是，最近一個時期，北京的一些機關大院裡，突然出現了一股議論華國鋒的熱潮。這種討論引起了鄧小平及中央政治局的注意。

華國鋒參加選舉的震蕩

六月十八日，北京舉辦官辦的基層人民代表「選舉」。黨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投票。

這天，西城區選區中海懷仁堂投票站，發生了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情：前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突然出現在投票站，參加了投票。胡耀邦、鄧小平、陳雲等人在上午也在懷仁堂站參加了投票，雖「氣氛熱烈」、「掌聲陣陣」，但對群眾并未有多大的吸引力。華國鋒就不同了，他的出現出乎不少人的預料，把人們的注意力一下子抓住了。

華國鋒是乘坐掛着黑紗窗帘的西德奔馳牌

小轎車來到懷仁堂投票站的。轎車門輕輕打開後，有些人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慌不忙走出車門的，是長期消聲匿跡的華國鋒。華國鋒剛一下車，就向正在排隊投票的群眾招了一下手，接着說了一句話：「同志們，你們好我來了。」排隊等候投票的人們雖然都把眼光投向了衣着整齊的華國鋒，可沒有一個人回敬他的問候。個別人還像看見「瘟神」一樣，雙腳向旁邊不自主地移動了兩步。人們的態度使華國鋒頓時清醒了：他已不是七、八年前風光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現在，他是一個被軟禁的、人人不敢碰的廢黜「皇帝」。但無論如何，他的出現確實吸引了大家，連正在向票箱裡扔票的一位中央機關女幹部也回頭張望了幾下，以致差點兒把票投在外面。

華國鋒尷尬地停住了腳步，前後張望了一下，好像不知是從後面排隊呢，還是不用排隊而優先投票。他一看排隊秩序很好，大概不好意思「插隊」，就走到隊伍的末尾。他排進隊後，還對排在他後面的幹部問道：「我很好，你們都好嗎？」可是，後面的人好像沒聽到，根本不答理他。雖然沒有人敢理他，華國鋒的「我很好」這句故意讓別人聽的話，都進入了人們的耳朵。他看上去紅光滿面，走路邁着「主席步」。顯然，他的健康情況是良好的。

華國鋒見大家都不理睬他，也就知趣地不作聲了。他隨着隊，漸漸移近投票箱。可是，華國鋒個子高大，新來投票的人，一下子就看

出了華國鋒。他有時還回頭，好像有意讓後面新來的人看看他「健康」的面孔。華國鋒投完了票，回頭向在場的人說了句「同志們，再見」，就匆匆上了奔馳車，一溜烟出了中南海大門。自始至終，沒有一個人敢和華國鋒說句話。

據一位可以接近華國鋒的人透露，華國鋒是在投票前數天接到通知，讓他參加投票的。當他接到通知後，在屋裡踱了好幾圈，抽了近乎包「三七」烟，才決定服從「黨的決定」。這位人士還透露，華國鋒決定參加投票之後，做了一個下決定的手勢說：「好，去就去！讓人們知道我還好好地活着！」原來，這就是華國鋒準備公開露面的目的。

六月十八日，黨政軍負責人分數處進行了投票，選舉所在區的基層人民代表。屬於「黨中央」的領導人，如胡耀邦、鄧小平、陳雲、鄧穎超，及被廢黜的華國鋒，在懷仁堂投票站投票。屬於「政府」機構的領導人，如國家主席李先念、國務院代總理萬里（總理趙紫陽當時出訪）、國務委員方毅、陳慕華等，是在中南海紫光閣投票站投票。屬於「立法機構」的領導人，如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彭真、副委員長陳丕顯、韋國清等，在人民大會堂行使了「選舉權」。而「軍隊」領導人，如楊尚昆、楊得志等，則在軍委所在地三座門投票站參加了例行儀式。這種安排，乃試圖給人造成黨、政、軍、立法機構分家的印象，可謂用心良苦。

雖然黨政軍大員都露了面，只有兩個人真正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個是陳雲，一個是華國鋒。陳雲身體一直不好，前些日子在上海住了很長時間醫院，還一度出現病危，這次露面并加以人民日報的公開報導，算是向人民做了一個健康狀況通報：「陳雲健康情況已有緩解

」。但人們注意到，陳雲出來時，仍有女護士伴隨。

華國鋒露面引起的注意遠遠大於陳雲，盡管華的露面人民日報未加報導。第二天，一些機關大院就議論開來：

「嘿！你知道嗎？華國鋒出來投票啦！」

「不是傳說自殺了嗎？」

「還有人說他已經死了呢，可看上去紅光滿面的。」

「有沒有得癌症呢？」

「那誰能知道，反正聽人說他身體看上去還不錯。」

「你知道嗎，我們那退休的老局長如果聽說華國鋒身體還挺好，他一定會高興得喝兩盅。」

「不只是我們那老局長，我姐夫他們部隊新近退下來一大批老幹部，聽我姐夫說，他們對華國鋒都有感情。」

「就是沒有退休的人，也有不少同情華國鋒，我們那位副部長還不是？他還不是靠着李先念的關係沒有下台。」

「唉，你知道李先念對華國鋒到底是個什麼態度？」

「那只有去問李先念自己了。」

「看來，華國鋒還有一定的社會基礎。」

華國鋒未被完全批臭

正因為華國鋒尚有一定的社會基礎，鄧小平、胡耀邦才決心徹底搞臭華國鋒，以消滅他東山再起的可能。但是，批判了一大陣子，華國鋒并未像鄧胡所預期的那樣被完全批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在一九八一年的一次中央集會上（當時華國鋒已被剝奪國務院總理和黨



主席之職，落了個副主席空銜），當黨和國家領導人順序出場時，走在前面的胡耀邦、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趙紫陽、陳雲等，都沒有贏得太多的掌聲。唯有剛剛被趕下主席寶座的，掛副主席空銜的華國鋒出現時，全場掌聲雷動，歷經三分鐘之久。這使胡耀邦、鄧小平大吃一驚。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場面？

是中國人同情弱者的民族性的表露？

是人民群眾真正擁護華國鋒？

還是人民群眾用此舉表示對鄧小平的不滿？

一位出席過那次集會的局長級幹部回憶說，一九六一年開縣委書記大會，也有過類似場面：中央領導同志一個個出場，毛澤東帶頭，劉少奇第二，歡迎他們的掌聲并不熱烈。而當李立三出現時，却掌聲如雷。誰都知道，李立三當時僅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三書記，權力并不大，是曾被毛澤東點名批判的「左傾」路線

的代表。人們對他報以掌聲，無非是爲了發泄對毛澤東三面紅旗政策的不滿。「你不是批判李立三左傾嘛，那你老毛爲什麼比李立三還要左？」那位局長的話，反映了當時縣委書記們的情緒。該局長回憶說，一九八一年那次以掌聲歡迎華國鋒的出場與一九六一年李立三出場的情形極爲相似。人們的普通意識是：掌聲并不完全意味着對華國鋒的擁護，但意味着對鄧小平的不滿，則是絕對的。那時鄧小平剛剛鎮壓了西單民主牆和民辦刊物，人們心頭上又如同壓上了一塊大石頭，於是，不滿的情緒用掌聲的差異發泄了出來。

應該承認的事實是，在相當多的人數中，華國鋒就是沒有被批臭。這批人，主要是鄧小平掌權後被整下台的人。一位被迫離職當顧問的大軍區副司令員曾公開講，他就是認爲華國鋒沒有多大錯誤。他曾對部下說：「鄧小平沒有良心，他不想一想，要不是華國鋒抓了四人幫，今天那還有鄧小平的機會！」

胡趙曾試圖軟化華國鋒

在對待華國鋒的問題上，鄧小平與胡耀邦和趙紫陽之間，有相同點，亦有不相同點。相同點是，他們都主張把華國鋒的權力剝奪乾淨。差異點是，在對華進行個人處理時，鄧小平採取硬性政策，主張把華批倒批臭，甚至連人格都要詆毀，頗有「宜將剩勇追窮寇」之意；另一方面，胡耀邦、趙紫陽則主張採取稍具彈性的政策，對華國鋒進行軟化，以收分化擁華勢力之效。在這一點上，陳雲倒較傾向於鄧小平，他在不少場合對華進行人身攻擊。

胡耀邦、趙紫陽認爲，華國鋒仍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如果逼急了這批勢力，可導致尖銳的衝突。他們想通過種種手段軟化華國鋒。胡

耀邦知道國務委員谷牧、方毅和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曾與華國鋒私交不錯，他們在新的爭權奪利的鬥爭中，沒有和華國鋒發生正面衝突，因而臉也沒有完全撕破。於是，胡耀邦曾幾次讓谷牧、方毅、萬里出面找華國鋒，去做華國鋒的思想工作。胡趙的目的是，讓谷牧、方毅、萬里等主動向華國鋒介紹一下實行新經濟政策後的「大好形勢」，特別是顯示一些數據，然後，設法叫華國鋒寫個東西，表示擁護和贊揚黨中央的新經濟政策。如果華國鋒能這樣做，則可大大安撫擁華勢力的不滿情緒，甚至可以分化瓦解華的社會基礎。胡趙的交換條件是，若華國鋒能夠「識時務」，寫出類似文章，則可考慮給華國鋒一定職務，例如省委副書記之類。

前幾個月，谷牧、方毅、萬里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幾次打電話給正在北京醫院住院的華國鋒，要求前往探望，向他介紹新情況。可是，胡耀邦等太小看了華國鋒。華國鋒并不蠢，他一接電話便知道了對方要下什麼棋，他以「安心靜養」爲理由婉詞拒絕。谷牧、萬里等并不甘心被拒，使勁在電話裡講，有非見不可之意。華國鋒一氣之下，用威脅的口吻說：「我要安心養病，我需要安靜！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非逼我，還讓不讓我活？」說完就放下了電話。於是，華國鋒以自殺威脅胡耀邦、鄧小平的傳說便在一部分人中流傳出來。傳來傳去，竟然傳成華國鋒已經自殺了。

胡耀邦、趙紫陽聽完谷牧等的匯報，知道華國鋒「頑固不化」，便決定不要逼得太緊，而不將矛盾激化。胡趙軟化華國鋒的企圖始終沒有成功。

華國鋒欲東山再起

華國鋒剛被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整下台時，心情憂鬱，一貫較爲隨和的脾氣變得很壞，動不動就發火。他體格較胖，有冠狀動脈硬化性心臟病，時常激動，對心臟病十分不利，常有心律不齊發作，因而住了很長時間醫院。後來，在家人的勸說下，他慢慢想開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騎驢看帳本，走着瞧」，華國鋒思量着。心裡想開了，心情平靜了，心臟病也就隨之好轉。前些日子，他出了院，搬回到自己的家裡。

據接近華國鋒的人透露，華國鋒出院後，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起早睡，烟也抽得很少。每天早上，他還在院中打太極拳，鍛煉身體。據云，他現在身體不錯。

論年齡，華國鋒今年六十三歲，比趙紫陽小一歲，比胡耀邦小四歲，從目前他的養生之

華國鋒近來心情好多了，他或許在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老華還有東山再起的一天。



道看，華國鋒是個有心動兒的人。看守他的人講，華每天看報，看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常做筆記。他常對別人說，他要充分利用這段時間好好鑽研一下馬克思主義。

消息來源講，鄧小平極為關注華國鋒的動向，下令密切監視，隨時匯報。華國鋒確是鄧小平的一大心腹之患，因為他曉得，他會較華國鋒早得多地向馬克思報到。北京官場有人猜測，為斬草除根，鄧小平在生前可能用借口將華國鋒除掉，以將鄧死後政局動亂的可能性減小。

看來，在鄧小平辭世前後，中共政治舞台上，還將有一場惡鬥。

民主政治才能防止權力轉移危機

在集權專制國家，高層權力的轉移往往充滿爾虞我詐，矛盾發展到高峯則會導致宮廷政變。像蘇聯馬林科夫下台，赫魯曉夫下台，中國的四人幫下台等，都是宮廷政變的典型例子。以殘酷的陰謀方式奪取權力，是集權國家專制政治的一大特色。

我國面臨權力轉移的危機，根本原因是制度問題。我們國家不是民主政治，別說全民主，就是連黨內民主也沒有。誰能拉住軍隊，掌握槍桿子，誰就能掌權。不聽者，不管你原來職位有多高，一律被打入冷宮。因為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服人，領導人不是靠選票上台，而是靠槍桿上台，被整下去的人當然不會甘心，千方百計地以同樣手段進行復辟活動，是必然的現象。其實，領導層中出現政治歧見是正常現象，在民主政體中，大家都把政見擺到桌面上來，公布於眾，到底實行誰的政見，通過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同時尊重、保護少數。像法國總統選舉、英國首相選舉，都是民

主政治的典型例子。在我國，如果現時實施全民主的民主政治有一定困難，實施黨內民主應該是較容易的。比如鄧小平辭世之後，胡耀邦想當軍委主席，楊尚昆想當軍委主席，華國鋒也想當軍委主席，這都應當是允許的，也是正常的。怎麼解決這個矛盾呢？民主的辦法是，應該召開黨代表大會（代表應由各地民主競選產生，不應是中央指定），凡是想當軍委主席的人都可以公開競選，向代表們談自己的建軍綱領和建軍路綫，華國鋒、汪東興都有權出來競選。最後，讓代表們根據自薦候選人的競選原則，進行無計名投票，得票多者當選。落選的候選人還可以努力爭取下一次當選。這個辦法也可以推行到黨的主席或第一書記的選舉上。雖然這種選舉離民主政治還差得很遠（民主政體中，軍隊應該不干預政治，軍隊統帥應由政府任命），但黨內民主對共產黨來說，總應算是比較容易辦到的。這樣，可以避免因搶軍權而發生內訌，從而避免軍閥混戰的局面出現。

當然，我們老百姓的希望僅是希望而已，共產黨內權力鬥爭的殘酷無情是人人皆知的，連共產黨本身也不否認。縱觀世界上的共產黨，沒有一個黨能實行黨內民主。這是因為，共產黨不懂民主，他們只懂專政，列寧給共產黨的訓條是，只有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只有在一個條件下，共產黨的高級領導人才想到「民主」二字，這就是當他們挨了整、遭批判、下台被囚禁的時候。鄧小平、胡耀邦被四人幫整下台時，都有過對民主的渴望。可是，當他們重返政治舞台之後，便忘記了民主。他們不懂得，實施了民主，不但保護了人民，也是對他們自身的保護。

來自醫學科學院高幹保健小組的消息說，鄧小平的健康情況已明顯不如以前，一場新的

接班角鬥正在蘊釀，隨時都有戲劇性、爆炸性的場面出現。

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們，什麼時候才能擺脫上層人物權力鬥爭給他們帶來的災難呢？



四人幫與鄧小平表面相處甚歡，但却隱涵着派系鬥爭的殺機，專制政治的權力鬥爭從來就不會停止。

中國之春歡迎您！

中國之春迎接中國奧運代表團活動側記

本刊記者 徐孟流

七月廿八日至八月十日，中國大陸及台灣的體育健兒將一同參加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第廿三屆世界奧運會。這是中國體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是海峽兩岸人民溝通的新起點。對我們來說，這是使海峽兩岸政府和人民認識和了解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的好機會。

爲了迎接海峽兩岸奧運代表隊，爲他們提供服務，中國民聯及中國之春組成了奧運特別工作組。奧運特別工作組的人員多數是留學北美的中國留學生及訪問學者，他們將配合中國民聯洛杉磯支部展開活動。

爲迎接奧運會，中國之春雜誌第十四期上發了題爲「歡迎台灣海峽兩岸奧運代表隊」的社論，中國民聯宣傳組還印制了紅底白字的宣傳單。宣傳單的一面寫道：「歡迎海峽兩岸奧運代表隊！祝中華體育健兒爲國爭光！」，另一面則是中國民聯及中國之春簡介，並有「中國向民主制度轉變的大變革時代已經來臨！歡迎您參加到這一歷史洪流中來！」的口號。

「我們很想多了解中國之春！」

中國代表團第一批人員是於七月十六日抵達洛杉磯的。第二天（七月十七日），在奧運村中國選手住所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舉行了升旗儀式。

首先需要一提的是，這次奧運會對中國運動員的安全保衛工作做得十分周到，無特殊允許，任何人不得接近中國運動員進行交談或採訪，連國內來的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也不例外。

升旗儀式完畢後，在外圍參觀照像的中國記者團撤離現場時，一下子碰到了前往派發歡迎傳單和中國之春雜誌的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的成員少軍。中國記者們見少軍手裡的宣

傳品上有「中國之春」字樣，多有閃躲之意。

看來，他們受了某種歪曲中國之春宣傳的影響。少軍主動向前和他們打招呼，遞上中國之春雜誌和歡迎傳單。在「盛情難却」之下，一位負責人模樣的同志先拿了一本封面印有「歡迎海峽兩岸奧運代表隊」字樣的十四期中國之春。一看「領導」帶了頭，大批中國記者們更蜂湧而上，爭着索取中國之春雜誌及其它資料。有的還說：「多給我幾本，我還有幾個朋友。」

看來，他們想了解中國之春的心情十分迫切。在我們那個自由受到極度限制的國家裡，和領導一起活動是最痛苦的事，幹什麼都要領導批准、領導點頭。否則，至少被扣上無組織無紀律的帽子。像接下宣傳自由民主的中國之春雜誌這種事，在領導面前，大家更不能做主。當然，不當着領導的面，大家就自由得多了。

那位負責人模樣的同志一看中國記者們都爭先恐後地索取中國之春，覺得很尷尬，便挖苦了少軍幾句：「你們不好好念書，書讀不下去了，就幹這種事！」少軍當場挺胸回答：「我是從國內來的，我書讀得很好，我已經在北美大學畢業，成了一名核子工程師。」這句話說得對方啞口無言。對方這種中傷指責的話，反映了他們在國內接受的對於「中國之春」的宣傳是多麼可笑。中國的某些當權派將中國之春宣傳成一群讀書不成、游手好閒的人。孰不知，參加中國之春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中，沒有一個人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不少人還讀完了博士、碩士學位。

在沒有領導在場的情況下，中國代表團的人員還是敢於說些真心話的。一位代表團的成員私下對一個沒有向他暴露身份的中國之春成員說：「我們在國內都聽說過中國之春，知道是由留學生搞起來的，但不知他們具體在做什麼，我們很想借這次出國的機會，多了解中國

之春！」

國內人民想多了解中國之春，中國之春在海外的成員也想多了解國內新情況，這是必然的事。多多溝通和了解，是進行正確判斷的前提。

隨着少軍向中國代表團的成員耐心講解中國之春的情況，對方的誤解逐漸減少。在雙方接觸中，氣氛總的說來是較為融洽的。也有一兩個人出來辯論和指責兩句，但多數中國新聞工作者都在旁邊聽少軍的宣講而笑不作聲，也有的忙着翻閱中國之春雜誌，渴求多知道些新消息。

我們仔細想了一下，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在乍一看到中國之春雜誌時，不自覺地流露出了怕意。他們怕什麼呢？怕中國之春這群手無寸鐵的留學生嗎？怕自由和民主的陽光嗎？怕中國之春這本雜誌嗎？都不是，他們懼怕的，是我們國家的專制制度。專制制度的維護者們，把自由、民主的思想視為精神污染。前些日子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不少單位還宣布「誰有中國之春雜誌，一律要上交。」因此，接觸中國之春，就有可能觸犯專制制度的維護者，就有可能在回國後受到懲罰。幾十年來，被專制制度整怕了的中國人民，不得不處處小心啊！

在十七日的接觸中，少軍等同志一共散發了數十本「中國之春」雜誌。

主動邀請中國記者團參加記者會

爲了讓公眾了解中國民聯、中國之春在奧運會期間活動宗旨和安排，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和洛杉磯支部決定召開一次記者會。

七月十八日，奧運特別工作組向洛城各華人報刊發了邀請。傍晚，工作組成員、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柳期陽和中國留學生少軍前往中國

奧運記者團下榻處假日大酒店，向中國記者團發邀請信。柳期陽及少軍兩位在假日大酒店的樓下接待處向中國記者團打了電話，邀請負責人下來。接電話的同志一聽說是中國之春來了人，要見領導，急促地說了聲「你等一下」，就放下了電話。中國記者團大約商量了十幾分鐘，才回答說，馬上有有人下樓來接邀請信。不一會兒，一位四十多歲的中年幹部走下電梯，彬彬有禮的自我介紹：「我叫王訓生」，便接過來柳期陽、少軍給他遞上的記者會邀請信和宣傳品。雙方交談了一段時間之後，忽然電梯門打開了，走出來一大批中國記者。從他們剛下樓梯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們可能錯誤地以爲樓下發生了什麼不愉快的事情了，以致王訓生無法回到樓上，需要下來增援一下。可是，當看到王訓生和柳期陽、少軍和諧相談的情況時，他們的擔心頓時烟消雲散。其實，有什麼可擔心的呢？

事後，一位態度友好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告訴我們，王訓生是新華社體育部負責人，他的任務，只是把中國之春的邀請函帶到樓上，並無權決定是否出席中國之春的記者會。記者團在請示上級之後，得到了「不要出席」的指示。

果然，廿日下午當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在假日大酒店舉行記者會時，在洛杉磯的華人傳播媒介幾乎都有記者出席，但中國記者團沒人出席。

王炳章在記者會上，介紹了中國民聯在奧運會期間的活動宗旨：(1)歡迎、鼓勵海峽兩岸奧運選手共同參加比賽；(2)積極主動地與海峽兩岸運動員、工作人員、新聞工作者進行接觸，使來自兩岸的同胞更加了解我們，并把他們了解到的中國民聯的真實情況帶回大陸和台灣；(3)積極爲海峽兩岸運動員及工作人員的直接接觸創造條件，起中間媒體的作用；(4)爲來自



1984年7月19日下午，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在中國記者團下榻的「假日大酒店」舉行記者會。

兩岸的運動員提供服務，爲他們加油。希望他們創出良好的成績，爲國爭光。

在記者會上，王炳章指出，在奧運會期間，中國民聯有兩個宣傳重點。第一，中國民聯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中國，中國應在一個民主憲法下獲得統一。第二，對於當前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我們既不完全否定，又不完全肯定，我們的觀點是「肯定鄧小平、批評鄧小平、超越鄧小平」。

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將在奧運期間爭取籌備三場聯歡會或座談會。一場是中國民聯與中國運動員及工作人員聯歡或座談；一場是中國民聯與台灣運動員及工作人員聯歡或座談；還有一場是中國民聯邀請雙方運動員及工作人員一起聯歡或座談。

由于中國記者團沒有人參加記者會，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就在記者會舉行之後，主動找那些尚在旅館內的中國代表團人員。工

作組把中國之春雜誌、新聞稿及其他宣傳品送到某些代表團成員手中。當問到他們爲什麼不出席記者會時，他們有苦難言地講：「我們國家的情況，你們不是不了解，我們到哪裡去，自己哪能決定？還不是由領導安排？」聽到這裡，我們也非常同情他們的處境了。

「看到你們呆板的面孔，

就像看到我國內的父母」

七月廿日中午，中國奧運隊第二批隊員抵達洛杉磯國際機場。上午，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派出五名人員到機場迎接。大批國內來的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體育報等單位的記者也在候機坪等候。中國民聯工作組就主動把歡迎傳單和中國之春雜誌送到他們手中，與他們三三兩兩進行交談。

有一個場面十分精彩。

一位出國念書，但其父母尚在國內的留學生（已加入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對兩位年紀五十左右的新華社記者說：「我出國念書已有幾年了，十分想念國內的父母。在這裡，我看到多數人的面孔是快活的，無憂無慮的。可是，我一看到你們的面孔，看到呆板而疑慮的神情，看到你們不敢說真心話的樣子，就好像看到國內的父母，心裡十分難過。在我的記憶裡，父母的表情就是你們這樣子。你們想一想，爲什麼我的父母和你們都是這個樣子？爲什麼做一個中國人不敢講真心話？」這席話，說得兩個飽經滄桑的老記者低下了頭，沉思不語。

一位在飛機場接人的老華僑，聽到中國民聯的人員在機場慷慨陳詞，說得對方心服口服，悄悄對我們說：「以前我只聽說過中國之春，從來沒有見過，這次我親眼看到了，你們講

得真在理呵！你們真勇敢，我曾想辦法支持你們的！」

大使使眼色，剝奪歡迎權

正當中國民聯成員與中國代表團熱烈交談的時候，載有中國運動員的中國民航班機徐徐降落了。記者們紛紛集中到被允許攝影的一個門口（離飛機尚有數十碼），中國駐美國大使章文晉等官員則走到飛機出口處迎接運動員。

這時，中國民聯兩個成員在記者群中高舉起「中國之春歡迎您！」的橫幅。橫幅是白布、紅字，十分醒目。猛然間，章文晉一轉身，看見了「中國之春歡迎您！」的大橫幅，先是楞了一下，然後立即使眼色給旁邊的人。那位隨從的大使館官員把保衛人員叫來，指着橫幅說了半天。保衛人員於是走到記者群，客氣地叫把橫幅放下來。一位民聯成員問他是不是因爲政治原因，他說這裡是記者照像的地方，舉橫幅可以到別的地方去。爲了減少不必要的爭執，中國民聯的兩個成員立即轉移方位，在運動

員出機的正前方舉起了橫幅，這個地方比較較來的地方更爲運動員所注目。

章文晉大使使了外交眼色，想剝奪我中國之春歡迎中國運動員的權力。但是，他的作法並沒有收到效果。其實，章大使沒有必要搞這些小動作，我們和中國代表團的一般成員相處的好好的，何必失掉風度呢？

「台灣不知道你們的近況」

七月廿三日，台灣奧運隊數十名運動員在記者會上與記者公開見面。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亦前往歡迎。除了向台灣運動員散發中國之春雜誌及歡迎傳單外，中國民聯的成員還與台灣運動員進行了友好交談。一些年紀小的運動員不怎麼知道什麼是「中國之春」，年紀大的則較有興趣。他們說，中國之春初期在台灣很轟動，後來消息就漸漸減少了，不知近況如何。這番說話，更加使我們認識到，使台灣海峽兩岸了解中國之春的近況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大陸對中國之春進行新聞封鎖，內部小範圍內進行歪曲宣傳；台灣則進行新聞過濾，有利的報導，不利的話和批評的話，不予報導。中國之春雜誌目前在兩岸都不能公開出版、發行，對中國之春十分不利。大陸禁止民刊，是衆所周知的；但中國之春不准進入台灣就講不通了，台灣本來就有很多黨外刊物嘛！據說，一份台灣民辦刊物曾試探當局代理發行中國之春的可能性，結果遭到「婉言謝絕」。這就造成了台灣人民越來越不了解中國之春的狀況。

奧運會馬上就要正式開幕了，中國民聯奧運特別工作組的任務十分艱巨，我們亟需廣大留學生和各界僑胞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支援！

一九八四年七月廿三日于洛杉磯



中國民聯成員高舉「中國之春歡迎您！」的橫幅，在洛杉磯國際機場歡迎中國奧運代表隊。

肯定鄧小平 批評鄧小平 超越鄧小平

王鷲 執筆

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是伴隨着國內改良派推行新經濟政策開展起來的。這種伴隨現象使得一些人產生了誤解。有人說，中國之春全盤否定當前國內的改革；也有人講，中國之春是國內改良派的分支。這些結論都是不正確的。事實上，自中國之春運動的發起到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成立，我們對國內改革的看法是始終如一的。對於鄧小平推行的經濟改革，我們既沒有盲目地歌功頌德、高呼萬歲，也沒有一概否定、全盤打倒。我們一直理性地對待、分析當前中國發生的變化，並促進這個變化。

我們對於國內經濟改革的觀點可簡單地歸納為：「肯定鄧小平，批評鄧小平，超越鄧小平」。

肯定鄧小平

肯定鄧小平，意指一定程度上肯定他的一些經濟改革政策，如農村的「包產到戶」、自由市場、沿海城市的開放及特區計劃、鼓勵外資、派遣留學生、城市小型私人企業的建立、某些工業領域內的承包責任制、國營企業開始接受私人股份、利改稅等。這些政策在客觀上給人民帶來了利益。與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批判唯生產力論、關閉自守等政策比，鄧小平的新經濟政策顯得靈活得多，也較為尊重人性。因此受到人民、特別是農民的歡迎。在新經濟政策的影響下，人民生活的平均水準有了提高，這是不爭的事實。

但有兩點，是應該注意的。其一，改良派實行經濟改革，乃迫於壓力。再不改，農民無路可走，有造反的可能。其二，執政者實行經濟改革的目的之一，是緩解他們與人民之間的矛盾，從而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儘管如此，有限的開放政策順乎了歷史的潮流，客觀上給

毛澤東死後，鄧小平成了中國政壇的重心，他在與「四人幫」及「凡是派」的鬥爭中，作出了歷史貢獻。



下一步制度的變革創造了條件。明顯的一個例子是，有限的門戶開放和留學生政策，促成了今天海內外配合運作的民主運動。

批評鄧小平

批評鄧小平，意指批評他改良政策的曖昧性、搖擺性、不徹底性和經濟開放而政治收緊的矛盾性。

所謂改革及新經濟政策，說穿了，其實只有一條，就是差差答答地搞點有限的資本主義。什麼「生產承包責任制」、「萬圓戶」、「專業戶」、「特區經濟」等等新名詞，都是給資本主義穿件不同的衣服而已。由於共產黨堅持其信仰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就使自己陷入了理論上教條的困境。所以，他們不能



公開地宣稱搞些資本主義，只能「猶抱琵琶半遮面」而已。爲了「半遮面」，共產黨組織了不少理論研究小組，其任務，無非是從浩瀚的馬列著作中，挑些隻言片語掩飾他們離經叛道的行爲。理論小組另一項十分重要而又困難的任務，則是制定在我國發展資本主義的限制，以使社會主義的堤壩不被改革的浪潮沖垮。共產黨人以消滅資本主義爲理想，轟轟烈烈數十年，到頭來，全部共產黨國家都要實行經濟改革——依靠有限的資本主義因素而存活，確是一大諷刺。改良派的這種曖昧性，使自己處於左右夾攻的地位。一方面，激進的民主派要求他們取消馬列主義教條；另一方面，保守派又攻擊他們背叛了馬列主義原則。改良派的這種處境是值得同情的，但是，這是自找的。

其次，改良派的搖擺性也該批評。由於他們處於兩面夾攻的境地，民主派推一下，他就向前走一走，保守派打一下，他就向後退一退。步伐蹣跚，是改良派理論與實踐相矛盾的反映。是馬列主義對？還是資本主義好？他們自己都迷惑了，走路怎麼能不搖擺？批評一下，有助於其頭腦清醒。

再談他的不徹底性。鄧小平爲首的改良派，目前已達到他們能做到的最大限度，不敢越雷地一步。因爲再進一步，就否定了自己。

最後一條，也是最嚴肅的一條，就是批評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政治收緊的矛盾性。政治收緊是鄧小平改良派另一特點，諸如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禁止民辦刊物、關閉西單民主牆、壓制民運人士、清除精神污染、愛國主義（實質爲愛黨主義）宣傳等，皆屬政治收緊之列，其集中表現是提出「四個堅持」。

改良派之所以有這四大特性，如前所述，乃因他們的立場還沒有完全移到人民這一邊來。他們的改革，基本上是被人民推着走的；他們的政策，相當程度是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利益。因此，他們不能放開手脚、和民主派結合在一起，和人民群眾結合在一起，以最有效地克服和抵制保守勢力。

在這裏，我們還要指出當權的改良派與其歌德派所宣揚的恩賜論。該論調是：「現在共產黨已經很不錯了，允許學生出國、允許農民發財、允許知識青年辦小企業、允許教師兼課賺外快、允許……，你們還批評它，太過份了。」這句話翻譯一下的意思是，共產黨給了你們那麼多恩賜，你們再批評人家，就叫沒有良心。這種恩賜論實在可悲。自由出國、自由耕作、自由辦企業等等，本來就是人民應有的天賦的權力。以前人民沒有這些權力，是被共產黨剝奪了。現在，當權者把它有限地還給人民

，是應該的。現在的問題是，當權者還是速度太慢、還是幅度太小了，根本談不上什麼恩賜。

超越鄧小平

所謂超越鄧小平，就是突破他的極限，指出他目前應該邁出而又不敢邁出的下一步。

總結這幾年鄧小平的改革，可用一句話概括之：共產黨少管哪個行業，哪個行業就發展；共產黨不管哪個行業，哪個行業就興旺。道理很簡單，共產黨是外行，儘管他們主觀上不想把事業搞亂，但由於不按客觀規律辦事，再加上手上擁有權力，干涉越大，亂子就出得越多。他們少管一點，亂子就少一些，如徹底不管，各行各業就上了軌道。

總結出這條規律，也就知道該如何超越鄧小平的改良派了。

由於各行各業的問題太多，我們僅談幾個主要的方面。

先談農業。農業自然發展，必然是沿個體戶（小農經濟）——專業戶（土地逐漸向種田能手集中，非種田能手改從其他職業）——農場主（土地集中，機械化）的方向進行。改良派至多能夠走到專業戶這一步。促成土地集中而爲機械化創造條件，必須進一步解除共產黨對土地的控制，允許土地的自由買賣。一下子走到這一步較爲困難，可先走較易的一步——售地於民。那些萬圓戶或經濟條件較好的專業戶，可以把分給他們的那一份有自主耕作權的土地買下來。這樣做，對國家和個人都有利。國家可以做到資金回籠而致富；農民可以獲得安全感而安心耕作。現在中央保障農民有十五年自主耕作權的政策，實際上是租地給農民十五年的政策，農民總是不放心，總覺得有臨時感。由於土地不是自己的，農民也不會精心保

養土地。再下一步，則是非種田能手把土地出售給種田能手，國家制定土地買賣稅收政策。這樣，國家從土地的集中過程中又可以獲利。

工業及商業的問題要複雜得多，短期制定出解決全部問題的一攬子方案實為不易。總的看來，黨對工商業的控制仍嫌太多，遠大於對農業的控制。為求突破，以下幾點應敢於邁出

第一，允許獨資或合資辦企業（不限於雇工五人）。現在當權者一再吸引外資，讓外國人在中國設廠賺錢，但不允許中國人自己辦企業賺錢（只允許辦雇五人以內的小作坊）。這種把賺錢的專利割讓給外國人的政策，實在不夠公平。

第二，允許獨資或合資購買某些國營企業，尤其是虧本的國營企業（國家銀行給予貸款支持買主的購買力）。實行這種政策，國家既丟掉包袱，又回收資金，可謂一箭雙鵰。國營企業改為私人或集體經營，往往可收起死回生之效。

第三，在工商企業單位，撤銷黨委領導。共產黨員可過組織生活，但無領導權。黨委原脫產幹部以及政工部門幹部都參加實際生產勞動。企業交由職工代表大會選出的職工管理委員會管理。一切權力（包括生產計劃的制定、人事安排、國內外貿易、吸收外資等等）歸管理委員會。工商企業改為自負盈虧，國家向企業徵稅。連續虧損而又經過各種辦法（包括裁員等）無法挽救者，管理委員會要敢於拍賣、甚至解散。如果有魄力一下子把所有的工商企業都進行如上改革，可以分批進行。服務業、商業、輕工業部門先搞，再擴展到重工業部門。

第四，工商企業交由職工委員會管理之後，要大膽撤銷某些從中央到地方的原國家官僚

管理機構，如不必要的計委、工業部、工業局、服務局等等，把白拿薪水而又亂指揮的幹部減至最少。

第五，原為推行中央集權計劃經濟而設立的各級計委，要有性質上的改組。除留下極少數人員對暫時還必須由國家管理的企業（如兵



工、郵電、鐵路等）繼續進行計劃設計外，各級計劃部門應蛻變成經濟情報和資料中心。該中心收集、匯總各種產品的國內外市場供求、各種原材料的國內外市場供求以及勞力資源的供求等資料，向各企業部門提供服務，以便指導生產部門應該生產什麼和應該生產多少，指導金融界應該投資什麼和應該投資多少。這裏，我們強調的是信息指導，而不是指標指令，更不是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國家要用各種優惠的辦法，誘導優先企業的發展。縱觀發達國家的辦法，誘導優先企業的發展。縱觀發達國家，均以自由的市場經濟獲得快速發展，而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及起飛之後，又不斷加以國家干預成份，意即吸收計劃經濟的某些有益原則，以彌補純自由經濟之不足。這種情況，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着切實的借鑒作用。

第六，成立專門研究機構，研究發達國家經濟發展中副作用（如環境污染等）產生的原因及可能的預防辦法，給中國的經濟起飛提供借鑒。

總之，要改的，千條萬條；要理的，千頭萬緒，難以在一篇短文中全部論清。所提建議，也難免有膚淺謬誤之處。但是，有兩條原則必須遵守，才能促使經濟起飛。一是外行逐漸從經濟領域內撤退；二是逐漸實行指導性市場經濟。

最後，我們要指出，我們超越鄧小平的最重要的一點，是主張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我們主張從憲法中取消「四個堅持」，釋放民運人士及持不同政見者，要求民辦刊物在國內出版、發行，要求落實憲法中結社自由等條款。當權者一下子做不到這麼多，可以逐步實行，先易後難。比如，先放寬言論尺度，制定出版法，允許民刊出版，對改革起支持、批評、監督的作用，這一點，總該比較容易做到吧！

新舊洋務運動的比較

當前鄧小平的「四化運動」，酷似滿清末年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且看如下比較：

第一，在歷史背景上：

李鴻章舊洋務運動的背景是，滿清王室腐敗無能，國庫空虛，民不聊生。列強的洋槍洋砲，使清室喪膽失魂。迫於形勢，當權者興辦洋務，以圖起死回生。鄧小平新洋務運動的背景是，共產黨外行治國卅年，國力凋敝，百業俱廢。外國的經濟起飛，尤其是華人社會（香港、台灣、新加坡）的經濟起飛，使共產黨領導人感到震撼和威脅。為減內壓，當權者提出四化，以免「亡黨亡國」。

第二，在宣傳口號及指導思想上：

李鴻章主張「洋務運動」，鄧小平鼓吹「四化運動」；李鴻章、張之洞宣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鄧小平指示「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三，在具體作法上：

李鴻章和鄧小平都派遣留學生，都大手筆地向西方國家購買先進武器。為吸收外資，加強與外國貿易交流，滿清洋務派開放五個通商口岸，鄧小平則開設十幾個沿海城市經濟特區。

第四，在政治勢力的較量上：

洋務運動時代，有以理學大師倭仁為首的頑固派的抵抗，他們提出「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四化運動之初，有以葉劍英為首的保守勢力的抵制，他們堅持「兩個凡是」。洋務運動後，出現了較洋務派為激進的康有為的「戊戌變法」；今天，在鄧小平提出「四化」後，共產黨內較為激進的廖蓋隆等，也曾提倡「庚申改革」。與「戊戌變法」運動同時興起

的，有與中會、同盟會的革命派，他們主張「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現在，則有當代民主運動的興起，民主派公開宣稱「廢除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第五，在求變根本目的上：

洋務運動中，李鴻章、張之洞提出「保教（名教綱常）、保國、保種」的「三保」口號，旨在維護清廷統治；「四化」建設中，鄧小平、胡喬木等則提出「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的「三熱愛」口號，目的在於加強共產黨的領導。一九〇八年滿清政府頒佈的憲法大綱中，明文規定永遠尊戴大清皇帝，大權歸於清朝；一九八二年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新憲法中，也明確寫上「四個堅持」，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放之首位。

第六，在運動的後果上：

李鴻章的舊洋務運動，在客觀上給辛亥革命創造了條件，其結果是滿清封建制度的覆滅和民國的建立；今天，鄧小平的新洋務運動，在客觀上也給當代民主運動的大規模興起鋪墊了道路。最終結果，將是一黨專政制度的結束和民主政體的真正確立。

儘管人們也可以列舉出新舊洋務運動之間的衆多不同之處，但無可否認的是，兩次洋務運動的基本脈絡是相似的。它們都應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也都會被隨之興起的民主運動的歷史潮流所淹沒。

結束語

「肯定鄧小平、批評鄧小平、超越鄧小平」，比較全面地涵括了我們對當前中國共產黨改革政策的看法。

任何人物都有他歷史的局限性，以鄧小平為首的改良派也不例外。一方面，他們設法求

變，如當年康有為所說的那樣「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則亡。」另一方面，他們又跳不出自己的框框，做不出敢於否定自己的大事業，從而立足點不能完全移到人民方面來。鄧小平之後的第二代共產黨人，框框可能較鄧小平少一些，但如果仍抱着「四個堅持」不放，其前景並不樂觀。改來修去，最好的結果，不過把中國搞到今天的匈牙利、南斯拉夫那樣而已。

當然，我們也不能苛求於鄧小平，他已經做到了他能做到的極限。他給自己定下的極限，決定了他像李鴻章一樣，只能成為歷史的過渡性人物。

我們還要指出的是，如果鄧小平本人接受不了我們「肯定鄧小平、批評鄧小平、超越鄧小平」的觀點，第二代共產黨人則沒有道理拒絕我們的這一觀點。「肯定鄧小平」，他們當然是同意的，「批評鄧小平」，他們亦應接納。理論上，共產黨提倡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踐上，第二代共產黨人本身對鄧小平的「清除精神污染」和霸道作風就有過抵制。「超越鄧小平」，第二代共產黨人會欣然接受，這是他們的追求目標，後浪總是推前浪的。問題在於超越到何種程度。但願他們當中，能出現西班牙王子卡洛斯那樣扭轉乾坤的人物，借獨裁人物辭世之際，把極權專制制度轉為民主政體。第二代共產黨人必須清楚，如果他們仍搞鄧小平「四個堅持」那一套，成為短暫的歷史性過渡人物也必將是他們的結局。

最後應該強調，民主運動並不把希望寄托在黨內改良派的身上，我們應該始終立足於人民這一邊，沒有人民的壓力和推動，且不說民主革命，連黨內的改良也不會發生。

百問鄧小平

孟 歌

前言

近年來，中共竭盡全力，宣傳鄧小平及其「改革路線」。根據中共的宣傳，似乎鄧小平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路線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改革」已經取得偉大勝利，振興中華，指日可待。

問題是否這般簡單？筆者根據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在此提出一百個問題，向鄧小平先生及其理論家、宣傳家們請教。

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

1、你認為當代世界上還存在共產主義運動嗎？如果存在，它在哪裏？中國？蘇聯？南斯拉夫？還是北韓？哪一國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該是公元多少年？或許有人提供答案，你是否相信？

2、當年中蘇分裂之後，中共在許多國家扶植過形形色色的「真正馬列主義共產黨」，施捨過大筆銀兩。可是後來一個一個無聲無息，好像從來沒有這回事一樣。當年你是總書記，你應該十分清楚，那些「真正的兄弟黨」哪裏去了？是壓根兒就沒有，中共上了當？還是因斷了銀兩，也就散了黨？

3、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共的原則是什麼？是支持國際工人運動？還是支持封建復辟？如果是前者，為什麼支持金日成搞家傳世襲？這兩件事都是你的決策，你怎樣向人民交代？

4、共產主義運動，是工人階級解放運動，自從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一直受到工人階級擁護。為什麼當今諸多共產主義國家懼怕工人運動，逮捕、鎮壓工人？你復職之後，在憲法上取消了工人罷工的權利。這是為什麼？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如今站在工人階級的對立面，還當誰的先鋒？

5、每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都是解放全人類，因為這是「共產黨宣言」的革命口號。既然如此，為什麼怕民主、怕自由、不講法制呢？為什麼許多執政共產黨大開殺戒？為什麼波爾布特執政一年殺人百萬，至今仍是你的座上客呢？你們的共同語言真是解放全人類嗎？

6、四十年代後半期形成的社會主義陣營，確實有過一段蜜月。但到了五十年代末便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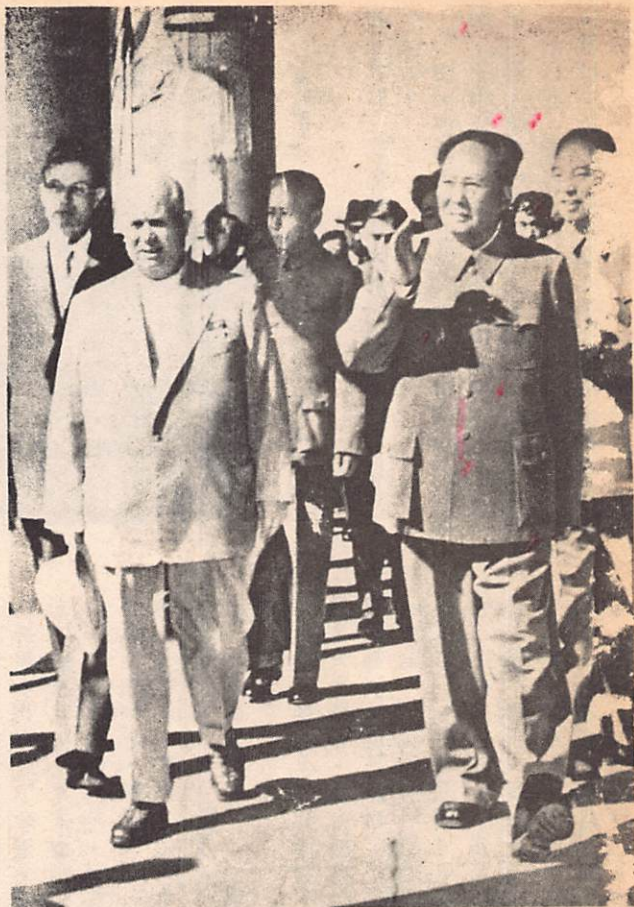
生分裂，反目成仇，不共戴天，乃至兵戎相見，仇恨之心，甚於對帝國主義，東方各黨，尤為典型。可笑的是各自仍打着馬克思主義招牌。這是表示信仰馬克思主義，還是嘲笑馬克思？

7、當年中蘇兩黨分裂，究竟是意識形態分歧，還是爭奪黨主交椅？如果是前者，誰是誰非？毛澤東當年發表「九評」，反修振振有詞，可是為什麼到頭來却搞封建主義復辟，製造十年浩劫？如果是後者，豈非把無產階級革命看成農民起義？當時你曾牽中共代表團去莫斯科談判，你怎樣評論這段歷史？

8、當今世界，還有多少人真正信仰共產主義？而不是組織上、政治上信仰？黎笋、契爾年科等人自然不在話下，你自己真正信仰嗎？還是組織上信仰、政治上信仰？如果是真正信仰，為何當年不同封建主義決裂，反而一直緊跟毛澤東呢？如果是組織上信仰，為何今日仍堅持毛澤東思想？如果只是政治上信仰，那就不是信仰馬克思主義，而是信仰實用主義了。實用主義不是早已被你們批倒鬧臭了嗎？

9、如果你給戰後四十年的共產主義運動做一個總結，你能總結出怎樣的內容？你是否承認，戰後共產主義運動和戰爭、侵略、屠殺、鎮壓、飢餓、災難連繫在一起？或許你否認，可是此外還有什麼內容？

10、你是否承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結果，對世界和平構成威脅，而且威脅日趨嚴重？當前形勢是，蘇聯侵略阿富汗，越南佔領柬埔寨，雙方都把中國當做頭號敵人，北方重兵壓境，南方不斷挑釁，只有惡化的可能，沒有緩和的餘地，如果演變下去，戰爭只是時間問題，戰爭一旦爆發，便是全人類的存亡問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目的是解放全人類，為何把人類推到了滅亡的邊緣？



國慶十週年紀念晚會與毛澤東步上天安門 (1959年10月1日)

當年的「老大哥」，成了社會帝國主義。是「老大哥」變了，還是「小老弟」跟錯了「老大哥」？

關於中國共產黨

11、請你站在人民的立場，從歷史的角度回答：

你親身參加的中共的革命，是成功？還是失敗？如果說成功，江山依然舊貌，成功在哪裏？是因為奪取了政權、建立了中共的統治嗎？歷代農民起義不是也能奪取政權、建立帝王統治嗎？那也算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嗎？你能同意嗎？如果是失敗了，為什麼還要霸政而不下台呢？試問，中共的統治，除了比封建王朝更加極權之外，還有什麼區別？

12、中共在中國搞社會主義試驗，凡三十五年，其結果是完全徹底的失敗，中國成了全世界最落後的國家之一，無論按國民平均收入

，或按人口平均的大學生人數，都排在印度後面。然而你並打算放棄這項試驗，仍要為本世紀末達到每人每年平均收入八百美元而再試驗一次。姑且不論能否達到以及達到之後有什麼價值，首先請你回答：拿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做這種試驗權利是誰給的？這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哪一條？

13、你至今依舊認為，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當然更是真理。既然有這兩大真理，三十五年來中國共產黨應該從勝利走向勝利，中國也早該繁榮、富強。為什麼事實與此恰恰相反？是因為「真理」並非真理？還是因為你們不按真理辦事呢？

14、今日中國大陸貧窮、落後，恐怕再也

出大陸已經三十五年了。這三十五年是由中國共產黨統治，今日貧窮落後是由你們造成的，連你本人也負有歷史的責任，這是歷史的事實，是無論如何推不掉的。如果真地信仰唯物史觀，你就應該承認，今天你掌權，你就應該改正。可是為什麼還要「四個堅持」？

15、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國共產黨獨樹一幟，標新立異，乃至孤芳自賞，六十年代幾乎批判了所有的共產黨。然而實行的結果是，中共失敗最多，中國災難最多，中共自身遭到破壞也最大，如今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成爲孤家寡人，遭到歷史的嘲笑。你做爲當年的總書記，怎樣反省這一段歷史？是否願意反省？

16、中國共產黨自建立政權之日起，就懼怕資本主義復辟，因此年年批、天天批，似乎一天不批就會復辟。可笑的是，到頭來資本主義沒有復辟，封建主義却大鬧復辟，至少復辟了十年！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對封建主義相當適應，很少反感，以至於今日仍不願和封建主義徹底決裂。在封建主義大發神威的年代，你是受害者，但是復辟過程中，無可否認，你也是參與者，而且至今對封建主義含情脈脈。請你回答：爲什麼你們只怕資本主義復辟，而只怕封建主義復辟？難道封建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

17、「毛主席紀念堂」，和關帝廟之類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是現代高大建築，裏面停一具腐屍。其封建意識，豈非完全一致？都是叫人去崇拜、去迷信？但是關帝廟是封建社會建造的，爲了維護帝王的統治，是完全必要的，是理所當然的。毛澤東紀念堂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信仰共產主義、奉行唯物史觀的中國共產黨建造的。請問，爲什麼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的中國，仍然大搞封建主義的一套？



中國的老人政府，是中共的光榮，還是對十億人的嘲笑？

建造當時，固然你沒參加，但是爲什麼你却主
張保留？

18、中國大陸十億人口，而中共的決策機
關——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只有六人。就是
這六個人坐在中南海統治十億人，就是這六個
人的思想、意志，決定十億人及其後代的命運。
請問，這是唯物史觀？還是唯心史觀？在這
六個人當中，三位主要人物的年齡都在八十歲

以上，似乎中國以及中國共產黨內，再也沒有
領導國家的人才，而必須由今日難卜明日事的
八十老翁在政壇上等候末日的來臨。這究竟是
中國和中共的光榮？還是對十億人的嘲笑？

19、中國共產黨，要求中國人愛國，要求
海外僑胞愛祖國，這都是正當的。但是提出一
個前提：愛國必須愛社會主義祖國，言外之意
是必須愛締造社會主義祖國的中國共產黨，不
愛黨，就不准愛國。這就離譜了。中國——這
個概念包括的是十億同胞、九百六十萬平方公
里的土地、五千年的歷史、光輝燦爛的文化、
偉大的民族語言。這些內容，是任何一個中國
人，無論他住在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都無
條件熱愛的。至於中國共產黨——這個概念只
包括四千萬黨員、六十三年來的共產主義運動史
。這怎能和十億同胞、五千年的歷史相比呢？
至於說中共締造了社會主義祖國，人們只能認
爲那是中共奪取了政權，建立了極權統治，既
未使國家富強，亦未造福於十億同胞，與此相
反，三十五年的統治，運動不斷，災難連綿，
千萬人喪命於「階級鬥爭」之中。這樣的執政
黨，怎能叫人愛呢？退一步講，世界許多國家
都實行政黨政治，可是除了共產黨之外，有誰
敢要求人民去愛它？一個執政黨有什麼資格要
求人民愛它？

20、如今各國共產黨，那一個不搞修正主
義？大至蘇聯，小至阿爾巴尼亞，大搞小搞，
個個都搞。這是好事，不是壞事。一百多年前
的理論，無論如何已經過時，要適應時代，就
必須修正。歷史證明，早修正比晚修正好，大
修正比小修正好，小修正比不修正好。中共就
是因爲不修正，所以走向了反面。如今你看到
這個歷史的趨勢，不敢再連抗，因此提出「改
革」，「改革」不就是修正？不過你的「改革
」，是在「四個堅持」下的改革，這種「改革

」有多大意義，這種改革只算是小腳女人走路
，能走多遠？

關於法治和人治

21、中共建立政權，凡三十五年，三次修
訂憲法，平均每十年一次。但是每次修訂不久
，便悄悄作廢，代之以「中共中央文件」，直
至下次再修；然而再修之後，還是悄悄作廢，
如此這般。形成慣性循環，時至今日，大同小
異。這是爲什麼？世界上大小國家幾百個，試
問哪一個國家如此戲弄憲法？

22、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屆憲法規定：制
定和修改憲法的權利，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然而歷史證明，無論是制定或修改，歷來是
中共一手包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只不過是
一個表決機器，而這架機器也是操縱在中共一
黨手裏，因此無論憲法被改成什麼樣兒，都絕
對可以表決通過，不僅不會有人反對，而且不
會有人棄權。如此泡製的憲法，除了保護中共
一黨及黨領袖一人的利益之外，還能保護誰的
利益？

23、即使如此泡製的憲法，中共哪一年執
行過？一九五四年第一次頒佈憲法，一九五五
年毛澤東就收了起來，擅自掀起了「肅反運動
」，一九五七年又大搞反右鬥爭，一九五九年
整肅「彭德懷反黨集團」，至此再也不記得還
有什麼憲法。在幾億人口的大國家，有誰會感
到憲法保護？人口最多是農民，他們長久處於
飢寒交迫之中，他們得到憲法保護嗎？國家的
領導階級是工人，二十年來未增加工資，憲法
保護過他們嗎？最可悲的是知識份子，毛澤東
給他們製造了一整套「帽子」，無論是誰都可
以分到一頂，而最後一頂——「臭老九」，扣
在每個知識份子頭上。他們是知識階級，知道



中共天天開會，年年立法，但它哪一年執行過憲法呢？

國家有一部憲法，但是誰敢要求憲法保護？你一直處於頂層的核心，這一段歷史你最清楚，請你實事求是地回答：中共哪一年執行過憲法？

24、中共自己修訂的憲法，為什麼自己不能執行？是中國人愚昧，不適用於法治，只適於人治？還是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與法治不相水火？如果是前者，何必制訂憲法，乾脆實行「寧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王法，豈不方便許多？倘若是後者，堂堂社會主義制度，為什麼與法治不相水火？

25、文革期間，毛澤東公開宣稱：要人治，不要法治。二十七年的歷史證明，從建國當日起，毛澤東從來就沒實行過法治，一向實行人治，直至壽終正寢。請問，在一九五四年憲法頒佈之後，是誰給了他駕於憲法之上，公然實行人治的權利？你可以說你沒給，請問你會

否反對？那怕是些微反對？相反，「肅反」、「反右」那次你不是積極參與？

26、什麼叫法治？什麼叫人治？根據你的學歷、你的資歷以及你的經歷，可以相信你能有一個正確的理解。法治——和民主、自由、人權相連繫，它是人類推翻封建社會之後建立起來的法學觀念，它屬於歷史唯物主義範疇；人治——和獨裁、專政、霸道相連繫，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屬於歷史唯心主義範疇。人類由人治到法治，這是進步；倘若由法治再回到人治，這就是倒退了！毛澤東做

為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為什麼喜歡封建式的獨裁，喜歡倒退呢？你們這些自命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為什麼能接受毛澤東的獨裁和人治呢？

27、毛澤東在實行人治的同時，實行了黨治，令黨治為人治服務，因此他無限地宣傳了黨，神化了黨，神化了黨員（說黨員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令黨駕於一切之上，一切必須服從黨，憲法自不例外。於是在人們的思想上造成黨大於法的觀念，而不是黨服從法。如今毛澤東已經死去，他的一套已被歷史否定，你也以改革派自命，請問你是否依然主張黨大於法？如果不是，為什麼在「四個堅持」（被稱做四根擎天柱）之中沒有「堅持憲法」一條，而頭一條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呢？既然要「堅持黨的領導」，而黨又是領導一切的，順理成章，黨也必須領導「法」。既然如此，「法」就必須服從黨，而不是黨服從「法」。——豈有領導者服從被領導者之理？如此推論，你的主張豈非仍舊是黨大於「法」？仍舊是人治？

28、一九七八年你復職之後，確實想革掉人治，實行法治，因為你也吃盡人治的苦頭。但是你立刻碰到黨和法的矛盾。如果真正實行法治，就必須承認法大於黨，黨服從法；倘若

承認黨服從法，黨就失去了絕對權力，你也就失去了絕對權力。而絕對權力對於你是不可少的，沒有絕對權力，你就不能統治，因此你提出一個新的法學術語——「社會主義法治」。以為如此既可保證黨領導法，又可以稱之為「法治」。所憾這類權術早已被毛澤東玩弄夠了，今天你還去拾毛的牙慧，能騙得幾個大陸人？

29、你很清楚，倘若真正實行法治，你的地位和權力統統烏有了，因為任何法治國家的元首，都是由民選產生，其權力和地位受到法律保護，也受到法律限制，因此不可能有太上皇，也不可能兒皇帝。而今中國的國家元首是李先念和趙紫陽，黨領袖是胡耀邦，你只不過是中共中央屬下的顧問委員會主任，可是你的權力和地位却駕於李、趙、胡之上，你居然敢於在公開場合違反中共的組織原則，罵黃華和耿飈胡說八道。這是憲法的那一條、那一款規定的？

30、如果你真正實行法治，那就應該一切案件按法律審理，而不允許任何個人意志干擾。而今是這樣嗎？如果是，為什麼罪該萬死、死有餘辜的江青不能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為什麼根據憲法享有言論自由的魏京生等人，只因發表了民主言論，就被判為重刑？

31、如果你真正實行法治，就應該把一切法律問題交給立法和司法機關去處理，你本人無權干涉。為什麼你下令掀起「滅罪運動」，並實行「可殺可不殺者也要殺」呢？這豈非比當年毛澤東更加人治？

32、既然是真正實行法治，為什麼新憲法的赫赫條款不能實行呢？新憲法第十三條明文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為什麼自一九五七年「扣帽」起至一九七八年末「改正」

止扣發的右派份子的工資，至今分文不還呢？各地幹部或機關霸佔的華僑的房產，爲什麼至今不退呢？

你的社會主義法治和憲法是什麼關係？

關於清除精神污染

33、什麼叫精神污染？

根據大陸報刊的論點就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以及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對大陸居民造成的精神影響。可是爲什麼你在「除污運動」中批判白樺的「苦戀」、葉文福的「將軍不能這樣做」、孫敬軒的「一個幽靈在中國大地遊蕩」、戴厚笑的「人啊，人！」以及周揚和王若水的「異化論」呢？白、葉、孫憂國愛民，各自在作品中抒發愛國主義思想，難道愛國主義只屬於資產階級嗎？戴厚笑崇尚人權，宣揚了人道主義，難道無產階級就不講人道嗎？毛澤東固然不講人道，他也不准別人講人道，這是他的錯誤，他的悲劇之所在。而今他已死去八年，你自命實行改革，改革意味着進步，既然要進步，爲什麼還不准講人道呢？你是真改革，還是假改革？周揚、王若水，這兩位專家平生研究馬克思主義，「異化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份。只因他們用「異化論」揭示了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病，就把「異化論」也劃爲「除污」的對象，並對周、王大加撻伐，這是根據馬克思主義哪一條？

34、爲什麼要「除污」？無非爲了鞏固政權，加強統治。可是從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開始，不是一直在「興無滅資」——一直在「除污」嗎？那一年那一天沒講「大長無產階級志氣，大滅資產階級威風。」？六十年代的「天天讀」，文革十年的「早請示晚滙報」，哪一

周揚



中共理論權威周揚，也因「異化論」而遭當局批判，「異化論」則視爲「精神污染」。

項措施不是爲了除污？試問：三十五年過去，中共的政權是鞏固了？還是削弱了？到頭來，毛澤東自己的權力是加強了？還是削弱了？

35、是誰削弱了中共的政權？是誰破壞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誰搞亂了中國社會、造成「三信危機」？是國內外資產階級的「精神污染」，還是毛澤東的無限升級的階級鬥爭及其野蠻的獨裁統治？「三信危機」是你提出的，你一定有深刻的體會，敢不敢坦率地回答？

36、是誰污染了大陸同胞的精神面貌？是誰破壞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倫理道德？是誰教唆子女反對父母？挑動學生鬪爭教師？煽動青少年批判長輩？是誰製造社會仇恨、唆使工農仇視知識份子？又是誰污染了紅衛兵的思想，發動他們闖死了劉少奇、彭德懷、賀龍以及大批中共的元勳？是國內外資產階級？還是中共主席毛澤東？

37、如果西方資產階級有那樣大的污染力量，足可以對十億人口的中國造成威脅，那麼東歐各國都是西方世界的近鄰，國門又大大開放，西方思想任意滲透，連可口可樂的高大的廣告牌都在布達佩斯火車站巍然屹立，倘若你

們的「污染論」成立，東歐各國豈不早已大亂，國民經濟豈不早就崩潰？共產主義政權豈不早已岌岌可危？事實恰恰相反，那裏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方面，都比中國好許多，尤其是匈牙利，經濟繁榮，社會安定，中共對西方的意識形態，一向視如洪水猛獸，採取一切措施，嚴加防範。可是爲什麼到頭來中國反而一切落後呢？

38、既然西方的一套是沒落的、腐朽的、反動的，而中共的一套是先進的、革命的、生機勃勃的，中共又一向認爲「群眾眼睛是雪亮的」，就應該相信大陸人民有識別能力，自然會鄙視西方的一套，而崇尚中共的一套，何須擔心西方的一套滲透進來，造成精神污染呢？

39、既然西方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那般腐朽、沒落，每天都在污染着那裏居民的精神面貌，照此推論西方國家早該紛紛崩潰。爲什麼那些國家不僅沒崩潰，依然朝氣蓬勃，繁榮富強，以至中國不得不向日本貸款、和西德簽署核能協定、邀請英、法、美投資開發中國大陸的資源呢？

40、三十年鎖國，與西方完全隔絕，對資本主義世界，依然抱着「資本論」介紹的舊觀念。既不知戰後四十年的變化，也不知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已達到怎樣的水準；對於工人社會地位的變化，一概不願相信；既不相信工人代表參加董事會，也不相信工人有房屋、有汽車、失業時有社會津貼、生活有絕對保證，更不相信所謂西方生活方式不僅屬於資產階級，也屬於普羅大眾。既然如此，爲什麼也承認西方經濟發達、科學技術比中國先進百年呢？

41、十億神州，實在神秘。誰執政，誰就會精神失常，把人民看做敵人。一九四九年之前，國民黨統治時期，官方怕共產主義，怕共產

黨，怕蘇聯，進而怕俄國，不僅怕高爾基，而且怕托爾斯泰，怕普希金，誰要看這些人的書，誰就會成爲沈醉之流追蹤對象，隨時可能失蹤。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開始執政，人們以爲該有民主、有自由了，以爲只有資本主義怕共產主義，豈有共產主義怕資本主義之理？誰知中共果眞怕起資本主義來，怕西方的意識形態，怕西方的生活方式，怕西方的一切，而且越怕越甚，疑神疑鬼，以爲中國人都成了西方的污染對象，以至於必須發動清污運動。

時代不同了，兩黨却一致。這究竟執政者精神緊張，還是今日的共產黨和當年的國民黨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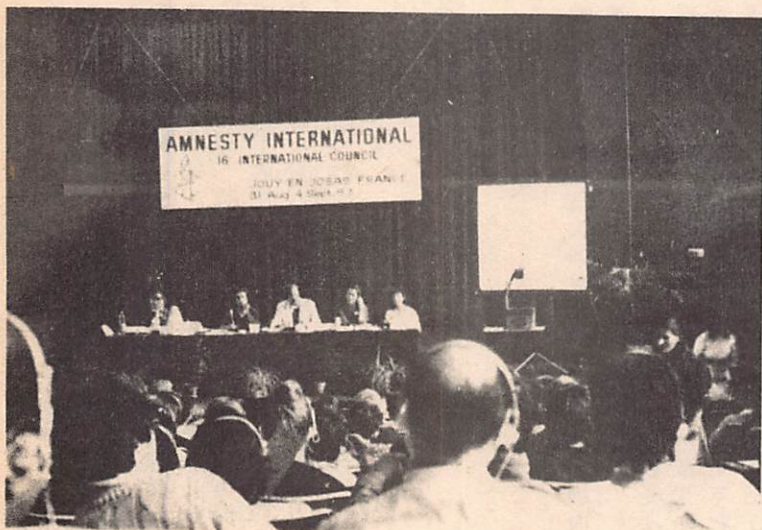
關於減罪運動

42、違法犯罪，各國都有，古今中外，概無例外。但是，爲什麼中國大陸這樣多？僅從文化大革命算起，殺了一批又一批，刑法一再升級，不知殺了多少批。然而犯罪率依然上升，達至空前的境地，以至必須發動一次減罪運動，實行更大的屠殺，以求將犯罪活動鎮壓下來。但是你是否想過，是什麼原因促使人們犯罪？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初，每次鎮壓犯罪活動，總要宣傳罪犯是受了舊社會的影響，導至思想墮落而犯罪。而今已是八十年代，建國已經三十五年，舊社會早已過去遙遠遙遠，中共的意識形態已彌漫於全國每個角落，爲什麼犯罪率不但下降，反而上升？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43、在一切罪犯之中，青少年佔絕大多數，平均年齡不過二十幾歲。他們都是「解放」後出生，紅旗下成長，從幼兒園起就接受中共的教育。爲什麼他們變成了罪犯？是什麼腐蝕

了他們的思想？以前「人民日報」報導西方國家的青少年犯罪，總要指出是那裏的社會制度所造成。而今中國大陸是無比優越的社會制度，毛澤東思想威力無窮，能使皇帝、漢奸以及沈醉之流脫胎換骨，改惡從善，重新做人，爲什麼天真無邪的青少年却走上犯罪道路？毛澤東思想這顆精神原子彈爲什麼對他們不起作用？

44、青少年罪犯之中，有許多是幹部以及高幹子弟，而且人數在急劇增加，以至於朱德之孫朱建華也墮落爲強姦而遭到鎗決。根據中國



圖爲在法國舉行的國際特赦大會。但在中國，特赦只適應於皇帝、漢奸和戰犯，而不適應於青少年罪犯。

共的理論，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共產黨的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素質更是高人一等；根據中共的不成文的法律，幹部家庭出身，稱做幹部子弟，高幹家庭出身，稱做高幹子弟。他們的身份，駕於工農子弟之上，他們「根正苗壯」，生來就是權力的「接班人」，自幼便和老子一起享受特權待遇。爲什麼如今這些人也參與犯罪活動，也成了你的鎮壓對象？

45、你敢不敢承認，今天大陸同胞，尤其是青少年犯罪，完全是現時中國社會造成的？存在決定意識，這是中共宣傳了幾十年的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任何社會的犯罪，都是社會矛盾的反映，犯罪率越高，說明矛盾越嚴重，中國怎能例外？你可以斷然否認，你可以命令宣傳家們編造一百條理由，證明大陸同胞的犯罪和中共社會制度無關，但是你能否改變當代中國犯罪率最高這個鐵的事實？

46、長年低薪制，二十年不加工資，生活水準停滯二十年，首先不能忍受的是你們的各級幹部——官僚。他們需要享受，需要刺激。怎麼辦？高層有特權，可以伸手國庫，中、下層特權小，只好自找出路——貪污。如今中共的幹部貪污，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被你鎗決者已經不是一兩個。但是處死一兩個蒼蠅有什麼用？上行下效，貪污成風，奈何？這就是造成社會上經濟犯罪的最惡劣的影響，你能否認嗎？

47、自從中共執政以來，凡因種種原因被打倒的各級幹部，他們的私生活也都被揭露出來；凡被揭露者，十之八九，生活糜爛。林彪父子、邱會作、李作鵬、吳法憲以及毛遠新（爲避免刺激，不想點其他人），莫不如此。人們不會想不到，被揭露者如此，尚未被揭露者豈非這般？前輩們既然如此，晚輩朱建華墮落爲強姦犯，有什麼奇怪？

48、毛澤東大搞階級鬥爭、路線鬥爭，一搞幾十年，搞得天翻地覆，你死我活，殘忍無比，到頭來自己承認，就是爲了一個「權」字；幾十年大批判，批倒了人道主義，消滅了人性論，煽起了階級仇恨，路線仇恨，派性仇恨，令整個社會都充滿各種仇恨，其目的只是爲推行獨裁統治。生活在這種社會的青少年，思想怎能不受到污染，怎能不去犯罪？

49、中華民族是善良的民族，民族之內稱

白色革命

生命代代相傳是一種周期性現象。但是，這種周期性現象却耗費着生命。中國社會卅多年來團團轉的變化，爲這一點作了最好的註腳。

體制改革和技術革命在眼下暫時又取代了精神污染，而成了時髦名詞。這個會振奮了至少在不在不同年代的仁人志士的口號現在又激勵着另一批人。過來人只能作一些歷史的回憶，但是，可能會從這歷史沉思中析出一點思想的結晶。

一、綠色革命與紅色革命

六十年代末，世界的農業領域，發生了一場綠色革命。掀起革命的是一批農業科學家和遺傳學家，他們通過對水稻、小麥等農作物品種的改造，達到使農作物在品質和產量上大幅增產的目的。這個目的在不少發展中的國家，如墨西哥、印度等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小小實

同胞，歷來和睦相處。古有名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太平歲月，安分守法，明哲保身。然而毛澤東出於政治需要，製造政治運動，破壞了一切優良傳統，一九六六年公然發動文化大革命，教唆青年一代去造反、去破壞、去殺戮，去做一切不人道、無人性的事，把他們推上犯罪的道路，犯下滔天大罪。這個影響，何等深遠！如今你不敢徹底批判毛澤東，却一味殺戮犯罪青少年，豈非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驗室的成果轉化爲大面積農田上的豐收，因而被譽爲綠色革命。

中國人的阿Q精神，對於別人的成就是不會相形自慚的。毛澤東會說這場革命的成果是受他的思想啟發而致的。因爲他早在五十年代便提出了農業的「八字憲法」，其中便包括了「種」字。中華民族不像日耳曼民族那樣自稱爲思辯的民族。但是，很多事情就永遠停留在抽象的思想中。提出了品種的重要，却不願使用農業科學家，而寧願「相信群眾」大搞衛星田。即使改良品種也只是依靠傳統的雜交方法，最多是吸收老大哥那邊的米丘林和李森科的方法。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階級觀點的偏見再一次扼殺了社會生產發展的機會。因爲孟德爾——摩爾根的遺傳學說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且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所以，在中國應受批判，不能研究和應用。這樣，便堵塞了綠色革命的入門。而領導綠色革命的科學家正是沿着遺傳學之門而進入的。他們正是沿着把抽

50、你會否想過，每殺一個人，造成多少矛盾？根據中共不成文的法律，一人被鎮壓，全家受牽連，一人被定爲反革命，全家成「反屬」。這樣的「反屬」，已經數不勝數，到處都有。這次滅罪，又大開殺戒，大捕大殺，殺了成千上萬，又增加成千上萬家「反屬」，又製造成千上萬個矛盾。如此滅罪，究竟是爲了社會安寧，還是爲未來的大動亂播下仇恨的種子？（待續）

● 本期專題 ●

國內來稿

象的「基因」概念具體化，即找到基因的物質基礎DNA而掌握了生命的奧秘進而改造生物的。

中國人在社會生產的飛躍中喪失了一次機會。特別遺憾的是，在中國人生存攸關的農業問題上。不僅如此，中國還在反方向上作了破壞。正當科學家在世界掀起綠色革命之時，在毛澤東唆使下，紅衛兵在全國各地製造破壞性的紅色革命。這場紅色革命不但是指六六年紅衛兵在所謂破四舊中製造紅色恐怖，它還意味着其後漫長的浩劫。綠色革命的製造者是科學家和技師。紅色革命的製造者却是無知識的暴徒和有權術的陰謀家。前者涉及的是科學技術和經濟；後者觸及的是政治和意識形態。在社會效果上，用數學語言作比喻，可以說是「絕對值相等而符號相反」。

紅色革命可以說是一場思想革命和體制革命。它在負的方向，或者說是在左的方向上走得很快，這就是現在常說的極左。如果說紅與

白是相對的話，那麼要使社會回復常態，就必須要有一場白色革命來抵消紅色革命。

二、黑色革命與無色革命

在敘述白色革命以前，還必須由農業轉到工業，說一說黑色革命。

黑色是指由黑色的煤炭，黑色的鋼鐵等所組成的重工業。這固然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但是，中國在五十年代完全學習蘇聯的模式。這不但是指五八年小高爐的全民煉鋼的極端情況，這種過份的強調延續了卅年。人多，已使我們在世界的經濟競賽跑道上顯得脚步凝重，而經濟效益低的黑色工業又使中國顯得更加笨重。黑色工業還產生着黑色的污染和公害，這也是與綠色革命相對的。

對發達的國家而言，這種黑色革命所代表的工業革命，連同更早的農業革命，已是一種歷史的浪潮，接着這兩次歷史浪潮而來的是第三次浪潮，即訊息革命。這是美國社會科學家阿爾溫·托夫勒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中所提出的。這種訊息工業與勞力密集的農業和手工業，以及資本密集的重工業都不同，它是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在這個意義上它可以比喻為無色的。它沒有田野上一片綠色的麥浪，也沒有黑煤、黑鐵和黑煙，更沒有黑色的污染。

訊息革命在西方已進行了多年。以電子計算機為主角的各種新興工業，如激光、光導纖維、遺傳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等等，已從科學家的實驗室變成資本家的新企業。能模擬人的判斷和推理等思維能力的第五代電算機正在研製中。而我們却正在起步，當然這比綠色革命之時我們還在批判摩爾根學說堵塞革命的入門是一種大的進步。趙紫陽總理對第三次浪潮

的看法，如其說是希望倒不如說是憂慮。他說：「這次浪潮對中國既是機會也是挑戰」。說機會只是一種可能性，而說挑戰却是一種嚴酷的現實性。因為訊息革命就是一種知識革命。這對共產黨人來說完全是陌生的。面對着這種知識革命，他們將會有一種時代的落伍感和被遺棄的恐懼心態。趙紫陽所憂慮的正是這一批他既不能拋棄又不懂訊息科學的科盲幹部。這是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危機之一。

三、白色革命

如上文所述，白色革命是對文革中所進行的紅色革命而言的。兩者都是涉及思想和制度方面的革命，只不過革命的方向不同。白色革命向右，紅色革命向左。紅色革命當年所破壞的對象正是白色革命的目標。（在當時，白色革命被稱為修正主義路線），而當今白色革命所破壞的對象亦是紅色革命已取得的果實。不過，不可忽視的是，雖然兩者的革命方向不同，甚至可以說是截然相反。但兩者仍是在同一個平面上。紅色革命的旗手是毛澤東；白色革命的旗手則是鄧小平。前者的旗幟是以思想性的塗料作敷色。襯上一個「公」字；後者則是以經濟性的塗料作敷色襯上一個「私」字。

紅色革命所進行的思想革命是極為徹底的。這種徹底性是指它遠離了現實，這種超越性變成了空幻的超脫性，它毫不留情地，或者應該說是粗暴、野蠻地摧毀古今中外人類的知識結晶。撇開了正確合理與否的爭論，在破壞上倒是極具豪氣的。與此相反，白色革命在進行思想革命上却缺乏橫掃千軍如捲席的氣概。顯得躲躲閃閃，拖泥帶水。他們最具勇氣的思想突破只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們不敢正面對着毛澤東思想開火，而只能兜

着圈子放冷槍。當放了這些零星的冷槍會引起群眾的萬炮齊發時，又反過來用四項原則為毛澤東思想作防禦工事，並以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來撲滅群眾反抗的怒火。白色革命在思想革命上是蒼白無力的。因為它只是眷戀在馬列主義的平台作平面的旋轉和轉向，而沒有突破平面向浩瀚的空間挺進。

鄧小平沒有毛澤東那份詩人的氣質和文學家的頭腦，他是捉老鼠的貓。所以，與思想革命上的蒼白無力形成強烈的對比，在體制改革上它却是極具色彩的。尤其是在經濟體制的改革上。因為四項原則已注定了政治制度的改革

在「白色革命」中，孔夫子重新恢復了「名譽」。圖為中共組織外賓參觀孔墓。



沒有多大的作為。辯證法的玄虛和政策的多變性已注定了不變的法治只能是一紙空文；黨的領導優先原則也決定了黨政分家只是徒具形式。這幾年所集中致力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精簡機構和幹部的「四化」，也毫無新意，而陷入解放以來的老一套模式之中。精簡機構已進行了多次，這一次也經歷以前的同一程序：先轟轟烈烈地精簡，以後又靜悄悄地自動膨脹。而幹部的年輕化與文革中的「吐故納新」沒有多大的分別，都是「揀沙子，搬石頭」的幹部大換血。不可否認，知識化算是有點新意，但却又被革命化的沉悶之氣掩蓋了。

雖然政治改革乏善可陳，但在經濟改革上却有實質的變化。之所以產生政治經濟改革不相匹配的矛盾現象，除了源於改革派本身的矛盾及調和的思想外，還因為共產黨人長期形成的政治敏感症使他們對政治的越軌行為嚴加防範。而社會已形成的「嗜左」的政治結構也為政治改革施予種種阻力。但在經濟領域上，教條相對沒有那麼多，敏感性也沒有那麼強，而最主要的是下層人民，特別是在飢餓綫上的農民，求生存的力量異常強大，形成了經濟改革的主要動力。

白色革命在經濟上迄今為止，最顯著的成績是在農村。農村經濟體制的革命是通過土地使用權的私有化，而達到架空土地所有權的公有化。並且在分配權上實行與使用權相當的私有化。這就是聯產承包的生產責任制的實質內容。這是突破公有制的最有意義的第一步。以前的溫和改革，就像前幾年在城市進行的改革那樣，在所有權的公有化基礎上按勞分配的潤色和物質刺激的調劑，是改革不徹底的治標方法，不可能取得大的成效。而作了這突破的第一步後，效果就顯著不同了。近幾年，農民生活水準提高便是最好的事實證明。

自今年中央發出有關農村工作的第一號文後，農村的經濟改革又推進到另一個更高的階段。土地承包期由二、三年延長至十五年以上，這意味着使用權的私有化年限由量變而產生部份質變——土地所有權在某種程度上也開始私有化了。而允許土地承包權的轉讓，繼承以及在轉讓中（仍然避免用土地買賣這個敏感的名詞）收取投資在土地上的費用，這些也使土地所有權的私有化有着具體的體現。除了在生產的領域內大肆改革外，在商品流通的領域

專業戶，是白色革命迄今所具發展潛力的成果。



內也開始改革。允許私人的長途販賣，私人的手工藝，運輸業等。甚至允許農民進城自辦商業、服務業和企業。在這些目前還是小型的企業中，所有權的私有化是絕對的。因為這些企業的資產完全是農民憑自己的盈餘和積蓄而私人籌集的。它不像土地是共產黨賜予農民的，背上了一個公字的包袱。這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滋生的純粹完整的資本主義的第一批萌芽。因為這些企業的生產品完全是商品，而資產也是私人所有的。只是它的規模仍很小，受僱的工人也只限幾個，所以只是一種資本主義的萌芽。這種萌芽——現在稱為專業戶——是白色革命迄今所取得的最具發展潛力的成果。

由合作化起經過公社化和大寨化的農村紅色革命，曾把單幹戶變成集體戶，只是在六十年代初有過一短暫的彈性回復。而白色革命則在首先作了還原，即變集體戶為承包戶後，又作了進一步的推進，達到專業戶的階段。按照這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專業戶勢必最後蛻變為農場主和企業家。

四、城市之光

如果說白色革命在農村繪出了斑斕的色彩。那麼，它在城市却只散下了一片白色的朦朧。只是在今年才露出了一綫曙光。

曙光首先是從外部投射進來，這就是對外開放。開放的地域擴大了，由四個經濟特區的一點一擴展為沿海十四個大城市的「綫」。限制亦放寬了。對外資而言，可以允許獨資經營。對其先進技術的產品可開放部份的國內市場，即獨資或合資的企業，其部份的先進產品可以內銷。在稅收上享受更優惠的待遇，在出入境上簡化手續；對開放的港口城市而言，意味着更大的自主權。

開闢經濟特區，允許資本主義的企業在中國獨立經營，這無疑是在社會主義的國度內樹起一個個資本主義的橋頭堡，影響是巨大的。它不但影響市場，也影響技術界，在管理體制上，影響着社會制度。在意識形態上，影響着人們的思想、信心和信仰。也唯有在開放上作這一突破和找尋外來的刺激，才能振動在城市中已根深蒂固的公有制。改革之所以首先在農村進行而在城市却反反覆覆和停滯不前，這是由於農村由歷史所形成的內在生產結構是私有者的生產結構，當強加在其上的官僚政治結構一旦放鬆，作為官僚政治結構在農村的表現形式人民公社一旦撤消，內在結構就自發地強勁表現出來。而城市的生產結構，由於資本家早已被剝奪，他們不可能像農民一樣，仍保持着潛在的私有者的身份。他們連潛在的資本家的一點踪跡也早已消失了。而經過卅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公有制在城市已打下了穩固的基礎。要震撼這個基礎需要國際資本主義的衝擊，而對外開放則打開了這個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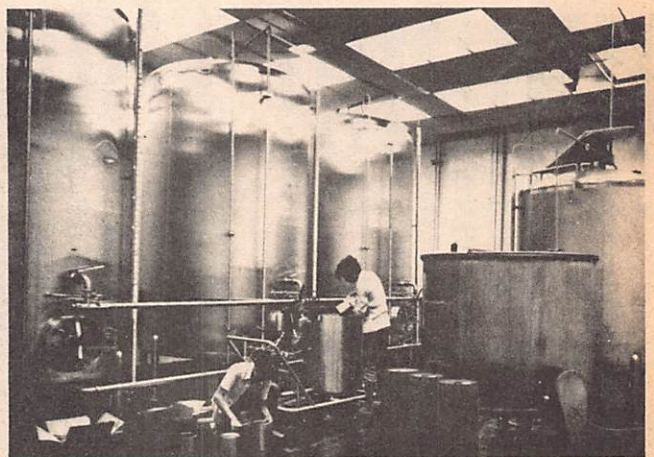
當然，盡管國際資本的引入對古老的中國是一種新的刺激，但相對於中國廣大的地區而言，畢竟在全局上和靜態上的影響是有限的。變化還得依賴城市本身的經濟制度的改革。給予工礦企業更多的自主權，雖然早在七九年便開始了，但是在計劃經濟編織的鳥籠的限制之下，改革的範圍是狹小的，經濟效益與之相對應也是微小的。直到今年，城市經濟改革才露出良性的端倪。在六屆二次人大上，趙紫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佈決定加快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步子。準備把前幾年零敲碎打的各項改革措施初步配套起來，這種個別具體改革措施的配套，就有着改革體系的一些味道。其內容包括從今年第四季度開始，進行利改稅的第二步改革，即從稅利並存過渡到完全的以稅代利。

國營企業依法納稅後的利潤留歸企業完全支配。當然，從支配——分配權的角度看，這種改革的層次只是相當於六十年代初在農村實行的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水平，遠遠落後於目前農村私有化上所達到的水平。但是由於兩者的起點不同，由國營企業的全民所有制到以稅代利，其變化亦是相當大的。以稅代利的意義除了打破在企業之間實行「大鍋飯」式的平均主義，刺激企業間的競爭和取得活躍市場的經濟效果外，它更重要的意義是打破官僚政治的支配結構。在過去的體制下，企業賺得的利潤，要全部上交國家，只留極小一部份作獎金和資金。在這裏完全或者甚少顯出經濟的權威，而只有政治的權威。現在以稅代利，國家和企業的聯繫就減弱了行政命令的方式。這就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與私人企業關係相似。雖然我們的企業並不是私人企業，政府也不是嚴格奉行不干預（在政治上）政策的政府。稅是國家與企業的最佳聯繫。它以定量的嚴格方式取代了毛澤東的國家、集體、個人的「辯證」關係的定性的方式。稅，把金錢的地位提升而把行政的地位降低。

取消獎金的封頂，企業對工資、獎金的發放有自主權。這是對分配權的一大突破。城市各業中，首先在建築業實行全行業的改革。推行投資包幹制和招標承包制，這在支配權（使用權）的角度看，已達到了前幾年農村的承包制的水平，它的全面推廣就會像農村那樣，由支配權的變化進而引起所有制的改變。在所有制的改革上，另一緩慢可行的方式便是在企業內發行股票。這已在某些企業內開始試行了。遼寧省朝陽重型機械廠就試行了一年職工投資入股。結果八三年利潤比八二年增長百分之六十九，而入股的職工每百元股金分得紅利十七

元九角，比銀行利息高三倍。

假如在國營企業中，國家把原屬全民所有的廠房，設備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賣給企業所有，不是僅僅作承包而只賦予使用權，企業在每年以固定資產折舊的方式攤還給國家，另外再繳上應付的稅。除了這兩點金錢上的債務關係外，企業完全自主，自行決定產品的種類和數量，放在市場上競爭，把其所得之利潤自行支配。分配比例將會是用於工人個人工資和集體福利的佔大部份，而積累佔少部份。這種分配結構並不會影響擴大再生產，因為通過發行股票的方式，只要企業盈餘利率好，工人的工資的一部份又會重回到生產中去，但這種積累方式的轉變却與以前有根本的不同，它把權力真正落實到工人身上，這是以金錢的方式而不是以虛幻的主人翁政治身份的方式去體現的。真



廣州罐頭廠與美國百事可樂有限公司合作興建的飲樂汽水廠。

正保障了高經濟效率的實現，而避免了計劃經濟的必然誤導和官僚政治的干涉。即使工人的收入不大部份入股，他們的高消費能力亦能產生市場的需求從而刺激生產。總之這種個人分配結構終於通過曲折的形式反饋到生產中來。在供股中，每個工人是有差別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由於對盈利的貢獻大，分配也必然多，他們也自然最樂意大量地供股。在股金中差別積累到一定程度，大股東必然產生。也就是說非純粹個人的集體資本家也就會產生出來了。

目前以稅收作中介的承包制與所有權的贖買制還有待改進。而贖買制又與股份公司形式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有着一道天塹。當然這道天塹有變為通途的可能，但不是必然。

白色革命照亮了曾是「萬家墨面沒蒿萊」的黑暗中國。在農村已現出了朝霞。而在城市中，也在濃雲中露出了兩道曙光。這兩道曙光其中一道是因打開了窗口從外面透射過來的。而另一道則是內部通過體制改革而從自身散發出來的。但是兩道光綫的頻率即色彩却是一樣的，就是金錢、資本的色彩。

五、常規革命

對落後的農業國，白色革命比七十年代的綠色革命的影響還大。畢竟印度、墨西哥等國的農業人口總和還不及中國農業人口多，而所取得經濟效果也不會遜色。白色革命在城市上雖然幾經反覆，且目前尚不能與「無色革命」對西方的影響相比，但其趨勢却蘊含着巨大變化的可能性，不應低估。

白色革命雖然與紅色革命相比有着顯著的成績，但是我們不應忘記，兩種革命都是在馬列主義的「規範場」控制之下，它們都是一種常規革命。這種規範就是一種固定的內部基礎

結構。在內部基礎結構不變，即規範不變的前提下，作外部形成變化的是一種常規革命。只有作內部基礎結構的改變，即作建構革命，才是變規革命。

因為它與紅色革命一樣，都是建立在固定不變的官僚政治結構之上的，這種不變是從本質上看的，而不是從形式上看的。說得更精確些，我們是從結構變化中再細分為結構再生和結構崩潰兩類的。即使結構名稱和形式發生變化，如果只是結構再生，則仍是常規革命。

四九革命也可算是紅色革命，它打破了國民黨的官僚政治結構，可以說是翻天覆地的變化。用歷史眼光看，它仍是常規革命，因為它並沒有打破中國幾千年來以官僚政治系統控制社會內其他兩大類學系統——經濟系統和文化系統——的「規範」。作一個比喻，量子理論中的規範場是以一個複雜的方程式來決定其結構的，社會也應有一個更為複雜至今仍無法以數學形式表達的方程式來決定社會的規範；四九革命並沒有改變這個方程式，它只是改變了政治變量的輸入量，而政治變量對經濟變量和文化變量的「強作用」的機制並沒有改變。它只是以共產黨的強作用取代國民黨強作用而已。

六六年起的文革也是一樣，雖然它亦打破了劉少奇為代表的官僚政治結構，八個月之間在奪權的號角聲下，國務院各部、各省委和省委全部癱瘓，純從外表看，真是一場結構大變動。但它實際上也沒有改變這個古老的中國方程式，它也限只把政治變量的輸入量作改變，而引至經濟變量和文化變量的大變動。它只是把共產黨的極權作用改變為毛澤東個人及文革新貴的強作用而已。社會的機制完全沒有變動。政治變量仍屬「強作用」，而經濟變量和文化變量則仍屬「弱作用」。

這次的白色革命也是一樣，雖然打倒了四人幫，趕跑了凡是派和保守派，政治變量的輸入改變了。但社會的機制仍是一樣，古老的中國方程式仍是百試不爽。對以魏京生為代表的民主運動的殘酷鎮壓暴露了官僚專制政治的本色。農村的改革，在鄧小平這個絕對政治化了的人物看來，只是加強新的官僚政治的一種手段。他把帶有一點自由和私有味道的糖果換來農民的擁護。經濟的季節性的碩果變成了政治鬪爭天秤上的砝碼。官僚政治結構的觸爪，由人民公社改換為區政府、鄉公所和村公所。它仍在起作用，只不過現時不是大喊大叫，而只是作三級戰備的密切注視。它們正注視着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程度是否達到「兩極分化」的警戒綫。最可怕的是，這條警戒綫是隨官僚之意而任意定的。反精神污染運動時已作了一次戰備演習。因為農村改革所取得的一點點私有化是沒有結構基礎的。既不是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經濟是強作用上和政治是弱作用的社會結構上的。

城市的改革也同樣會在政治強作用之下受挫。七九年工業體制改革的暫停已是一個例證。

所以，如果不在結構上改變幾千年來中國的古老方程式。作一次變規革命，把政治變量限入弱作用的範圍而把經濟變量放為強作用的範圍，中國便永遠沒有希望。白色革命之所以給予我們希望，並不在於它目前所取得的成效，希望不在於目前的現實性，而在於一種可能性。因為目前的變革和成效，為變規革命創造了一種氣氛和可能性，但這可能性如仍由官僚政治結構所控制，則永遠不能變成現實性。變規革命的實現有賴於民運戰士所為之奮鬥的民主政治的格局。■

新舊「洋務運動」的前因後果

白芒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在國內，無論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這些政策對現代化的建設起了一定的作用。到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更制定了：在本世紀末實現工業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總目標，提出要加強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為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全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三大任務。這些總目標和任務，要靠以前的政治、經濟政策來實現和完成，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就是要實行進一步的改革。在這個改革的大前提之下，朝那個方向改？怎樣改？這都是一個不易解決的問題。按照統治集團的首腦們的一廂情願之想法：政治上要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繼續走共產主義道路，而經濟上則對外開放，對內允許一定程度上資本主義的經濟橋樑走入共產主義的理想天堂的目的。由於這種想法和做法，和近百年前的「洋務運動」有很多相似之處，故此，海內外的不少學者、關心時事的人們都稱這次改革運動為「新洋務運動」。事實上，歷史上的重覆、類似現象是相當普遍的。我們不妨先從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洋務運動談起。

百年前的「洋務運動」

中國人之所以要推行洋務運動，完全是基於中國的文化、科技相對地落後，企求迅速改變之故。

從明朝建立到清朝中葉鴉片戰爭的四百餘年間（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八四〇年），出現在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萌芽一直得不到應有的營養，無法成長。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却走過了資本主義從萌芽到成長、發展的階段。他們很快地擺脫了中世紀以來的落後狀態，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生產發展和科學技術、文化進步起了互相促進的作用，使原來的封建帝制已無法適應，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更有助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這種迅速發展的經濟，為了謀求更大利潤和開拓市場，在政府的鼓勵之下，很快把他們的觸角伸向了全世界。也伸向了古老而封建的中國。中國的靜止、甚至倒退，使東西方的落後和先進的差距越拉越大，正是在這段歷史時期內，中國丟掉了它的先進地位而變成了落後的國家，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却逐漸超前，變成了先進的國家了。

國家地位的改變，也帶來了人們的思想的變化。明朝到清初數百年間，中國人仍以正統自居，傲視其他國家和民族。自從一五八二年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來到了中國，在傳教的同時，帶來了西方文明。中國方面，對這些西方文明、特別是自然科學是有所需求的，這也是西方傳教士們得以立足的原因之一。這些傳教士們，既是宗教家，同時也往往是數學家、科

學家一流的人物。他們為了便於傳教，也順從了中國人的習慣：習華言，易華服，讀儒書，從儒教。他們之中很多人都終老於中國。他們的思想和學問，給閉塞的中國學術界帶來了新的觀念。一些先進的學者、科學家吸收了外國人的研究成果，推動了中國的科學技術向前發展。如徐光啟的「崇禎歷書」、「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薛鳳祚的「歷學全通」；王錫闡的「曉庵新法」和康熙皇帝主持編纂的「數理精蘊」等，都可以看到西學給中國科學技術帶來了良好的影響。

由於西方國家的經濟迅速發展，輸入的商品越來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國內的工商業。以大興文字獄而留名千古的雍正皇帝，對外實行了閉關自守的政策。竟以：「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等為理由，封鎖海岸，實行海禁，驅逐傳教士，拒絕與外國通商，拒絕西方科學傳入。同時，對內殘酷迫害知識份子，大興文字獄，窒息了整個學術思想界。以後的一百多年間，使原來封建落後的中國更顯得落後，中國人對西方的科學、西方的社會發展之認識達到了無知的境地。即使那位以英明幹練名於時的官員如林則徐，對西方社會也茫然不知，故此也曾鬧了：聽說這些人的腿部裹束甚緊，打仗時只要用長竹桿把他們推倒，他們就再也爬不起來了……一類的笑話。

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迫使中國的閉關

自守政策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中國人的長矛大刀再也敵不過西方列強的船堅砲利。面對列強的侵略和瓜分，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社會從朝廷到百姓，都滋長着對「洋人」又怕又恨的情緒。部份先進的知識份子提出了要向西方學習的要求，從而發生了十九世紀六十至九十年代的所謂「洋務運動」。

最初的「洋務運動」，中國的一些知識份子還沒有覺悟到文化科技上的巨大差距，往往憑自己的主觀臆斷去生硬模仿。據說：曾有些官員依照外國人的軍艦的外形做做了一只小型的船艦，他們還估計外國人用的是牛力去推動的行駛，也就費盡了苦心去做了一些人力上的安排，結果，船艦做成之後，當然不能行駛，只能成了外國人取笑的話題。

逐漸地，中國人從直接購買西方國家生產的成品去裝備自己，到漸次引進西方科學技術，自行生產了。這樣，洋務運動也由着重於西方之武備而逐漸轉化到自行辦工廠、開礦山、修鐵路、辦電報等層次了。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三四十年之間，洋務派通過創辦工礦企業，引進了一批近代技術：六十年代開始興辦的兵工廠，如安慶軍械所、江南製造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械局等，都採用比較先進的機器，一八九〇年建成了的中國第一座煉鋼平爐，一八九四年建成了湖北漢陽鐵廠，成爲了中國第一座現代化高爐……這些設備，在當時來說是相當先進的。

與這些設備和先進技術同時輸入的，就是西方的民主思想。在洋務運動的三四十年間，國內成立的翻譯出版機構有：墨海書館、京師同文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廣學會等。這些書局所譯書籍以科技書籍爲主，也翻譯了不少科學、哲學、和其他介紹西方思想意識的書籍。如一八五一年翻譯出版的「談天」，一八七

三年翻譯出版的賴爾的「地學淺釋」和以後由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等。同時，官費和自費到日本、歐洲、美國的留學生也逐漸增加，雖然這些留學生以研習科技爲主，但是，無可避免地，西方的思想、意識就通過了各種各樣的渠道影響到中國社會，成爲了以後的維新運動的思想基礎。維新運動是洋務運動達到高潮、中國社會在經濟上受到西方影響的同時，思想、政治以至整個政體也受到了影響，從而不能不發生巨大變化以適應經濟體系上的變化。

「洋務運動」的歷史背景

本世紀以來，中國人在介紹西方思想、科技、文化方面，比起上一世紀更爲積極。中華民國成立之後，雖然神州大地仍經歷着軍閥混戰、日本侵略的災難、西方的影響却沒有因此而減弱，中國的工業、科技在這艱難的環境下，仍能有所發展。西方的思想、文化傳入中國的渠道一直保持暢通，到了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使這些渠道日漸被封閉了起來。

五十年代初期的朝鮮戰爭，中國共產黨從上到下，都滋長了嚴重的仇恨美國、仇恨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情緒。近百年來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侵華歷史，很容易助長了中國人的偏見，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之首腦人物，都失去了冷靜分析問題的能力。蘇聯共產黨人利用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這種偏見，打着「社會主義陣營」的招牌，充當了這個「陣營」的老大哥。在共產主義之共同理想的精神煙幕之下，誘使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上、思想上以至經濟上、科技文化上全盤否定西方，全盤以蘇聯爲楷模。大肆鼓吹：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強行把中國各種制度扭轉過來，沿着蘇聯

人的腳踪走去。

因此，五十年代的朝鮮戰爭，可以說是西方文化在中國影響的收斂時期。中國人從自覺接受西方文化轉而變成盲目模倣蘇聯的體制，中國在變成蘇聯的殖民地的泥坑中越陷越深，中國共產黨人實質上成了蘇共統治這塊殖民地的代理人。蘇聯人在中國的專橫跋扈，直接危及了中共領導人的利益，迫使以毛澤東爲首的領導集團不能不謀求自保，起而對抗。對抗造成了矛盾的加深，中蘇兩國共產黨的分裂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中共唯一的國外先進科技來源也喪失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並沒有從其他西方國家再度尋求來源，却以「自力更生」爲口號，施行了一系列二十世紀的閉關自守政策。

從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開始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的近二十年間，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情，跟兩百多年前的乾嘉時期是頗爲相似的。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歐美等西方先進國家的、蘇聯的及本國吸收了外國先進技術而創造的都被斥爲「帝、修、反」的東西，受到排拒。鼓吹「土洋並舉」（土比洋排在前面）、「土法上馬」。把點滴的成績肆意誇大，自我吹噓，以此作爲拒絕外國科技文化傳入的理由。自以爲「凡是外國人能製造的，我們都能製造」，拒絕與外國通商來引進外國科技。對知識份子的迫害、大興文字獄方面，更是雍正皇帝所望塵不及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後，不但介紹西方思想的書籍完全絕迹，連介紹外國先進科學、技術的書籍也絕了迹。除了「紅寶書」到處泛濫之外，即使討論馬列主義的理論書籍，也不易找到。當年的乾嘉學派選可以埋頭於古書堆之中作煩瑣的考據，而這時候在中國生活的十億人民，只能去啃一套「紅寶書」。這與西方國家在科技上進入了太空時代，

政治上多黨派的自由競爭，國家法制的日益健全，民主思想的日益活躍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語了。

「四人幫」倒台之後，華國鋒爲首的領導集團，當然發現了本國和外國的巨大差距。中國極度落後的經濟和中國人民的貧窮，早已潛伏了中國社會即將發生動亂的危機。要挽救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就必需解決中國人民對生活之最起码的要求。但是，由於多年來的積習難返，共產黨人對適合本國的經濟計劃欠缺起碼的研究，因而在中共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毫無根據地宣佈要在幾年之內，建立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氣田、三十個大電站等等……同時，一九七八年一年就簽訂了遠遠超過其國家擔負能力的二十二個技術引進項目。積累在國民收入中所佔比重，從一九七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二點三劇增至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三十六點六。

這樣的指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一些中共領導人指責爲「左傾」思想造成，這只能作爲黨內鬭爭的口實。事實上，要迅速發展經濟，是關係到整個社會制度、思想體系、文化、科技水平的改進的大事情。指標之制訂固然重要，但欠缺了這些基礎，任何指標只能是空談。華國鋒的失敗給中共領導集團的後繼人以一個教訓：使他們不但從制定指標上去考慮，而且要從培養人材、引進外國先進科技、外國資金、以個體經濟去刺激生產等方法去發展經濟，來考慮、推行新的政策。

近五年來，中共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派遣公費留學生和交換學者到國外去，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並且，不再以「無債之國」自居，而大量地吸收外匯，吸引外國資本到中國大陸來投資。爲了給這些投資方便，而在全國

開放十多個特區，並對投資者千方百計以安撫。在介紹外國先進科技方面，增加發行了多種刊物，大量翻譯了國外的科技書籍……等等，這些作法，對提高中國的科技水平，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是有好處的。但是，令中共領導集團驚心的是，這些先進科技引進的同時，西方的思想影響，誘導了中國人民去思考、去探索。中國會不會像波蘭團結工會那樣去反抗專制的統治？中國人民會不會起而要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從而動搖了共產黨的統治？當年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跟現在的「以外國的先進科技來爲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服務」是何等相似；當年的洋務運動導致了維新運動，以至辛亥革命，現在的新洋務運動會不會導致危及共產黨統治的革命？這都大大困擾着中共統治集團的執政者們。

新舊「洋務運動」

都導致社會重大變革

十九世紀的洋務運動孕育了維新運動，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洋務運動的推行，人們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的認識日漸加深，中國的知識份子已不能滿足洋務運動那種只顧購

「洋務運動」導致重大社會變革，圖爲「洋務運動」失敗後所引起的「戊戌變法」的領袖康有爲。



買洋槍洋砲，單純引進技術的作法了。他們認爲只引進而不改革，只能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洋務運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國的軍事實力，但在跟外國人開仗時，中國仍經常敗績，這使中國知識份子醒悟到：「泰西之強，由於學術……」，康有爲在總結洋務運動的經驗後，更提出了：「請皇上統籌全局，商定政體。」批評洋務運動是「變事而已，非變法也。」嚴復更認爲洋務只是學到西方的「皆其形之粗述，而非命脈之所在……」。他們把洋務派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思想轉而爲改革中體，以用西學。也就是說，要求中國社會政體上發生重大的變化，以適應發展之需要。這就是十九世紀末葉中國社會之維新運動。

從近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可以清楚看到，他們一方面要堅持原來的社會制度，另一方面是借用西方科技去發展經濟，去搞四個現代化，這跟「洋務運動」實在有異工同曲之妙。他們也本着變事而不變法的用心來施行所有的政策。這樣做，必然會重蹈洋務運動之覆轍，中國之科技永遠只能學到外國形下之粗述，而非命脈之所在的。因此，不少有先知卓見的中國當代知識份子，提出了新的學術思想和政治主張，以適應社會發展之必需，這就是近年來中共統治集團中的頑固守舊份子所深惡痛絕的「異化論」和「精神污染」。

異化論者提出了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由於社會的發展，由本身的理論而產生出一種反過來與原來之理論相矛盾的理論。雖然中共之頑固派一再否認異化存在於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事實上，「異化論」本身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共產黨推行新洋務運動之時，所產生出來的反對原來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之理論產

跛脚的社會在蹣跚

國內來稿

一、跛脚狀態

近幾年來，任何尊重事實的人都不能否認我們的國家是前進了。但是，我們的前進却有點像跛子走路一樣，搖搖晃晃，極不穩定。這裡，還不把左右搖擺和進進退退的反復算在其內。

前進依賴改革，否則保持毛澤東過去那一套體制就只會停滯和倒退。但是我們的改革呈現不匹配的狀態，所以我們的前進便像跛子走路一般。

不匹配的狀態表現在兩方面。首先是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不匹配，如果把這兩種改革比喻為支持一個人走路的兩條腿，那麼我們就不是兩條腿走路，或者說有一條腿跛了。這條跛腿就是政治改革之腿。政治改革之腿由於綁上了四項原則的沉重負荷，始終不能作民主化的起步。它只能作權力在個人和派系間轉移的遊戲，最多搭配一些年輕化、知識化和法治化的魔術。經濟上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就這樣被政治上的反民主化所拖累了。

不匹配的狀態還表現在另一方面。在經濟體制改革上也是不匹配的，這就是城市改革與農村改革不匹配。本來二者的改革在時間上是同時起步的，城市改革以趙紫陽在四川的企業中推行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農村改革以萬里在安徽省搞農村生產責任制開始，兩者都在七八至七九年間。但企業擴大自主權的試驗在八

○年後便受到抑制，更不能在全國推廣，而農村的生產承包責任制，却像燎原之勢，在全國農村展開了。現在承包制由於年期的延長而出現了轉讓權、繼承權等私有制下才會出現的關係。而脫離了土地的某些專業戶（如從事長途販賣和運輸，商業和作坊工場等）則徹底掙脫了極權政府套在農民身上的經濟繩索，成為完全的私有者。這是資產者的萌芽。

跛脚狀態之所以存在，其原因是值得深究的。目前，政治改革的跛腿並沒有任何痊癒的徵兆，而經濟改革中，城市體制改革的跛脚却顯示了一些良性變化。城市體制改革的口號，在六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成爲一個主調。由七九年開始的企業改革的第一次浪潮，經過調整時期的退潮後，現在似乎又開始掀起第二次浪潮。如何評估第二次改革浪潮，回過頭來分析跛脚狀態的成因是有所幫助的。

二、第一次浪潮

第一次企業改革浪潮最早起於趙紫陽當時管理的四川省的部份企業，以後則只是在全國六千多個國營企業中試行。在全國的卅五萬個國營企業單位中，這只佔約百分之二、七的小數。

在這麼小的範圍內所進行的改革可稱爲一次浪潮對中國經濟結構有所衝擊，這就像投石於死水塘中所引起的水波蕩漾一樣。雖然實行改革的企业所佔的比例少，但改革的内容對於

三十年來已定型的中央集權經濟結構無疑是一次震撼。這次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擴大企業的自主權。這種自主權包括對留成利潤，對超額產品，對企業自身集資的生產和銷售，對獎金的分配諸方面的自決權。這種企業分權經濟對中央集權經濟當然是一種挑戰。

這場城市企業體制改革不但在企業中引起變化，在經濟理論界也掀起了爭論。胡喬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關於市場經濟的長文，許蔭新的論著以及其他一些經濟學者的文章都爲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的經濟中爭得一席合法的席位，但這個席位重要到何種程度，是主席團的席位，圓桌會議的席位還是會堂角落的陪襯席位，却衆說紛紜，莫衷一是。除了像劉國光那種提倡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並行的少數激進經濟學家外，大部份都屬穩健和改良派。他們雖然同意社會主義經濟應是混合型的經濟。但對於這種混合的比例，他們却不願作多大的突破。他們把指令性的計劃經濟置於主席位的席位，因爲對國民經濟舉足輕重的大企業都受這種計劃經濟支配。指導性的計劃經濟置於普通席位上，因爲數目最多的小型企業都要受這種控制力稍爲鬆一點的計劃經濟的指導。而無關宏旨的農村的副業和手工業才受市場經濟的支配。市場經濟實際上是處於附加席上的位置。

在這場論戰中，改良派的經濟學家勝利了，這不是來自理性的勝利，而是政治的勝利。當時的改革出現了從政治角度看是混亂的局面。由於企業完成了國家下達的任務後，可自行生產市場需要的產品，並自行拿到市場銷售。那些有利可圖的項目便一窩蜂地上，很快便出現了供過於求的現象，商品價格下跌，商品滯銷和積壓。不錯，這是價值規律的體現，但却不是價值規律的錯過。因爲這一消極的現象只是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全部過程中的一個短



企業沒有自主權，技術人員無用武之地。

暫的階段，只要不固定這個階段，仍繼續讓價值規律自由地發揮作用，它很快就自動矯正，企業在吃了這個苦頭後很快轉而生產市場需要的產品。但是，由於長期以來國家控制了流通的渠道，使之單一化，產銷脫節，市場上的信息不能迅速反映到企業中，這種信息傳送的遲誤造成了商品的大量積壓，而保守派就只着眼於這暫時的混亂，把罪過歸於市場經濟身上，不讓市場經濟自動消除這種混亂。相反，却

消除市場經濟的影響，把不可分割的完全過程在半途便煞車。

混亂的另一些表現是由於提成後的利潤，企業可以自由動用。不少企業把這些資金不用於擴大生產上，而用於建築住房上，這引起了建築材料的嚴重短缺，並影響了國家基本建設進度。當然即使用於擴大生產的，也會造成投資項目的重複，和國家大型工程爭材料。另外，由於企業可自行處置獎金，引起了所謂「濫發」獎金。人們手頭的現金多了，但物資供應卻沒有限得上工資加獎金的增長速度，於是——一直認為只有在資本主義國家才會出現的通貨膨脹現象便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

自主權在擴大再生產上的運用，在半途中引起商品積壓和影響大型企業的基建速度，這還只是經濟的損失。而自主權在消費上的運用，引起通貨膨脹，却就是危及政治上的穩定和利益了。因為通貨膨脹，物價上升，就影響了人民的基本生活。要知道，毛澤東政權，盡管極不合理，却能在存在了廿七年，文革的動蕩仍未把社會拖進崩潰之淵，其原因在於毛澤東深諳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理，維持了基本生活物品價格長久的不變和低廉，使他們不至餓死。如果在這一點上發生了動搖，維繫政權的基礎就會搖搖欲墜。正是出於這種政治的考慮，改革派和保守派一致同意把城市改革作急剎車，第一次浪潮便在政治的引力下作了退潮。活躍的市場經濟再次被捉回計劃經濟的鳥籠之下蟄伏。

三、潮汐的機制

地球上海水的潮汐變化，是純粹的自然現象，雖經科學家幾百年來的研究，其機制已大概清楚。知道主要的原因是地球與月球因公轉

和自轉的位置變化而使引力變化所致。但精細的機制還仍有待探究。

改革，在中國近年也有潮汐的現象。這一社會現象機制的要因，是政治引力的變化，這就像海水潮汐中萬有引力是主因一樣。

但是精細的機制分析不以這一主因的發掘為限而滿足。上文曾分析過導致第一次城市改革浪潮退潮的表面結構是經濟混亂——商品積壓，原料（特別是建築）短缺，物價上升等。附帶的還有社會秩序混亂——貪污走私、經濟犯罪和治安奇差。

在由表面結構（客觀現象）推演至內部結構（理論解釋）中，由於使用了政治的價值尺度，由價值規律主宰的市場經濟，在其發展全部過程中的某一中間過程的現象被固定下來量度，則成爲一種經濟失誤和罪過。而這經濟失誤和罪過經過政治濾息鏡的分解而析出對極權政治的破壞力量。所以，改革浪潮便被壓下去了。

在這裡，還忽略了一個環境的因素。事實上，混亂的局面並不應單由市場經濟的中間過程負起。以往經濟所造成的既成環境因素應負很大的責任。三十年來按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再加上毛澤東的小農經濟和空想經濟所形成的固有的經濟結構，本身就產生着很大的經濟混亂，更不用說週期性的大破壞和長期慢性的停滯了。附在宏觀經濟結構上並以此爲支架的微觀經濟的任何改革，都對全局起不了根本性的作用。七九年開始的城市企業改革，主要是改革微觀經濟，所以這種改革是本末倒置。八〇年起，在陳雲的力主之下，把城市改革凍結，奉行以調整爲主的經濟方針。從泛政治的角度看，這個經濟方針當然也有政治意義，調整的目的在於打倒以華國鋒爲首的凡是派，經濟改革作爲掩飾派系鬭爭的堂皇理由。從經濟

角度看，却也有一定理由。第二次八字方針（第一次爲六〇年時所提出）中，調整先於改革，就是理順宏觀經濟先於搞活微觀經濟。

明白了環境因素，亦即宏觀經濟的作用，不但可以更精細解釋第一次改革浪潮何以會退潮，亦可明白第二次浪潮怎麼又會再度興起。

四、第二次浪潮

城市企業的體制改革，在今年再度興起，並已成爲在全國展開的浪潮。

如明白上文所分析的改革潮汐的機制，就不會對第二次浪潮的產生覺得奇怪。

首先，經過自八〇年起近四年的調整，國家的宏觀經濟，相對於毛澤東時代，已算在一定程度上梳理好了，這樣就爲產生經濟破壞和混亂的主要因子作了一次掃除。痛苦的時期已經太長了，它需要一個興奮的時期作補償。

目前的經濟形勢與八〇年大有不同，當年國民經濟的最大痼疾是一個動脈和腸梗塞的宏觀經濟，現在，國民經濟的最大弊病却是一個沒有效率和活力的微觀經濟，所以搞活微觀經濟，改革企業體制就作爲中心任務而提出來了。而且，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也起了鼓舞的作用，於是，鬆綁的呼聲此起彼落，最先是福建五十五名廠長、經理聯名寫信給中共福建省委要求給予他們必要的權力。北京市王府井大街十五家商店的經理亦自動集會要求上級鬆綁。

改革浪潮的興起，除了以上的經濟原因和企業管理人員的壓力外，改革派在政治結構中取得支配地位，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而幾年的開放政策，外資、技術設備和資本主義管理體制及思想對國內的潛移默化作用，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此次企業改革浪潮，涉及企業單位的數量，和改革的實質內容，都比第一次浪潮有較大的提高。

第一次浪潮中只開闢了四個經濟特區作爲對外開放的點，而這一次再加上了沿海十四個港口城市 and 一個海南島，這已由點擴展至綫。



城市體制改革的集中點，也由四川重慶市擴大到武漢市和南京市。而六千多個試點的企業鋪開到全國所有的企業。

改革的原則，即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在第一次改革中集中體現在利潤上交後的留成處置權上，但這一次却集中在稅收上。這是一個實質的進步。因爲「生產任務」體現着通過計畫而顯示的中央權力，它是一種行政力量的象徵，在中國還往往與政治權力合爲一體。而且任務是一個主觀的因素，起碼每年都會變化的。但是，稅收却體現着一種經濟的力量，它同時並不象徵着中央的權力，因爲稅收是爲了全國性事業和全民福利所必須的。任何的社會都會有着這種稅收，而且稅率一經確定，便不會年年變化。這樣，企業就有了一個可以計算的基礎，可以作長期性的籌劃。

五、先天缺陷症

第二次浪潮既然比第一次浪潮處於更高的層面上，那麼，它的後果將如何呢？

雖然趙紫陽在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這次改革要具有全面性，要在人事、財政、物質和生產，供應，銷售中全面放權。不少經濟專家也要求企業改革須同步。中國工業經濟研究會在四月廿三日在京舉行座談會，國家經委體制改革局經濟學家王樂梅說：「……：單是一個工廠或者一個工業部門，單是在一個工業管理體制上進行改革，只能是一時的突破，結果可能遭到失敗。」但是，在這方面仍然是拐子走腳。在改革中最大的缺陷在於價格體制。趙紫陽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意識到這是一個痼疾，又是出於政治利益的考慮不敢動大手術。他說：「……：價格體制是不合理的，」但也不會全面修訂物價體制，以避通貨膨脹之嫌，這也是

第一次改革利率的原因。而經濟學家千里駒則說得更坦率。他說：「……中國的價格與價值背離，價格不代表價值，因而難於利用價值規律這個槓桿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遲早是勢所必行的」。

如果價格體制不是由價值規律在市場中決定，那麼它就是一種政治因素而不是經濟因素。它是由行政機構制定的，幾十年都沒有多大的改變，而行政機構只是按黨中央的意旨去執行而已。這個價格決定的原則，表面上是出於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考慮，實際上却是出於為維護官僚特權階層的統治穩定而考慮。把一切政治的因素排除，換上經濟因素的改革，保留這樣一個由政治因素決定的價格體系，它到頭來就會把一切改革的成果慢慢吞食，它會把一切經濟因素再度政治化。比如說，「利改稅」是一個很好的改革措施，但是，由於價格訂得不合理，利潤便不能正確反映出來，而稅率也就很難訂出一個合理的標準。這樣，這種有力的經濟槓桿便不能刺激生產效率的提高。那種修補的辦法，如規定有「政策允許的虧損」以及相應不合理價格而調低稅率。這都是人為的，實質是政治性的因素。在如此複雜的經濟社會中，不要說人，再高效率的電子計算機也不能找到這樣一個合理的稅率。這就像以前的計劃委員會永遠不能制定一個合理的計劃一樣。而「利改稅」達不到提高生產效益的目的，改革便沒有了意義，它也就會受攻擊，那時退潮就會再度降臨，中國經濟又會再次吻合馬寅初先生所說的團團轉的模式。

工資體制和價格體制一樣，也是出於恐懼通貨膨脹而以政治因素來抵禦價值規律的作用。雖然這次改革宣佈獎金不封頂，但獎金稅率的累進規定已給獎金額加了很大的限制。例如全年發放獎金在四個月標準工資以上，六個月

內的獎金按百分之一百徵稅，而超過六個月的部份，則按百分之三百徵稅，這實際上已封了頂。何況這只是對作為職工收入一部份的獎金放寬，收入的主要部份工資却仍不敢動。

人事體制受政治的限制則更大。對於廠長和經理的鬆綁要求中央最大的放鬆只是達到這種程度：一、企業的廠長、經理仍由上級主管部門任命或招聘，副廠長和副經理由廠長和經理提名（只是提名，沒有終決權！）主管部門考核審批（這是最實質的權力。）企業的中層幹部則由企業自行任免。只是在較小的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實行廠長（或經理）承包制的企業，廠長（經理）才有權任免副手和中層幹部，但廠長（經理）仍由上級決定。二、而科技和管理人員招聘和商調，也要在上級所規定的總職工控制指標內，才可作個別的調動。三、對普通職工則限制稍為鬆些，可以自由招工和解僱，但也要在國家下達的勞動指標和招工條件之下進行。總之，這是名符其實的「鬆」綁而不是「解」綁。對於關乎國家統治力量，對企業控制的企業上層幹部，國家仍牢牢掌握着控制權，在這些經濟單位實施實質的政治控制依然存在，這就使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爲一句空話。而且在這裡鬆綁的只是經理級的人員，而不是工人，工人民主選舉廠長的措施已不再提及了。

總之，從價格體制、工資體系和人事體系中看，經濟改革仍未把政治因素逐出經濟領域。政治處於強作用的社會結構模式根本沒有實質的觸動。在這種貌似體制改革而實質上是非結構性的改革中，改革浪潮不久又會處於退潮而收場。這種預言不久就會得到證實。

退潮的來到，將會由於改革的非同步性而引致經濟混亂作理由，由政治上的反對派作出攻擊，而改革派在這種壓力下，也加上本身利

益的考慮而作剎車。

但是，即使將會剎車，中國也不會退回原處。開放和鬆綁後所自發形成的私有經濟的力量在這段自由假期中會以驚人的速度增長，造成一種中央政治力量無法完全駕御的既成力量。政治力量只能再度限制它，束縛它，但却不能消滅它。中國社會幾千年所凝固成的僵硬社會結構的岩石，也許就是要通過多次改革浪潮的一次比一次更有力的衝擊，才有可能產生結構性的變化。

六、跛脚的矯正法

跛脚式的前進方式仍將是今後中國社會前進的方式。政治改革不但會落後於經濟改革，政治力量還將以拖後腿的方式拖慢甚至完全破壞經濟改革的成果。寄予這種廿世紀式的新洋務運動和新戊戌變法以厚望的人，將會有一個戲劇性的情緒變化周期。改革浪潮處於巔峰狀態時，他們會手舞足蹈，但當處於退潮之際，他們又會垂頭喪氣。而科學民主派的人士將會跳出這種情緒變化的循環圈，他們將以理性看待這一周期變化。我們的眼光不會跟着跛脚的社會在蹣跚中左右搖擺而毫無定見。我們知道矯正這蹣跚的社會須從那條跛腿——政治之腿——着手。這種以政易政——以民主之政易專制之政——與以暴易暴在性質上將有不同。因爲這種民主政治它只是要消滅集權政治。消滅它將對經濟不作任何自以爲是的干涉，它消滅了集權的權威後不再重建自身的權威。只有這樣，社會才會重新以兩條健康的腿向着繁榮幸福的目標奔馳。■

評鄧小平體制的幾個問題

李望如



一、鄧小平名不正，言不順

當前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先生的職位問題，可以導出鄧小平體制許多問題的真相。從這個角度來觀察，才會比較現實和具體地發掘出諸多問題和這些問題的本質。

不過我要先聲明，爲了徹底搞清問題，每當遇到不容有所偏袒的嚴酷事實，自難免對當事人有所批評。但我本着就事論事的原則，絕非故意將一些不良的事實歸罪於鄧氏一個人身上。更何況我們都知鄧小平是當前中共政權中傑出的領導人，並被人們譽爲足智多謀。同時，我們也不應把毛澤東留下的爛攤子全部歸罪於鄧小平。

有人以爲鄧小平不任中共黨中央主席或政府主席，只任軍委主席，是爲了顧全大局，無大權獨攬之野心，有大公無私之風度，值得稱譽。這怕未必盡然。盡管鄧氏可能是善意的，但結果却埋下大亂之根源。一句話，這是自毀中共本身體制，何以故？大家都知道，中共一貫倡言「黨指揮槍」，要杜絕「槍指揮黨」，認爲惟有以「黨指揮槍」才能防止軍人跋扈割據，才能團結一致服從中央，中央才能順利地施展和貫徹其政策。

然而，鄧小平一方面明言要以黨指揮槍，另外却又不出任黨的最高職位黨主席，也不出

任政府的最高職位國家主席，偏偏只任名在其下的軍委會主席，這就無異公告天下：槍要指揮黨！粉碎了中共一貫所倡導的，以及鄧氏當前所強調的「黨指揮槍」的理論。因爲毛澤東所造成的整個中共歷史揭示中共的政權體制名爲「黨指揮槍」，實是「槍指揮黨」。毛澤東的名言「槍桿裏出政權」，教導了大小幹部奉此金科玉律，都認爲槍桿才是主宰。所以鄧氏亦不例外，當他復出并倒華（國鋒）後，便迫不及待想統握軍權。這便無可爭辯地昭告世人，實際上最爲重要的職位是軍委主席。所以現在的黨更無法指揮槍，只有槍來指揮黨了。黨政二者已變成了掛在槍尖上的玩物或傀儡。

從中共歷史的演義來看，自從毛澤東在遼義會議中取得了軍隊最高領導權以來，到他在萬人的咒罵聲中退到墳墓以前，他時時刻刻都在玩弄槍與黨的法術。他以「黨指揮槍」的謊言來抓住軍權，反過來又以「槍指揮黨」的行徑鞏固了他在黨內的最高領導職位，通過運用這個千變萬化的法術，他變成了偉大的領袖、天才的戰略家，人民的「大救星」，同時也就統握諸大權於一手，集天下之威望於一身。他憑此便可「天下之利皆歸於我，天下之害皆歸於人」。他憑此便殘酷地實行土改、反右，荒唐地推行大躍進。當大躍進，人民公社遭到慘敗時，他不得不讓出政府主席，由劉少奇來收拾殘局。但他仍身居軍委主席，至死不讓。因

此，他仍能掀起浩劫神州的文化大革命。憑此他已變成了前所未有的封建集權專制的「共產皇帝」。

至於華國鋒，在毛後統握了黨政軍大權後，仍在一味走毛之故轍，違背民心地大搞「極左」和神話自己。然而，其智略大遜毛鄧，加之又不得人心，所以在鄧復出不久，即在鄧小平槓桿的另一邊隱退。

現在這個法術已輪到鄧小平來玩了，那麼鄧小平正玩弄的這個法術將會有怎樣的後果呢？

就理論而言，中共的基本體制，惟有黨中央主席才是最高領導。名正言順，方可有效地號召和指揮全黨。所以與中共同一體制的蘇共亦是如此，無論誰爲最高領袖，都位在黨中央最高職位的總書記。斯大林死後，雖曾一度有所謂「三頭馬車」的領導，但無論名義上和實際都係由作爲黨最高職位的總書記去掌舵。這樣才能名正言順，發號施令，控制大局。

從中國歷史看，每一朝代之動亂及其衰亡，常起因於在位帝王失權，被權臣或外戚宦官架空，變爲傀儡，乃形成「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於是，朝政大亂，民不聊生。今鄧氏雖爲軍委會主席，實爲幕後操縱指揮黨中央主席和政府主席，豈非和歷代「君不君，臣不臣」之局面相似？怎能不亂？

二、鄧小平不再搞政治運動嗎？

鄧小平復出時，誓言不再搞運動，全力搞四化，但不久又迅速大喊整軍、「整黨」、「反左」、「反右」、「滅罪運動」和「反精神污染」等等，運動一個緊接一個洶湧而來，故態復萌，亂字當頭。正如中共欽定爲天字第一號的大右派林希翎女士從獄中解放後，在美國某

大學演講中的「中共政權患了政治癩痢症，這老毛病又在發作，好像什麼反精神污染運動等等。再說「滅罪運動」，據說是要懲治刑事罪犯，本是應該鼓掌的，然而中共根本未依法律程序來辦。剛剛大喊要建立法制，隨後又出爾反爾。僅就所謂「從速，從嚴，從重」，「所謂可抓可不抓的堅決抓，可殺可不殺的堅決殺。不殺的，全部送到新疆農場去勞改」。這可

中共的「滅罪運動」大開殺戒。



充分地證明中共治國依然是無法無天。從「爭鳴」雜誌第七十三期報導：「由七月開始到九月中已逮捕了約近三十萬人，被判死刑立即執行者也已達七、八千人之多，真是大開殺戒。」「爭鳴」還報導：「中國的刑事犯罪活動，為何到今天變得如此猖獗呢？從根本來說，乃是毛澤東埋下的「定時炸彈」。這次全國所抓捕的刑事犯，百分之四十是文革時代的學生，現有的青年工人；還有百分之四十是文革期間犯有前科，或刑滿被釋放及越獄犯，其中又以三十歲以下為多；再有百分之二十是八十年代的學生，一部份是從邊疆農村倒流回城的失業者。其中幹部子弟佔相當大的比重，且多屬中級幹部子弟。這表明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所留下的後遺症是何等嚴重。然而中共不僅不對自己所造成的孽負絲毫責任，却只知以殺人為能，難道殺人就能解決社會的根本問題嗎？」

至於「反精神污染」運動，豈不知和中共正在進行的所謂「四個現代化」大相逕背嗎？中共剛剛為了搞四化而開放了一點門戶，為了安撫十億民心而剛給與人民一點言論上的自由，然而未能朝令完全頒出，很快地又搞「精神污染」運動。積極吸取國外科學技術和民主思想的人們，敢代表人民說真話的文藝界人士，在農村搞自由經濟的老百姓們，等等，統統都被指為「精神污染」。試問中共所謂的「精神污染」究竟是誰污染了誰？究竟是誰的精神失去了抵抗能力？究竟是誰的精神不健康？……諸多問題只有十億人民能作出最正確的回答。

三、鄧小平的困境

大家都知道，近幾年來大陸的形勢，十分複雜，在這種四處埋伏着危機的局勢下，鄧小平究竟應該怎樣做才好呢？鄧氏當前是大陸人

民的主宰，大家當然希望他能力挽狂瀾。我們不至於愚蠢到只看他的弱點，不從好處去看。本文最後正是要探索更深的根源，即由整個形勢去總結問題。如果只從鄧氏個人的作為去看，那將抓不到問題的真正癥處。只因本文篇幅所限，下面只能略述幾大要節：

第一、整個形勢的要害。中共整個歷史充滿了血腥權力鬭爭，毛澤東的「槍桿子裏出政權」之狂論造成了軍中山頭牢不可破。「造反有理」成了滿天下作亂之火種。十年混亂的文革，使整個黨組織紀律渙散，幹部多數變質，人民對中共政權和社會主義失去信心。試看一九七九年十月號「明報」月刊所發表震動一時的陳氏大作「三十年大夢將醒乎」的結論：「回顧三十年歲月，兩個字就可概括：『血和淚』」。以及該刊編者在「三十如何立」特輯前言中說的：「一個國家三十年來受盡了苦難，歷經無數的清算鬭爭，犧牲了無可估量的生命和財產。尤其十年文革，世界上決沒有一部字典有適當的字眼，可以盡括這當中的邪惡和瘋狂。它造成了歷史上最多的冤獄，最大的殺戮。論受辱之多，浩劫之大，實到了天怒人怨、鬼哭神號的地步。亡國喪邦，文明毀滅的危機已經臨頭了。」鄧小平大概認為要收拾這個爛攤子，只有暫用槍桿子。故鄧小平亦勢必親自抓住槍桿子。但因他這種救急手法與中共政權本來的體制相抵觸，即「黨指揮槍」顛倒為「槍指揮黨」，結果對鄧小平的新體制必定是個死結，以致矛盾百出，越治越亂。

第二、大方向之荒謬。如果鄧小平能憑藉着槍桿子暫時穩住局勢，另外能積極地使思想、原則和制度的大方向逐漸得以端正，未必無望力挽狂瀾，無奈鄧在此搞反了。那怎麼能端正大方向？這雖是千頭萬緒，首先須把大是非諸問題搞清，才可望逐漸建立大公無私的標

準。即一定要法制，使內外有所適從，否則，不能取信於民，建立互信。治天下之首一要訣，在於法與信之建立，無法則內外無所適從，無信則內外無誠心遵行。而中共恰好慣於無法無信。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的影響已經太深，鄧小平亦自謂「積重難返」。固然我們撥正大方向并非易事，但必須有個開始。

四、毛澤東的功過要澄清

要端正大方向，首先還要把一個大是非問題搞清楚，那就是對毛澤東的功過評價問題不錯，中共曾承認毛澤東犯有錯誤，但結論是功大過小，恰恰顛倒，它正是功小過大，不管三七分或四六分都是遁詞，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這種天大錯誤，嚴格地說來亦正是共產黨的錯誤的基本思想原則在作怪。他們之所以說毛功大過小，如從中共政權之得以建立看，這倒勉強說得過去。中共政權的建立也確實使大部份共幹得到了無窮的好處——高於一切的特權。但對於國家人民，却帶來了無窮的災難。試問古今中外那有人民理什麼王朝本身建立之功過，只問那王朝建立後對人民功過之大小？如果就事實而論，取舉世無人敢否認這項事實，就是中國人民普唾罵毛澤東禍國殃民，必將遺臭萬年。令人奇怪的是，鄧氏領導還繼續高舉毛旗，拚命歌頌毛澤東思想，大喊非它不可。這種舉措，真是負薪救火。當然大家都都知道目前中共有些行爲是不得已的，例如：目前中共如果把毛澤東的偶像粉碎，他們便成了無頭之蛇，陷於混亂。另外中共領導層中沒有任何人以一個思想理論家的姿態出現來取代毛思想和理論。所謂的「鄧小平選集」也只不過是以大捧特捧毛澤東思想理論爲能事而已。最後，中共如果實事求是地算清毛之爛賬，徹底改革，這

勢必大大觸及了中共當權者的利益。因中共大小幹部的利益和毛澤東的爛賬息息相關，他們若清算毛澤東的帳就等於清了自己的帳了，這樣誰還願意呢？當然，中國人民三十年的災難的責任絕不能全部推在毛澤東一個人身上，所有的中共幹部都應負有無可推諉的責任。人民的一切權利都像奴隸般的被剝奪，他們怎有膽量讓人民來清算這些帳呢？所以他們只好半閉着眼睛，故意亂扯功過三七或四六，以便緩和人民的憤怒。

因此這一難題，也正是中共政權目前的最大死結，他們怎會不將錯就錯呢？怎能糾正那荒謬的大方向呢？

五、鄧小平本身的矛盾

鄧體制本身最大的矛盾莫如既欲高舉毛旗而又要肅清「四人幫」餘孽。因爲人人皆知，鄧體制把毛所惹大禍，把中共整個政權，整個領導層所造成的浩劫，歸罪於「四人幫」，實屬滑稽。試問「四人幫」何來？試問，三反、五反、反右的暴行，大躍進的狂妄，人民公社的荒謬，「四人幫」在哪裡？難道這也能推到「四人幫」身上？十億人民心裡雪亮。既然鄧氏好高喊「實事求是」，爲什麼又如此扯謊、顛倒，不敢實事求是呢？

鄧是高舉毛旗，無論在理論上或軍事上，勢必就越發助長加強「四人幫」餘孽及軍中毛派的頭的氣焰。他們每聞鄧大捧毛思想的言論就樂不可支，因爲他們堅信自己正是毛思想的忠實信徒，鄧不過是異種走資派。儘管鄧氏巧言善辯，說是活用毛思想，都無濟於事。他們只牢記毛澤東生時所激勵的：他死之後「走資派」會利用他某些思想言論爲掩護竊奪領導權，但只要他們堅持奮鬥，最後仍會獲得勝利，

打倒「走資派」。大家都知道「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是毛澤東給鄧欽定的。這個毛教導使其殘餘勢力更有理由和信心來抵抗和戰勝「走資派」的修正主義路線。鄧氏深知這股抵抗力之大，故先設法抓住槍桿子，但只憑這個槍桿子亦不穩妥，所以又舉起思想上的旗幟，一面高舉毛旗，一面趕出鄧選，以便一邊安撫，一邊暗謀對策。試看「鄧小平文選」，全部四十八篇中，有三十九篇連篇反覆歌頌毛澤東思想，只有九篇因篇幅無法扯上，才未有歌頌毛的話。使人讀後只見毛思想的死靈魂，全不見鄧大人的活理論。

我們至此不能不爲鄧大人定論：他再亦無法回頭了，只能繼續跟着毛的死魂走。去年毛澤東冥壽之日，中共空前爲其張揚，嘆爲觀止，可以爲證。因此，人民心中的「鄧青天」變成「鄧矮子」，人民的希望又像泡影一樣地破滅了。

鄧小平是跟着毛澤東的死魂走，還是可突破毛的果白？



六、展望鄧小平的未來

那麼，鄧小平先生的所作所爲，前途如何呢？這又不得不觸及更根本的問題。簡言之，不管鄧小平或整個中共政權如何做，中共執政三十年來之所以造成如此浩劫，因人謀不臧，亦由於中國受數千年傳統文化薰陶的土地和人民，共產主義的公式根本套不上。中國三十年來的歷史，充分證明了共產主義在這個土地上的破產。於是，修正主義應運而生。鄧小平先生本應是時代寵兒，修正主義或走資派現在是光榮之詞，進步名稱，鄧青天戴上恰好。可是鄧又縮頭縮尾，中途變節，搞得四化不上不下。當鄧氏第三次上台，大膽修正中共若干重大錯誤政策，高舉四化大旗，表示支持民主牆上的言論自由，不少人大喊鄧青天，確有翻身之勢，何等風光！奈何他又迅速扼殺剛剛萌芽的民主氣息，從此左右搖擺，越走越左。當然我們知道鄧氏頗受形勢所迫，在無可奈何之際。然而鄧當初若敢乘勝站在人民一邊，鼓勵黨內外進步的民主派，一定能獲得廣大支持，形成巨大力量，未必無望突破此種困境。如果，鄧能切實走上修正主義之路，那將成爲真正的鄧青天，成爲真正的時代寵兒。奈何鄧氏害怕民主力量壯大起來，他控制不了，有把中共政權搞垮之危險，乃如此後退，殊堪扼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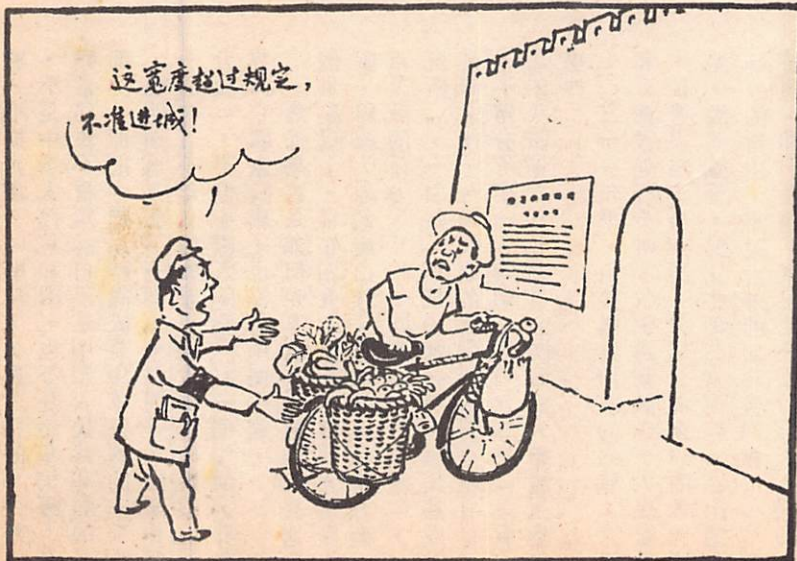
然則鄧既錯過上述大好機會，此後還有新希望嗎？就當前事實言，我們固感悲觀，却仍不能不對他抱最後一線希望。但願他今日忽左忽右係權宜之計，骨子裡還想利用槍桿子制服蠢蠢欲動的「四人幫」之殘餘，同時扶植進步份子，穩定大局，逐漸改革。但是我更不能不再提忠告，鄧氏應該警惕如下兩大危機：鄧氏如上之矛盾作爲，結果是否將形成反對派的大集結，以致再反撲過來，粉碎鄧的領導？其次，鄧縱於生時能控制大局，而年已老邁，目前如此傷透腦筋，在矛盾中還可打算，但死在不遠，死後是否會使中共政權陷於毛死後的危局？因此，我們不能不重覆說，鄧要克服此種危機，惟有及時扶植黨內進步份子，使他們的力量壯大，或可解救此兩大危機於萬一，使中共政局苟延殘喘。

不過，我們這種希望恐怕僅屬一廂情願，很不可靠。我們只有徹底將問題追究下去，把最深的根挖出來，才能真正把握未來。否則，枝枝節節之論或抄襲外洋丹方，乃至高喊民主、改革等等都將無濟於事。如果對中國歷史哲學只知其皮毛，尤其對自己民族歷史文化只見其暗不見其明，只知其糟糠，不知其精華，或只喊中華文化偉大而不知如何發揚，這樣終不能解決中國的真正問題。被公認的當代中國哲學家大師，牟宗三教授曾謂：「共產黨的問題，并不只是表面上呈現的制度問題，而是個觀念（Ideology）問題。國家的統一問題，並非純粹是政治問題，而根本是文化問題。」可見真正想徹底探究國是問題，必須先由尋根這條路上努力。譬如，一株樹木要茂盛，必須固根，若根被斷傷，樹必枯萎致死。至於所謂的西化及赤化，盲目的吸取洋貨，都是否定和摧殘中國的優良傳統文化，純屬捨本求末之謬。中國歷史數千年來，無論何種外來文化，一入中土，便被更高明的中華文化所融化。今天更加清楚，西化及赤化均非中國所宜，中國勢將走自己的道路。

因此我們要繼續探討中共問題，除了對中共現實政治問題批判外，尤必須追尋到共產黨問題的根源。希望以後我們能逐步探討下去，以期拋磚引玉，并求教於高明。

一九八四、三月廿三日

初稿成於加州



问题是門開得不够寬

沈同衡 画



——寫一個領導幹部
要自己動手寫報告的講話
稿，我明天在會上講講。

河北《共產黨員》供稿

論和平民主統一中國

吳儉祥

鄧小平等中共高層領導人，自知來日無多，且在歷史上記下一筆勳業，近幾年來頻頻發表談話和建議。自葉劍英一九八一年提出的國共和談的九點建議之後，又有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的公開信，鄧穎超在全國政協代表大會上的講話，趙紫陽在人代會上的報告，以及鄧小平本人的多次講話，所表現出來的熱情與開明，都是前所未有的。無奈台灣方面堅持「三不」政策，鄧小平先生的「統一」之戰始終未有突破。最近，鄧先生又提出「一個國家兩個制度」的辦法，聽起來十分中肯有理。在海內外希望統一的中國人面前，最近幾年一再高掛免戰牌的台灣當局，就難免又陷於被動和不近情理。

即將在洛杉磯舉行的八四年世界奧運會，由於台灣海峽兩岸的運動員，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下進行大規模接觸（同場比賽），而且台灣代表隊又是以「中國台北」這樣一個名稱，與大陸的「中國奧委會」代表隊比賽，其意義非比尋常。相信有一場新的「統一」戰會伴隨而來。

為此，筆者想趁此機會，對於「統一」的有關問題，談一些個人意見。

長期內戰的中國

要討論「統一」，首先要承認中國目前的現狀是「分裂」。否則，「統一」的問題根本不存在。

有人認為，中國，作為一個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從文化、歷史的角度上看，從來就沒有分裂過。因此，尼克森簽署的「上海公報」也不得不承認：「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的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美國政府對於這個立

場，不提異議。」顯然，這裏所指的「中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台灣當局決不會承認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而把中國大陸說成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也明顯地是犯了一個歷史錯誤。中國，作為一個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性大國，確實沒有「分裂」，不但中國人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在世界其它國家眼裏，也沒有兩個中國。

然而事實是如何呢？國共兩黨內戰長達半個世紀以上。早在四九年以前，國共大規模內戰，祖國大地到處白骨，遍地烽火。雙方都以百萬計的兵力，互相「圍剿」、「消滅」，「紅區」、「白區」早把中國分裂。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後，台灣海峽的戰爭狀況至今沒有結束。不僅有所謂「古寧頭」、「八二三」之戰，就在八四年六月廿七日金門海面，還發生炮轟事件。

三十五年來，由於國共兩黨的內戰，大陸和台灣被強行分離，致使國家破碎，人民離散。在過去三十多年裏，分居台海兩岸的骨肉同胞，要想團聚，真比牛郎織女還難。甚至通信聯繫的自由，都被兩邊的獨裁者剝奪，「美蔣特務」和「匪諜」就是他們強行分離人民的「殺手鐮」。不但大陸和台灣的民間交往，被國共強行斷絕長達一代人之久，官方的正式交往更是在「三不」政策的控制下，在國際場合中長期「誓不兩立」、「有你無我」。事實上，台灣海峽兩岸的關係，就其緊張程度而論，遠超過一般的互相獨立的國家關係。

因此，近三十多年來，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分裂」，倒不如說是國共兩黨的內戰。要實現中國統一，其實質乃是使國共兩黨停止內戰，還政於民，用和平的手段把中國統一在一個民主的憲法之下。

從「解放台灣」到

「一個國家兩個制度」

如果我們分析問題，不是只看其表面現象，而是抓住事物的本質，中共對台灣政策的脈絡，就會一清二楚。

中共出於它的基本政綱，不但它本身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它還必須將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直至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取得勝利，這是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規定了的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因此，「解放台灣」乃是中共基本任務之一。中共不但理論上堅持「四項原則」，三十多年的實踐，也證明它是這樣做的。儘管中共近年來，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一涉及及到它的本質，它就寸步不讓，「四項原則」必須堅持到底。因此，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它決沒有通過改革變成其它什麼黨。對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對中共來說，台灣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如芒在背。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硬法解決不了改用軟法處理。所以現在不再叫「解放台灣」，並非不想，實乃不能也。中共三十多年的治績，人民仍「一窮二白」，而「水深火熱」之中的台灣人民，在生活上已明顯超過生活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大陸人民。誰解放誰，已經成了問題，再用「解放台灣」來鼓動人民，已經不再會有人相信了。於是「解放台灣」的口號改頭換面，變成「台灣回歸祖國」，後又變成「祖國統一」。而且「統一」的條件，也一而再地放寬，最後發展到「一個國家兩個制度」。

對於「一個國家兩個制度」的方法，有人信以為真，也有人說這是陰謀。講得更準確一點，這乃是達到「解放台灣」的手段。不了解共產黨的人認為是陰謀，其實共產黨人是最坦

率的，從他們老祖宗馬克思開始，共產黨人早就向全世界宣佈了自己的政綱：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徹底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既然這樣，「解放台灣」自然應屬於中共的歷史任務之一了。但為什麼中共在這裏又要轉個彎呢？這裏有一個「目的」與「手段」的關係。在共產黨看來，只要達到「目的」，「手段」可以隨心所欲。有些時候，從表面上看，「手段」和「目的」好像是矛盾的，豈不知這種「手段」乃是達到「目的」

達賴喇嘛「視察」西藏某人民公社。



的必要方式。

爲了更清楚說明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西藏爲例，看看「一個國家兩個制度」的悶葫蘆裏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代表李維漢、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和西藏代表阿沛阿旺普美、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丹列門、桑頗丹津頓珠，在北京簽署了「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其中第四條明文規定：「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文中所指「西藏現行的政治制度」，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看，應屬「奴隸制度」，遠比資本主義落後。然而「協議」書中却允許這種「奴隸制度」與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和平共存，「不予變更」。這難道不是中共最早的「一個國家兩個制度」的範例嗎？然而曾幾何時，西藏辦起了人民公社，達賴喇嘛逃出了西藏，來不及逃跑的「各級官員」，統統地被掃蕩。「不予變更」到哪裏去了呢？歷史的事實，把中共政策的來龍去脈，顯示得一清二楚。「不予變更」它只是中共達到「予以變更」的一種「手段」。「一個國家兩個制度」也是一樣，它乃是中共用以迷惑世人，趁機一步步插足台灣，最後達到「解放台灣」的目的。

如果國民黨台灣當局信以為真，那麼，中共不但贏得了時間加強自己，又有了機會瓦解敵人，國民黨變成甕中之鱉，只是時間問題。到時候，國民黨的首要份子，只有兩條路，或如達賴逃亡國外，當流浪漢，作叫化子；或者戴上一頂「副委員長」的帽子，被中共用來作爲安撫其部下的工具。當這個工具的利用價值結束之後，那就必須將「革命進行到底」，一切「牛鬼蛇神」都在橫掃之列。連劉少奇、林

彪，這些毛澤東的親密戰友，都在劫難逃，更何況「人民公敵」——蔣家父子及其追隨者，國民黨反動派，當然統統都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被消滅掉。(1)

這就是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後一幕，不管是「解放台灣」也好，「一個國家兩個制度」也好，其結果都是一樣。

「統一」在中共專制之下的中國

鄧小平先生最近說過，「是社會主義吃掉台灣，抑或台灣信奉的「三民主義」吃掉大陸？答案是誰也吃不掉誰」(2)，這話是真的嗎？中共可能「統一」中國嗎？如果可能，那這種「統一」的結果又是如何呢？

我們知道，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治力量，它有馬列毛的主義作為理論基礎，有四千萬黨員的龐大與嚴密的組織，並且擁有像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這樣傑出的領導人，這些都是中國其它政黨無可比擬的。特別是中共在長期的鬭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擁有應變和進取的能力。

中共自誕生以來，經過二十八年，把國民黨的勢力趕出了大陸；五九年以「平息叛亂」為名，對西藏完成了徹底的軍事統治，鞏固了邊疆。在內地，它又通過「鎮反」、「三反五反」、「反右鬭爭」及文化大革命，把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權，推到了頂峰。近年來，鄧小平又把文革十年動亂的局面，完全扭轉。三十五年前，它以「小米加步槍」，打败了國民黨的飛機加大炮。今天，擁有洲際導彈加原子彈的中共，真的「吃不掉」僅有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台灣嗎？這是因為，同胞相殘，天理難容。但中共既使在高叫「和談」的時候，也沒有放棄武力解決的可能。

台灣國民黨當局面對這樣一個強大的對手，能維持到今天就已經不簡單了。除了仰仗美國盟友的支持以外，更要感謝毛澤東把中國大陸攪亂，否則，台灣還會有今天的局面？在新的國際環境下，由於蘇聯的威脅，美國與中共正在逐步勾結，難道美國朋友可以永遠依賴下去嗎？當台灣這個可憐的孤兒，被這個世界遺棄的時候，前景是不容樂觀的。

既然台灣前途那麼險惡，乾脆讓中共來「統一」，那結果又會如何呢？中共三十五年在大陸的統治，對這個問題作了最準確最全面的答覆。不願在中共專政下過日子的中國人，只有尋求別的出路。



到底有多少中國人願意「統一」在中共的無產階級專政之下？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與「三不政策」

「三民主義」是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孫中山先生，把西方民主法治的精髓，融合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為公」和「仁愛」的道統，從而創立起來的，對於近代中國民主化具有指導意義的偉大理論。「三民主義」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因為它包含了許多社會主義的基本因素。它同時又不像共產黨那樣，用暴力手段來處理社會矛盾，從而避免了馬克思主義的極端傾向。「三民主義」中的民權思想，奠定了民主政體的思想基礎。因此，筆者認為，「三民主義」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理論。

然而，儘管「三民主義」具有它永遠的歷史價值，儘管孫中山先生在中國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三民主義」的光輝外衣，却永遠無法遮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缺陷。

按照蔣經國先生的說法，「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具體含意是指：「中國必須統一，但必須認同在三民主義的憲政制度之下，統一在中華民國的國旗和國號之下。」(3)

如果蔣先生也贊同民主法治，如果蔣先生的「三民主義」也有民主的含意，那麼請問，你提出這個政綱有沒有徵求大陸十億人民的意見？如果有，請把結果公佈於眾。如果根本就沒有作任何民意調查，而自己在總統府裏設想出來的。那麼，這個政綱再好，也是不可能付諸實現的。更何況這種做法本身就缺乏民主的風範，沒有人民的支持，中國如何「統一」？蔣經國先生的這種做法，完全暴露了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心態。在民主運動高漲的今天，繼續以唯我獨尊的面目出現，是不會為人民所接受的。

其次，這個「統一」由誰來領導呢？蔣經國先生雖然沒有說「捨我其誰」，但台灣的宣傳是非常清楚的。可惜的是國民黨和蔣家父子在大陸時代的表現不太好，蔣家政權「內不能

修明政，外不能抗強權，弄得中國「匪盜猖獗，外賊橫行」。這些歷史的舊事，對中國老百姓來說，還是記憶猶新。對於一個名聲不好的人，改過自新，人民是歡迎的。但要作爲領袖讓人民接受，可能就不是那麼容易了。嚴格地說來，國民黨自己從來都沒有真正奉行過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由它打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旗號，未免有些滑稽。

第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的，與「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政策的手段，運作起來很不協調。

想當年，毛澤東爲了「解放全中國」，他就有勇氣、有氣魄來重慶跟蔣介石談判。相比之下，蔣經國的虛弱無能，已經暴露無遺。

如果蔣經國真的有心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顯然，不但需要大陸人民的支持，同時也必須爭取中共的多數黨員反戈一擊。否則，站在海島上高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有如馬桶裏放鞭炮，其結果最多是虛張聲勢，穩定人心。因此，要想「統一」中國，跟中共接觸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十分必要的。何況，「接觸」和「談判」跟「妥協」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恰恰相反，我們認爲，「和談」正是當前展開對中共政治鬭爭的最好場所。更何況，爲了全局的勝利，局部的妥協，有些時候，往往還是十分必要的。

「三不」政策的結果，不但束縛了政治攻勢的手足，同時更暴露了國民黨當局對中共的畏懼心理。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人們自然會想，國民黨不但在軍事上，是中共的手下敗將，而且在談判桌上，也不是中共的對手。現在已經到了既不敢打，也不敢談的地步，只有自欺欺人，靠「拖」來過日子。這種形象，最終要把人們對國民黨尚存的一線希望，統統抹煞。

最後，還應該指出：「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在六十年前提出的，在這六十年中，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孫中山先生在世，相信他也不會拿二十年代的「三民主義」來「統一」八十年代的中國。因此，「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提法跟「馬克思主義是放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一樣，是不科學的。

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可能性

既然由國共任何一黨來「統一」中國，對人民都不會有多大好處，而且暫時也不會實現。那麼，國共在八十年代是否會有第三次合作，共同主宰中國政局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回顧一下歷史，找出第一、二次國共合作的內在原因，再分析現狀，看看這種原因是否現在還存在。

就一般的常識說，要合作，首先必須有共同的利益，否則雙方就沒有合作的基礎。北伐成功以前，統治中國的主要力量，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各路軍閥。這些封建軍閥，就是當時國共的共同敵人。國共兩黨想要登上中國政治舞台，首先必須掃蕩軍閥。在這種共同目標之下，出現了國共的第一次合作。但是，一旦南方軍閥已被掃平，北方軍閥又暫時對國民黨勢力不能構成威脅的時候，國共兩黨爭奪革命果實的鬭爭就出現了。於是「合作」很快被打破，繼之而來的是「四、一二」清黨和五次圍剿。有了第一次合作失敗的教訓之後，本不會有第二次合作。然而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存亡。「鸚鵡相爭，漁翁得利」，是中國人自古以來的警句。爲了不致同歸於盡，國共才不得不「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久，歷史再一次證明，國共沒有長期的共同利益。一旦迫使它們合作的外力消失（

在第二次合作是日本帝國主義投降），接踵而來的便是國共你死我活的內戰。

在八十年代的國內外環境中，是否國共還存在一個共同目標或有一個外力，可以迫使國共非合作就不能存在下去呢？在國內，只有國共是最大的對抗勢力，它們並沒有共同的敵人。從國際角度看，雖然蘇聯的威脅籠罩着整個中國，但由於美蘇的矛盾超過中蘇矛盾，蘇聯不能全力對付中國。因此，來自蘇聯的威脅遠遠沒有達到國共非聯合對敵則不得生存的地步。至少蘇聯目前的威脅，還沒有達到這種程度。對台灣國民黨當局來說，對它威脅最大的敵



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參加開幕時和代表們親切握手

人，莫過於中共。

所以，依筆者所見，國共第三次合作，在國內外條件沒有根本變化的情況下，希望甚微。

和平民主統一中國

既然熱愛自由民主的中國人，不願意「統一」在中共的一黨專政之下，既然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又是行不通的，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希望也很小，那麼，中國還會有別的路嗎？

有！那就是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道路。說具體一點，就是在人民民主力量的壓力下，迫使國共當權者通過和平協商方式，把中國統一在一個民主憲法之下。

這個民主憲法取消「一黨專政」，保障各政黨、各人民團體，以平等的地位，參加各項政治活動和政權機構。

這個憲法規定，國家領導人必須由民主選舉產生，同時又受到人民的監督。即是說，人民不但擁有選舉權，而且要有罷免權。

在這個民主憲法之下，人權受到絕對的尊重，各種思想、各種主義都有發表的自由。人們對於這些主義，有接受的自由，也有不接受的自由，不允許任何思想箝制的現象存在。

為了保障國家能真正統一在民主憲政之下，一切國家機器，特別是軍隊，必須嚴格地掌握在國家手中。不允許任何政黨插手，變成鎮壓其政敵的工具。政治問題，只能用和平協商的方式來解決。

國家的法律、政策的制訂及修改，都必須徵得多數人民的同意。立法機構，應該是最高民意代表機關。

筆者相信，只有這樣一種民主聯合政體，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只有這樣的統一，

才是中國人民自願的統一。

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可能性

和平民主統一之後的中國，無庸置疑，是十分迷人的。但或許有人會說，那是「烏托邦」，痴人說夢，其實，這種民主制度，并非共產主義的「世界大同」，它和台灣海峽兩岸現行的政治制度，唯一不同之處，只是處理各種社會矛盾的方式，不是暴力，不是專政，而是和平協商、和平競爭。

這種民主制度，在西方已有幾百年的歷史，而在中國，却仍是熱愛自由民主的人們，夢寐以求的目標。

值得慶幸的是，近幾年來國內外的環境，為實現這一偉大目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

1 國共力量對比，由於大陸文革之亂，而此消彼長，現在形成了一種「誰也吃不掉誰」的新平衡。這種平衡，迫使中共不得不採用「和談」的手段來結束國共內戰。並且，必須承認國民黨的合法地位。這樣，就可能突破中共一黨專政的局面。

2 十年文革雖然給國家帶來了慘重的損失，同時它也給了人民前所未有的教訓。個人迷信和專制獨裁給國家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人民再清楚不過了。不但人民舉起了「秦始皇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的旗幟，中共的當權者，也意識到不改則亡的局面。近幾年來，鄧小平政權的一系列改革，就是一個好的開端。

3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的思想已打破了長期的「萬馬齊喑」的可悲局面。一批敢於冲破思想牢籠的人們，正在通過各種形式影響中國之政局。他們之中，不但有共產黨外的青年民運鬥士，也有共產黨內的民主改革派。他們有些已經形成了組織，有些則用其

它方式推進民主運動。這股民主力量的興起，最終將要改變中國政局。

4 國民黨的有識之士，已經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國民黨的力量如果不跟黨外民主力量合作（包括大陸和台灣的民主力量），單靠它自己的力量，不但「統一」中國是欺人之談，就連穩定台灣都成問題。相反地，如果國民黨「大敵」當前，與其被共產黨吃掉，倒不如改變它的獨裁形象，跟各民主力量合作，迫使共產黨放棄「一黨專政」的立場，以求共存，這樣才能真正譜下中興的歷史詩篇。

5 當前，中國在國際環境之中的地位，是十分有利於走自己獨立道路的地位。中國既不受蘇聯，也不受美國的控制。中國雖然有三十多年走蘇聯道路而形成的蘇式體制。但近年對外開放，帶進了不少西方科學民主的新因素。在這種環境下，中國完全有可能融合東西方的精粹，建立適合於中國現時的一套新體制。

6 台灣、香港及海外兩千萬華人，為中國走上「和平民主統一」的道路，提供實際的抗

中共專演的北京市台聯會組織北京市「台胞」在「選舉」。



衡力量。這種力量和海內外民主力量的結合，則可能迫使中共真正履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諾言，並有可能出現「一個國家多個政黨參政」的局面。

固然，這些條件的成熟，不是那麼簡單。但是，只要我們朝着這個方向堅持不懈地努力，誰也不敢否定，中國有實現「和平民主統一」的可能。

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形式

如果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那麼，達成這個目的的形式如何呢？

從民主派的立場來看，因為它首先尊重任何黨派的合法地位，尊重它的從事各項政治活動的權力。所以，民主派推動中國統一的手段是和平的合法的。

再從國共兩黨的當權者來分析，如果他們迫於黨內外民主勢力的壓力，在大陸和台灣逐步進行民主改革。最後，當這種改革使海峽兩岸的政體都具有民主的包容量的時候，即各種黨派都可以和平共存的時候，「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時刻就來到了。這種形式并非沒有可能，歷史上早有先例。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通過這種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以和平的手段，逐步把專制體制改變到君主立憲的體制上來。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相信，國共兩黨新一代的領導者，應該看到民主取代獨裁的歷史潮流，從中國傳統的專制文化中解脫出來，站在歷史推動者的立場上，為人民立新功。

如果獨裁者頑固到底，繼續不允許其它不聽指揮的政黨存在，非得「一黨專政」。那麼，這塊歷史的絆腳石，最終也會被搬掉，在這種情況下，最佳形式莫過於用逮捕「四人幫」

的方式，在沒有社會大動蕩的前提下，以最小的犧牲換取最大的收穫。當民主力量真正興起的時候，獨裁者就會像「四人幫」一樣，被推上歷史的審判台。這樣，一旦海峽兩岸都實行了民主制度，中國的和平統一，自然水到渠成。因此，中國和平民主統一的形式，不是取決於中國的民主派，而是取決於中國的當政者。

結論

綜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

中國分裂局面的本質，乃是國共長期的內戰。如果我們用「熱戰」來形容四九年以前的內戰，那麼，四九年至今的國共內戰狀況，就可以叫做「冷戰」階段。儘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內戰狀況始終沒有結束。

從中共的總政綱作為出發點來分析，我們可以很明確的找到這樣一個綫索，即不管中共對台灣的方針是「解放台灣」還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其本質最終都是要「解放台灣」，使台灣置於無產階級專政之下。

由於中共是一個中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政治力量，也由於中國人民對於專制的鬭爭非常不力，中國有可能被「統一」於中共的專制之下。但這種「統一」的結果，是為大多數熱愛自由民主的中國人民所不能接受的。

「三民主義」雖然是非常有價值的民主理論，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政綱却有許多缺陷，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最多只有暫時安定台灣之效，而無真正「統一」中國之能。

由於國共兩黨的利益根本對立，目前又沒有一個外力能迫使國共兩黨「不合作就不能生存」。這樣，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前景是十分渺茫的。

在面對中共的「統一」威脅之下，一切迫

求民主自由的中國人可能團結起來，尋求一個新的，即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道路。只有這條出路，人民才可能真正享有「民主、法治、自由、人權」，中國才可能真正走上和平安定、繁榮富強的道路。

和平民主統一中國的形式，不是取決於人民，而是取決於中國的當政者。如果他們迫於人民的壓力，能夠作出明智的選擇，中國可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走上「和平民主統一」的道路。相反地，如果他們堅持獨裁立場，拒絕改造，最後的結果還是他們被推上歷史的審判台。

中國只有在一個大家共同接受的民主憲法之下，才有可能真正統一起來。一切熱愛自由民主、熱愛祖國、希望「統一」的中國人團結起來，為實現和平民主統一中國而努力吧！

註：(1)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第一三八八頁。

(2)見中國大陸「瞭望」雜誌，一九八四年七月號，「鄧小平六月廿二日—廿三日接見香港代表團的談話」。

(3)節錄自「蔣總統在民國七十二行憲大會致詞」。



中國統一之構想

雪 城

一、統一 是歷史的必然

中國自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統一六國，實行了一系列鞏固統一的措施，諸如廢封建、置郡縣、修馳道、通水路、築長城、大移民、統一文字和度量衡，建立了以荀派儒學和法家刑名之學在思想上的統治地位以後，就大體確定了中國南至五嶺，北至長城，西至臨洮，東至東海的疆域範圍，從而達成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這樣一個統一的國家民族的大體規模。而秦始皇所以能達成這一空前未有的統一，除了他本人的雄才大略以外，更重要的還是由於他順應了人民要求統一的願望，順應了新興的工商業者需要互通商旅，新興地主階級需要興修水利，北方人民需要防禦匈奴的入侵這樣一些客觀的歷史需要。

自秦統一，以迄於今二千二百年的中國歷史，歷經三國分立（自魏文帝黃初六年至吳末帝天紀四年，即公元二二〇年至二八〇年）、南北朝對峙（自晉恭帝元熙二年至陳後主禎明三年，即公元四二〇年至五八九年）五代十國割據（自梁太祖開平元年至宋太祖建隆元年，即公元九〇七年至九六〇年）南宋偏安（自宋高宗紹興元年至宋衛王祥興二年，即公元一一三一年至一二七九年）總計分裂時期四百三十年，而其餘一千八百年時間，雖然戰亂相循，王朝更替，但大統一的年代仍然佔據大部份時間。

在這一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在統一問題上，有以下幾條規律可循：

第一，在內戰或割據狀態下，勝利總是屬於主張統一和進步的一方。楚漢紛爭，大戰七十次，小戰四十次，劉邦屢戰屢敗，身受重傷十二次，最後垓下一戰，取得全勝。究其原因

，無非是由於劉邦代表新興地主階級，主張建立大統一的王朝，而項羽代表殘餘領主勢力，主張裂土分封，劃江而治。

再縱觀中國自秦以後二千年的戰爭史，總是北方統一南方。秦自關中，先據有韓趙，最後滅楚併齊，統一天下；漢光武劉秀先在河北自稱蕭王，然後南下用兵，得隴望蜀，完成統一；曹魏北方屯田，然後滅蜀併吳；隋文帝取北周而代之，然後東征西討，削平群雄。趙匡胤中和中原，然後東征西討，削平群雄。趙匡胤在開封黃袍加身，然後吞併吳越南唐。然而，只有兩次例外，一次是朱元璋先在南方削平張士誠、方國珍、陳友諒，然後進軍北方，統一全國；另一次是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發，打敗北洋，抵定武漢，北方易幟，東北響應，完成統一。這兩次例外，充分說明代表統一和進步的集團，一定會由弱到強，由小到大，取得勝利，完成統一。

第二，大分裂必然帶來大統一，大統一必然帶來一個強盛的新王朝。在楚漢紛爭後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前後計五、六十年的休養生息，到了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北征匈奴，西通西域，南撫南粵，東併甄閩，形成一個空前強大的帝國。以後的唐、宋、明、清，也都是這一廣大的疆域裡實現國家家的統一。只有秦、隋兩個朝代，是在大統一之後只建立了一個短暫的王朝。秦統一後只維持了十五年，隋統一後只維持了三十六年。究其原因，不外兩點，一是由於統治者苦民太甚，使人民無法生存，只得鋌而走險。另一點是由於它們對舊的殘餘勢力鎮壓得不徹底，因而一旦農民揭竿而起，舊勢力就會死灰復燃。如秦末之張耳陳餘，隋末之李密等。但在這兩個短暫的王朝之後，代之而起的却是漢、唐這兩個空前強盛的新王朝。

第三，國家的大統一，必然帶來民族的大融合，帶來經濟文化的新發展。秦統一後，在今雲南、貴州、四川西南部的「置吏」，修「五尺道」，便利交通；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等「百越」之地，修築「新道」，把中原幾十萬人移民到那裡，帶去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西漢通西域之後，輸送出去了大量的綉、錦、絮、縵、酒等，原產品和穿井、冶鐵等技術，輸入了毛布、毛毡、汗血馬和蠶豆、黃瓜、大蒜、胡蘿蔔、胡桃、葡萄、西瓜、石榴等植物新品種及駱駝、驢等牲畜。同時，也吸收了中亞的樂曲、樂器、舞蹈、雕刻、繪畫等藝術。東漢傳入了佛教，使中國的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唐朝開始了與朝鮮、日本、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伊朗等國的文化交流，互派留學生，並將中原文化和生產技術傳入了西藏、南詔等地。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從荷蘭人手裡收復了淪陷三十八年的台灣，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使台灣與大陸統一，從而鞏固了中國東南海防。

總之，今日的中華民族，是經過了二千多年的融合，才結成了這樣一個包括大大小小近百個民族的整體。它們既有各自的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也有共同的心理狀態和倫理道德，它們都認同這個屹立在太平洋西海岸與帕米爾高原之間，西伯利亞以南至南中國海以北，包括台灣、琉球、香港、西沙、東沙等島嶼在內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國家，是自己民族休養生息的祖國，而自己則是這個國家和中華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二、統一是一是現實的必需

民國以來，一九二七年從廣州出發的旨在統一中國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取得了偉大

的勝利。然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製造濟南事件，進行阻撓；國民革命軍內部分裂，致使這一勝利的進軍，在抵定武漢之後，就未能繼續北上。接着，日本帝國主義又趁着中國發生內戰的情況下，於一九三一年製造「九一八」事件，侵佔中國東北，以後又侵入華北。而在一九三七年開始的八年抗戰中，由國民黨人執政的國民政府，由於未來得及刷新政治，以致文恬、武嬉，將驕兵惰，對外則一崩千里，失地過半；對內則橫徵暴斂、苦民太甚。而共產黨人，由於當時處於在野黨地位，對於當局在政治上的腐敗和軍事上的失利，則是以抨擊者的身份予以揭露，以致贏得了人們的同情。而它所組建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東北抗日聯軍，則在抗戰的空隙中得到成長，在戰爭的烈火中受到鍛鍊，成爲一支能征慣戰的勁旅。此時，國共雙方的軍事實力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國民黨最高當局，不僅未曾認真地看到這一點，相反地，却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過低地估計了共產黨的力量，過多地仰賴美援，以致全面進攻，損兵折將；重點進攻，迭遭挫敗；戰役決戰，全軍皆墨；劃江而守，潰不成軍，最後只得退守台灣。因此，目前的台海對峙，則是國共內戰的延續。而這種內戰狀況，對國家、民族和人民，實在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惡。

目前，中共領導集團對於統一問題是以中共黨人一己的心態處之，即民主人士張奚若在一九五七年鳴放中所說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毛澤東曾反駁道：我們好的是社會主義之大，急的是六億人民之功。）他們認爲，在毛、周、劉、朱在世時未曾解決的問題，一定要由他們來解決，藉以炫耀他們不世的功勳，並以此來提高他們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沖淡文革以來所造成的信心危機，更重要的是，

要在「一致對外」的目標下來安撫保守派對改革派諸如投降變修之類的非議，來消弭內部的爭鬭與分裂。同時，他們也可能清醒地認識到，統一問題如果在國、共兩黨老一代的領導人還健在的情況下未能解決，那麼，拖延到下一代領導人，則對統一問題在情感上逐漸淡漠，勢必造成永久性的分裂。這將鑄成一個歷史性的罪孽。因此，他們一直把台灣統一問題當作一個與現代化相提並論的問題來對待。但是，在台灣國民黨當局則認爲，反攻大陸已經坐失時機，時不再來。但要屈辱降貴，把最高中央政府降格爲地方政府，則又實不甘心。雖然軍事反攻，實力有限；但經濟成就，則舉世矚目，猶可以挽回昔日在大陸人民心目中的不良印象，並可以以此，在未來的日子裡與共產黨一爭雄長。況且國際局勢瞬息萬變，美蘇矛盾，日益尖銳，這中間大可游刃有餘。因此，他們的方針是維持對峙，以待時日。

然而，無論共產黨人要實現統一或國民黨最高當局要維持對峙，都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困難。就共產黨來說，由於三十多年來，在經濟建設上建樹不多，乏善可陳，國民平均收入僅及台灣的二十分之一，海峽兩岸人民生活水平過於懸殊。尤其是在極「左」路線危害下，人爲地製造了人們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恐懼感，加之三十多年來國民黨在台灣的反共宣傳頗有成效，致使台灣人民統一回歸的向心力受到削弱。而三十多年來，國民黨當局，痛定思痛，總結教訓，在台灣苦心經營，刻意在台灣建立起了紮根基層而又深入到各個方面的極其嚴密的特務統治，這與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國大陸的民生凋敝、人心思變、危機四伏、統治虛弱的狀況恰恰是鮮明的對照。因此，共產黨人要想統一台灣，以武力則未可輕取；以政治，也未必可以像當年接受大陸那樣駕輕就熟，

馬到成功。這裡面，除了國民黨人有較深的統治根基以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大陸落後的經濟狀況，難以選拔和訓練出能管理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工商社會的幹部。因為，目前經濟較發達的台灣，已非昔日共產黨從延安密洞進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可比。何況昔日的延安幹部，許多是從國統區去的。

但是，國民黨當局要想維持對峙也有很大的難以克服的困難。其一，是來自大陸的要求統一的政治攻勢是國民黨人很難以簡單的深閉固絕可以招架的；其二，是國民黨統治集團日益老化，而且一人一姓的絕對統治，一旦由於「最高」的駕崩，勢必產生政治危機，甚至導致整個統治的動搖。史遷曰：「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蔣家的統治，可能就動搖於第二代向第三代的交接時期。其三，是台灣內部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矛盾不易消除，在一定的氣候下，可能發生混亂。這些都會給共產黨的統一台灣帶來可乘之機。

同時，還應看到，長期以來，台灣問題已不是單純的中國內政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問題。它關係到美國在遠東的經濟利益和軍事戰略，關係到日本的對外貿易和國家安全，關係到蘇聯由北海道到金蘭灣的海上通道，關係到美、蘇在遠東勢力的均衡和他們處心積慮想通過台灣對峙以牽制中國和削弱中國的惡毒用心。因此，他們總是虎視眈眈地緊盯着台灣，盡量把他們的觸角伸入到台灣，企圖控制這裡的局勢。這就使中國的統一問題成爲一個十分棘手，越益複雜的問題。

綜上所述，縱觀中國歷史，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不容分裂。環顧世界各國，美、蘇、英、法、日等強國，自獨立戰爭、革命戰爭之後，二、三百年以來，只有外戰的歷史，而沒有內戰的紀錄。因之

國家強盛，民族興旺。反觀一些分裂國家，則任人宰割，爲人附庸。從現實狀況出發，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廣大的人力幅員，正可以互相調濟，取長補短；而在維持國家獨立、鞏固國防方面，台灣正是中國東南海域的屏障，而大陸也是台灣最廣大的後方。因此，爲今之計，就是要以國家民族的利益來摒除黨派之見，消弭黨派之爭，丟掉歷史恩怨，實現中國統一。

三、統一的前提和途徑

既然統一是一國民族的大事，而非黨派之私所可以代替，因此，統一就有它必不可少的前提：

第一，統一於國家富強。這是統一的目的所在。在這裡，既不是「以社會主義拯救台灣同胞」，也不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是在建設一個富強康樂的中國爲目的而實現的統一。在這二宏偉目標的指引下，需要國共兩黨以國家民族利益爲重，携手共建中華。各方各界人士，也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爲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康樂這一目標而竭智盡忠。

第二，統一於政治民主。統一既然是國家民族的統一，那就是全體國民共同利益攸關的大事，就要依靠全體人民的力量，就要用民主化的政治來代替專制獨裁；用多元化的多黨派並存和競爭的民主政治，來代替一黨專政。這樣就可以避免用一個專制政體來代替另一個專制政體，可以避免人民在兩個專制政體的爭鬥中再作無謂的犧牲。在這裡，民主政治，既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橋樑，也是國家統一所可能達到的目的。

第三，統一於國際和平。這就是說，要以

中國的統一，來鞏固和加強遠東和世界的和平，而不致造成這一地區的緊張局勢，甚至引發國際戰爭。事實上，如果因中國統一而危及國際和平甚至爆發大戰，不僅中國的統一目的不可能達到，還有可能導致更爲紛亂的內戰和分裂、割據。

第四，統一於民族獨立。中國的統一，絕對地是中國的內政，絕不容許外人干預，更不容許任何一方爲達到分裂或兼并的目的而勾結外國，托庇於外國的保護，而將中國的領土、主權拱手奉送給外國，更不容許引狼入室，勾引外國軍隊來踐踏中國的領土，魚肉中國的人民，而使國家的統一在外人的干預下變得更爲複雜、更爲遙遠。

統一的前提既已確定，統一的途徑便不難尋求。以下諸端，不妨作爲幾條具體的建議和要求：

第一，建議國共雙方在認同回歸的前提下，就結束一九四六年以來的軍事對立達成協議，以聯合或單獨方式，就承擔維護祖國統一和主權完整的責任，和首先使用武力侵犯對方發表聲明。如果國共雙方的領導集團，都具有愛國愛民的一片赤心和統一國家的真誠願望，就應當率先就這一問題發表自己的意見。

第二，要求國共雙方同時解除政治管制。全部無保留地釋放內戰中的俘虜和相互抓獲的一切人員。全部釋放在押的一切政治犯、解除出版管制、書報管制、通訊管制、旅行管制、遷居管制、通商管制、通婚管制，使大陸和台灣人民都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通訊遷居自由、勞動就業自由、貿易通商自由和婚姻自由等等。總之，讓人民通過自由地觀察、鑒別、議論、體驗，來選擇自己所喜愛的社會制度，而不是強加於人。

第三，要求開展大陸和台灣之間的經濟競

賽。雙方在經濟成長率、建設項目施工率、人民生活提高率等方面，進行競賽，將各自的成就定期向人民公布。同時，也可組織兩地的人民相互參觀，實地比較。

第四，建議雙方在經濟建設中互助互惠，取長補短。雙方的專家、學者、教授、作家、藝術家、體育家，可以互相聘請，互相交流，可以到對方地區協助工作，開展研究。在建設資金和資源方面可以互相調濟；在關稅方面，可以互惠互利。

第五，要求雙方逐步推行普選制度。先可

在各自地區實行真正的人民普遍的直接的選舉，再進而發展到各黨派，個人均可以在雙方的地區進行競選。在全民自由競選的基礎上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府，從而在民主政府的基礎上實現國家的統一。

第六，爲了促成以上各條的實施，呼籲海外華人成立中國統一大同盟，將一切要求中國統一的組織和個人，首先統一組織起來，實現海外華人不分黨派、不分信仰、不分職業、不分階級的統一體，進一步要求國共兩黨和兩地區人民，也參加到這一大同盟中來，以它作爲

也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柏仁

香港明報特約駐美記者梁厚甫先生，六月×日在該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目是「談一個國家兩個制度」。作者在文章中說，鄧小平提出的「一個國家兩個制度」，引起國際文化界的注目，美國的許多學者，紛紛予以評論，認爲這個提法，十分新穎，不僅可以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而且具有國際意義，可做爲一個指導原則，解決國際上類似的問題。例如東、西德問題及南、北韓問題。

對於這種觀點，筆者認爲純屬主觀臆斷、個人願望，絕不符合鄧小平的實際思想，值得商榷。爲此，筆者願意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下面，和梁厚甫先生交換。

一、「一國兩制」提出的背景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當代提出的「完成統一大業」的方針，也就是「收復香港」

和「解放台灣」的方針。瞭解中共戰略方針的人，首先要問：爲什麼鄧小平現在提出這條方針？它的背景是什麼？中共統一中國，從來主張武力解決，對台灣也不例外，同樣試用過軍事力量。爲什麼今天鄧棄武從文，提出「一國兩制」這個「偉大方針」？是因爲他的思想起了變化，認爲只有兩種制度共存才是統一中國的唯一途徑？倘若這樣理解，那就完全錯了！請不要忘記，鄧小平的目的絕不是「兩種制度共存」，而是「完成統一大業」。「共存」只是策略、手段，「統一」才是目的。這種手段不是鄧小平的創造，而是毛澤東的發明，鄧小平只是拾毛澤東的牙慧。中共建國之初，毛澤東就提出和資產階級共存，爲了教資產階級相信毛澤東的「誠意」，甚至說國旗上的第四顆小星是代表資產階級的，而令資產階級心悅誠服，相信了毛澤東。然而結果如何？無需贅述，這已經是歷史。今天鄧小平的「一國兩制」

在人民的監督和仲裁下實現統一的協商組織。

我們相信，只要人民勇敢地承擔起統一中國的重任，就能夠有效地制止一切分裂中國的陰謀和行爲，就能夠促進統一事業向前發展，就能夠達成統一中國的偉業，使中國以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國家形象，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讓我們用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政治的民主、四化的實現，迎接這一科學的預言吧！

，和當年毛澤東「團結資產階級」有什麼本質區別？從理論上講完全一樣，都是無產階級允許資產階級共存。當年毛澤東是玩弄政治手段，今日鄧小平會是真誠實意？除非鄧小平聲明放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然而恰恰相反，不是放棄，而是堅持。

二、且莫忘記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什麼？簡言之，就是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越快越好，越早越好，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根據這套理論，凡屬中國領土，都必須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都必須承認，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而中共的革命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理想。這套理論梁厚甫先生不會否認吧？事實也不允許否認。既然如此，梁先生根據什麼相信，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方針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呢？鄧小平本人並未否認他的「一國兩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爲他所說的「兩制共存」有時間限制，並非永遠共存，

而共存之後，仍然是由中共來統一。梁厚甫先生却認為「兩制」可以永遠共存，這恐怕鄧小平聽到也不會同意吧？兩種制度究竟能否共存？歷史早已做出了結論，凡是有武裝力量的共產黨，有那一個願意與其本國的階級敵人共存的嗎？倘能共存，何須革命？

對於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無論香港同胞或台灣同胞，除了斥之以鼻或抱之以苦笑之外，別無其它。人們認為，在毛澤東已經聲名狼藉的今天，仍然捨其牙慧而當做發明創造，除了令人感到可氣和可笑之外，實在別無其它作用。

三、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

是在全世界埋葬資本主義

然而梁厚甫先生以及若干美國學者却對這種牙慧方針給了高度評價，並且大談其國際意義，認為不僅能解決中國的統一問題，而且能指導東、西德以及南、北韓去完成它們的統一

大業。這就更令人感到啼笑皆非了。根據梁厚甫先生的觀點，不僅東西德可以言歸於好，今後和睦相處，甚至連做夢都想統一南韓的金日成，也會和全斗煥一笑泯恩仇，而握手言歡。鄧小平的牙慧方針，居然具有這般偉大的國際意義，恐怕連鄧小平本人也沒想到。如此評價鄧小平的牙慧方針，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然而這是真的，不是假的。梁厚甫先生不僅明確地指出了它的如此偉大的國際意義，並且引伸一步，認為世界上共產國家與非共產國家之間本來就沒有任何矛盾，而應該和平共處。如果這是善良的願望，當然可以理解，倘若當然科學分析和邏輯推理，就令人莫解了。梁厚甫先生是著名的國際時事評論家，寫過許多精彩的國際評論，然而，如今却忽略了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那就是蘇聯正在全世界推行擴張主義。從非洲—亞洲—南美洲，自六十年代以來，許多國家以各種方式納入了蘇聯的勢力，建立了形形色色的親蘇政權，而固有的親蘇國家，却沒有一個能夠擺脫蘇聯的控制。倘若按

照梁厚甫先生的觀點，東、西德也可以實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而成爲一個統一的德國，蘇聯是否會袖手旁觀或置若罔聞？如果這種設想真能實現，那就可以進一步設想，蘇聯無須支持阿富汗的政府軍和義軍作戰，而應該實行「一國兩制」了。然而那裏的戰爭却空前殘酷。

梁厚甫先生一定記得，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赫魯曉夫大肆宣揚的三和政策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聲勢之大似乎蘇聯真有誠意和資本主義世界共存。然而曾幾何時，舊態復萌，一如既往。此後的歷史是中國蘇分裂，兵戎相見，至今不能實現國家之間的關係正常化。這還是同一制度的兩個國家，尚且難以共存。對於不同的制度反而可以共存，叫人如何相信？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埋葬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兩種制度豈可共存？

國共談判與民主運動

桑梓

一、國民黨怕什麼？

中共一再作姿態呼籲談判，「國府」却一直堅守拒絕立場，於是上面這一問題就縈繞在許多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心頭。筆者願就此有關的一些問題作一探討，以期拋磚引玉之效。衆所周知，共產黨不受台灣人民歡迎。只要不動武，中共決無法插足台灣，更何提取代

國民黨，控制台灣政局。所以，通過談判緩和台灣海峽的敵對狀態，消除戰爭的可能性，正是台灣求存防吞的好辦法。同時談判也會分解大陸內部力量，君不見，美蘇開始各種談判時，蘇聯內部的「不同政見者」的影響就日益發展。國共一旦對話，大陸人民就會從一個權威（中共）控制下轉爲身處兩個權威（國共）之間。各種「異端」思想會乘隙而起，如雨後春筍。這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大陸上的民主運動，

動搖中共的專制統治。

不少人問道：台灣有相對自由的政治制度，相當發達的經濟水平，一致恐共的廣大人民，手中的牌很硬，爲何國民黨不敢與中共在談判桌上較量，而高掛免戰牌呢？難道今天國民黨選心有餘悸，怕共產黨不成？

二、國民黨另有所慮

原來國民黨今天的心腹大患已不再是中共的外來威脅，而是自己耳邊的政敵——黨外勢力；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共得不到台灣的人心，但各種黨外人士，却有與國民黨爭人心，以至爭天下的潛力，這正是國民黨所真正害怕的。

正如不少台灣同學正確指出的：國民黨若能擴大民主，放寬黨禁、言禁，使台灣人民享受更多一些自由民主權利，那麼台灣的防共將更有保障。然而，有利於防共，不等於有利於國民黨的統治。國民黨在台灣這個小天地裏之所以能維持其至高無上的專制統治，主要還是因為有反共大旗在握。它對台灣人民的種種宣傳，歸根結底是一句話：「你們要不想讓中共騎在頭上，就得讓我國民黨騎。」所謂「中共爪牙」、「中共幫兇」、「爲虎作倀」等等，就是國民黨對付反對派的常用稱呼。沒有了「中共威脅」，沒有「患憂意識」，國民黨是否還能在「競選」中當大贏家，恐怕是大有問題。

國共談判，對國民黨來說，也是一種開放政策——對大陸開放。鄧小平的開放引起了民主運動，國民黨一開放，焉知不會壯大它的在野對手？談判一開，別的先慢說，「三通」就擋不住了。台灣民間將衝破官方阻撓，擴大與大陸民間的私下往來。黨外民主力量也將力爭更大的發言權。台灣人民的恐共意識淡薄，「共黨爪牙」等帽子失效，這些都將直接間接地威脅到國民黨的統治地位，衝擊現有即得利益

者的權勢。所謂談判會導致「士氣民心的瓦解」，並非完全子虛烏有，只是應當續作導致對國民黨的離心趨向。總之，談判會推動兩岸的民主運動，也會拆國民黨的台。說穿了，「國府」自己也是個實行高壓統治的專制政府。

三、國共默契合作

談判既然對國共雙方皆有風險，那中共爲何這麼起勁呢？原來經過多次殘酷的政治鬭爭的「考驗錘煉」，中共在政治手腕和權術上，確實比國民黨棋高一着。中共知道國民黨不會輕而接受談判，單方面大喊和平一時不會擔實際風險，却有莫大政治利益：一可在國際上平息「好戰」惡名，贏得「愛好和平」的名聲。二可安撫國內民心。三可拉攏海外僑胞……。但是若說中共和談全是陰謀，毫無誠意，其最終目的仍是吃掉國民黨，吞併台灣；這結論却又嫌武斷。筆者認爲中共自知自己掌握不了台灣，故還是真心希望國民黨長久統治台灣的。否則，如果讓黨外人士得勢取代國民黨，在台灣厲行民主，那麼台灣將會成爲名符其實的「自

由基地」，爲大陸人民真正嚮往。這時大陸上中共的處境恐怕只會更尷尬。中共這份苦心，國民黨多少有所領會。其實，最怕又最敬的是國民黨，只要國民黨在台上中共就不會來犯台。國共對立使兩黨都能以對方的存在作爲自己實行專制統治的藉口；國民黨的萬用標籤已如上述，共產黨也誣指民聯等爲國民黨附庸。同時在這表面的對立狀態下，又有着上述相互依賴的一面。這或許也算得上一種「國共合作」吧？這是在海峽兩岸人民日益覺醒，民主運動風起雲湧之新形勢下的新約國共合作——合作鎮壓民主運動，維持各自的專制統治。如果不是這樣，何以這兩個黨對民主運動都是如此害怕呢？

民主潮流是當今世界的主流，國共兩黨誰也擋不住，只要大陸、台灣、香港及海外的民主運動聯合起來，并聯合世界上其它各國的民主力量，（如波蘭團結工會、蘇聯東歐的不同政見者等）一起奮鬥，必能衝破國共兩黨的重重阻礙，迎來自由、民主、統一的新中國。

中國和平統一的基本問題

在分裂了三十多年之後，中國人一直共同關心的中國統一問題又在海內外引起了熱烈的討論，許多人紛紛提出個人的看法和建議。台灣海峽兩岸那些即將走完人生旅程的政治領導人物，尤其希望在入土之前親眼看到中國的統一，迫不急待地提出各種統一的建議和條件。

然而我們要問：此時此刻是統一中國的恰當時機嗎？和平統一中國的客觀條件具備了嗎？中國的統一又應該在什麼樣的共同基礎上進行呢？

我們看到：北京方面軟硬兼施，以「中央政府」的姿態，向台北提出，台灣在中國統一

之後依然可以保有自己的社會、經濟體制，甚至還可以擁有自己的軍隊；同時却又一再強調：中共絕不排除使用武力解決中國統一問題的可能性。我們先談北京的保證，筆者要問：根據中共這一個「舉世無雙」的構想，如果台灣在中國統一之後依舊保持現況，中國也只不過

啄木鳥

達到形式上的統一而已，在實質上和目前兩個政治實體並存的情況又有什麼差別？難道中國人盼望的只是這一種有名無實的統一？或者中共的真正的目的只是要中華民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稱臣？或許有人要說：形式的統一只是過渡時期的權宜措施，實質的統一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筆者要問：形式的統一是必要的過程嗎？形式的統一會有助於實質的統一嗎？目前海峽兩岸意識形態上的歧異可能通過形式的統一而有所改善乃至化為烏有嗎？以國、共雙方目前政治對立，形式的統一可以降低雙方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嗎？其次，談到北京和談的誠意問題。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三十多年以來，什麼時候有過穩定的政策？什麼時候尊重過法治？什麼時候尊重過民意？又有什麼時候兌現過自己所提的保證？當今天全世界的人對中共政治的穩定性都抱著懷疑的態度時候，又有誰敢擔保中共不會「現行體制不變的承諾」在前，「人民解放軍的解放」在後？到時候台灣又如何自保？

至於北京「不排除使用武力解決中國統一問題的可能性」的恫嚇，筆者要問中共的領導人：一旦中共動武，進犯台灣，台灣的老百姓難道不會因為一無退路，二為保有現時的建設成就，不願接受中共的統治，而有放手一搏的可能？中共有能力經得起台灣的反擊而又同時應付本身的內、外壓力嗎？筆者同時也要在此鄭重指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中共「不排除使用武力解決中國統一問題的可能性」的這一宣告，不但本身即是和平統一中國的一大障礙，而且也加重了對中共「和平統一中國」誠意的嫌疑！

爲了和北京的「三通」、「六條」分庭抗禮，台北方面推出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在海外部分，由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會

動用中華民國政府稅收，在海外各地策動留學生、僑胞和駐外人員分別成立所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孫逸仙學會」、「中山學會」等徒有空殼的組織。若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目前在世界各地掀起了多大的迴響，筆者個人相信，這也只是中國國民黨「半夜高歌過墳場」——自個兒壯胆——單方面虛報戰果、自欺欺人。各位讀者只需就近詢問各「分盟」，問問他們自成立以來的工作內容和工作績效，便不難了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所引起的「震撼」有多大了！

不可否認，目前台灣的經濟建設、物質生活的水準的確比中國大陸高出甚多；但是爲什麼以中華民國近年來所創下的「經濟奇蹟」依然無法引起海內、外中國人真心地對「三民主義模範省」的認同呢？

原因出在：一向以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自居的中華民國政府這些年來在台灣實行的是中華民國憲法的「修訂本」——「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戒嚴法」，嚴重侵犯了中華民國憲法所賦予人民的基本權利，造成政治的壟斷，使得社會實際存在的矛盾和困難得不到符合中華民國利益的大前提之下的充分討論和合理的解決：一、在開放言論自由方面，一面強調人民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實際上却以「非常時期」、「相忍爲國」爲盾牌，將大眾傳播機構納爲政府宣傳機構，提示：多宣傳、少批評；只准報喜，報憂少來。並且以「節約紙張」爲理由，將報業的發展限制在三十一家報社、每天出版三大張的「幼稚園程度」上。二、在民主教育方面，一面高喊「堅守民主陣容」，另一方面却不將老百姓的信心建立在國家、民主制度之上。國民黨常罵中共在搞個人崇拜，但是「蔣總統嘉言錄」、「李登輝先生的小故事」和「毛澤東語錄」、「鄧小平文選」的差別

又在那裡呢？三、在政治教育方面，台北一向辯稱「台灣老百姓的政治水準不夠」，不可輕言解除戒嚴令，筆者要問：百姓不教誰之過？三十多年來有那一位教育部長、內政部長、行政院長爲他們的「教育不力」負責？一個「三十年」不夠，中華民國還有幾個「三十年」可以等？請中華民國政府們心自問：除了愚民式的反共、醜共政治教育以外，中華民國政府又給過台灣的老百姓什麼樣的民主政治教育？由於政治的不健全所導致的國民心理建設不足已經反映在台灣社會秩序愈來愈惡化的事實上。筆者深信，台北方面若不從政治改革下手，恢復中華民國憲法，帶動國民心理建設，台灣的信心危機將會更嚴重，社會內部的不安也將愈來愈不可收拾，而且會連帶影響經濟、工業等各方面的發展，當然更談不上還有什麼餘力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

民主政治不相信先知，相信真理愈辯愈明。中國需要的不是中共「社會主義的民主」，更不是國民黨「聽話式的民主」。不錯，主觀上統一中國的感情條件肯定存在，但是爲了避免武裝衝突，避免已經飽受戰亂之苦的中國再陷內戰，中國的和平統一更需要民主、法治等基本條件的實現。換句話說，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這兩個「難兄難弟」還沒有「還政於民」之前，我們實在無法「奢求」中國如何和平統一。只有在大陸、台灣兩邊都實行民主政治，中國的和平統一才會有穩固的基礎和安全的保障。在沒有達到這個共同的基礎之前，雙方都應該將對方視爲民主競賽的對手，彼此和平共存，先求中國的政治民主化，而後中國的和平統一自然指日可待！



紫陽君，

怎麼商量？

陸明

趙紫陽先生在五月的「人代會」上政府工作報告中又一次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和平統一設想，並提出「國、共兩黨在統一問題上只要有共同語言，一切事情好商量。」然而國民黨人並不與之「商量」，大概是沒有「共同語言」的緣故。中共的八點建議儼然以「老子黨」自居，根本沒有以「平等」的誠意去看待國民黨人。

我們認為：中國的統一，決不是國、共兩黨「商量」所能解決的。沒有一個保證多黨合法並存的憲法以及多元化政體，國、共兩黨永遠不會有「共同語言」。只有在一個既允許共產黨人生存並信仰和宣傳共產主義，又允許國民黨人生存並信仰和宣傳三民主義，同時還允許其他黨生存並信仰和宣傳其政治主張，從而讓人民能夠自由鑒別和選擇的政治制度下，國、共才能夠並存，中國才能夠統一。否則，即使國、共爲了各自的利益重新合作起來，其後果也必然是「明和暗鬪」，各圖發展並消滅對方，重蹈歷史上國、共合作的「干戈兵戎」之轍。更何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寫在共產黨的憲法上，豈不等於是讓國民黨人倒旗，投到共產黨人麾下當「弼馬溫」式的掛名政府官員，而讓國民黨變成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全國政協一部份力量。這有什麼好「商量」的呢！中國共產黨人也應該實際地，設身處地的站在國民黨人立場上來考慮問題：共產黨當初刺了幾百

人馬，被打得東躲西藏尚不肯投降，更何況國民黨尚有幾十萬人馬，並領導着經濟發展水平遠遠超過大陸的台灣地區。

台灣的問題，只有兩個解決辦法：

第一，如同毛澤東所說，歷史上一切反動東西（政治力量）都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你不打，他就不倒」，乾脆打！或者發展幾年「現代化」之後打。

第二，若要和，就必須建立一個在政治上各黨平等的憲法，並協商出一個新名稱的民主國家。其實站到共產黨人的立場上來看：該黨有放置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指導，有世界上最優越的制度，有一個十億人民衷心擁護和愛戴的、有三千萬成員的、英明並最有戰鬥力的政治組織，在民主政治的競爭中，一定可以通過競選長期執政甚至可能永遠執政，說不定還可以同化其他政黨。如果中國共產黨人真的有胆量並有魄力這樣做，那麼中國的統一和繁榮富強一定會很快到來。如果中共通過自由競選能夠連續執政，相信包括國民黨人在內的各黨派和政治團體都會取合作的態度，幫助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走他們認爲是合理的道路，無論這種道路是什麼主義。

當然，筆者清楚自己的這種設想完全是空想，共產黨人又怎麼可能放棄本集團的利益來與那些「雜七麻八」的黨、團分權呢？

即然沒有可能，那麼中國的統一也只有等待中共領導的「四化」運動之實現了！到了那一天，事實證明「庚申」中與之後的共產黨能夠克服它在前卅年中所犯的錯誤，並有能力帶領十數億民眾通過社會主義走上繁榮之道，那些包括國民黨在內的不同政派自然會偃旗息鼓於人民對中共的擁護潮流之中。不過，大陸人民需要再拿出幾十年時間去耐心地等待中共新政治家們的「實驗」，中國統一的「商量」，

也只有到那個時候再說。

寫文章前，曾與高彩烈地爲國、共對話商量設想了幾個前提，例如：

1 雙方政治宣傳從降格到停止互相攻擊，（就像停止炮擊一樣），特別應該停止對個人身心的攻擊。

2 停止彼此間的諷刺活動，對等釋放政治犯。

3 中共從憲法中剔除「四項基本原則」，恢復建國時的共和憲法並釋放政治犯。

4 國民黨提出和談條件，而後雙方在各友好國家政府並中國各愛國民主黨派的參與下建立對話。即使是漫長的對話也是有益的。

我們認爲，在當前蘇聯威脅愈增、國家經濟日趨相對貧窮的大勢中，國、共的對話對於中國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化都是極爲有益的，我們希望國共兩黨都不要再死抱着自己的「主義」以及這「主義」後邊的集團私利而冤冤相報，如中國古語所形容「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兩黨的政治家們在近代中國史上，爲了中國的繁榮都做出了極大努力，儘管各自功過參半，仍不央爲同代人之精英杰人，雖然由於「代溝」之故我們不同意您們現在的許多做法和想法，但做爲晚輩我們還是要以尊敬的姿態勸你們各自自責和自省一點，那怕是違心也要做一些讓步和犧牲，香港徐小明先生曾導演了一部以武術打鬥爲格調的電視連續劇叫做「霍元甲」，是描寫武門兩派的老人由於門派之見相爭而年年贖武，但恰恰是這兩家的後代相敬相愛，在國難危危之計，兩家後代力勸老人和陸，共爭民族之強我建議兩黨老人們抽時間去看看這個劇，政、兵、經、交之中浮閑一刻也許有益。我們希望在您們在世之日，讓台灣的小伙子能娶上大陸的姑娘，而台灣的麗女也能到大陸做新娘。兩黨老人！您們不高興嗎？

黃子 一九八四·五·

回憶學生運動中坐牢的日子

耿晨

監獄的第一個黑夜降臨了。

……這個時候，蔚又一定在「小屋子」等我，守着那兩碗漸漸變涼的炸醬麵，說不定在哭或者在捧東西。多少個夜晚，她都是這樣焦急地等待我這個粗心的、常常違約的未婚夫。世界上最令人焦急的莫過於等待所愛的人，每一聲腳步，每一個路人，一秒一秒的時間……她常常在最後的失望中，把我的東西亂摔一通，什麼書本、鉛筆、枕巾、小鐵勺之類，（但能摔碎的東西諸如墨水、維納斯像，她從來也不摔的）。

每次當我遲到的時候，我總是首先用男子漢那種慣用的嘻皮笑臉去逗她笑：「喲——，哪來的一樽發怒女神……」

「去去去！少來這一套！」她推開我，徑直走向窗邊，這「失敗」，早在我預料之中，一個男子能有多少「絕招」去逗女人的歡心呢？而一個姑娘又怎能理解一個男子對社會、對人生的思索、憂慮和惆悵呢？

「蔚蔚！……」

我走近她身邊，充滿深深的愛和理解地捏起她的辮子，輕輕地撫着她那青春的秀髮。

「……要知道，我們是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個男人不能全力以赴地陪着自己的姑娘的時代……真對不起……」

蔚蔚回過身來，「哇」地一聲伏在我的肩膀上痛哭起來，那委屈的淚水在我胸前淌，濕透了我的襯衫。一邊哭還一邊捶打着我：

「你自私，你從來不關心別人……」

「是的！哥哥不是一個好哥哥……」我像一條忠實的大黃牛任她捶打。讓她發洩一下怨氣也許能彌補我的內疚。我給她擦去腮邊的淚。並輕輕地吻她那含淚的眼睛、睫毛。

蔚又緊緊地倚靠在我的懷抱中，好像過一會就會失去我一樣。

「……整天為你擔憂、為你操心……」

是啊！相愛時，我曾答應盡自己的努力給她帶來幸福，可是……

「……哥哥不好……」我慚愧地說。

「不！」她打斷了我的話，把我抱得更緊，將面頰靠在我胸脯上，閉着眼睛說：「你好，就是你好！這個世上除了你，我什麼也不要，只要你！」

……

可是，就是這個「你」看來姑娘永難得到了。古往今來，世上多少對至愛男女被社會的黑暗勢力拆散了，我們能逃出劫難麼？蔚蔚是一個軟弱的姑娘，她無力頂受將要來自社會、家庭和同學中那殘酷的壓力。她只能哭，也許女性只有眼淚這種反抗命運的武器。我憂慮地想着我被判刑將給蔚蔚的命運帶來怎樣嚴重的影響。……獄中的蚊子真多呀！密密麻麻，透過燈光我感覺這幾立方厘米的小小斗室裏有着不止一千隻的蚊子在飛舞，「嗡嗡」聲像劉錫錫形容的「聲聞嘈然瘖如雷」……不知怎麼地，我突然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希特勒派一千架飛機轟炸斯大林格勒，也許就是這個樣子。聽說有不少飛機自我相撞

。可是這裏的蚊子却沒有一對相撞的。看來蚊蟲比人高明，儘管它們沒有雷達和無線電導航。我不停地抖動着身體，時不時地拍打腿上、背上的「降落者」。「本是同室囚，相殘何太急」我本是無意與你們為敵的呀！這些蟲豸！

……我發表在學生學術刊物上的「疑問與想法」成了學校的爆炸性新聞。一些教師讀了後面有棒色地說：「要在『五·七』年，標準的大右派，腦袋也難保住！」

歷史系一位老大哥學生搖着頭說：「淋漓、痛快，只是恐怕後果……」

他叫高飛，聽說是四、五運動平反後考上大學，文革中是全省有名的青年「老保」，這些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現在的時代，打「右派」的行為將一去難返了，雖然還有可能「降溫」，然而必竟是春天了！

黨總書記從省委宣傳部開過「真理標準」會議後召開了全體師生大會，他針對部份師生的流言說：「……現在，有人傳說要抓耿晨要打他的反革命，這完全是對黨的『三不』（即思想解放運動中的『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方針的懷疑。思想解放運動，我們搞理論教研的人就是要敢於闖『禁區』，鄧小平同志重述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標準——『社會實踐的檢驗！』……要抓反革命，就先抓我……」

學生中的學社和自辦刊物像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政治系的「開拓」，歷史系的「長河

「，中文系的「晨鐘」、「黃河浪」……

從文化大革命到對毛澤東的評價，從「農民起義的革命性質疑」到「民主牆」，日本的崛起、美國的繁榮、中國社會落後的原因與出路、共產黨、社會主義和專政的利弊，直至馬克思主義的局限性、「美」和「愛」的意識探索、「人」的價值……天下國家，無所不談。我們學生會所開關的「大學民主牆」廣場一天到晚人流熙攘，有不少省縣機關的幹部、軍校的學生、不遠數十里下班後趕來的工人……毛澤東時代的統治意識形態面臨着挑戰，師生中「革新」與「保守」的思想也壁壘分明地擺開了戰場，社會上各個階層各種政治意識都能在高等院校找到自己的代表，無怪培根把大學稱做「社會的鏡子」，小字報中把毛澤東罵得狗血噴頭的和念念不忘的都有，甚至有一首詩還有這樣的句子：

「毛主席，您老人家屍骨未寒，
跳出了多少個『永不翻案』；
中國的赫魯曉夫

實現了您預言的『死後政變』」

不光校保衛部、黨委派人做了全面記錄，公安政保系統也前來「咔嚓！」「咔嚓！」地拍了照，有些學生害怕了，而教師們則始終持觀望態度，他們不大相信當政者的許諾。也許學生們過份熱情而激進，也許他們的最後努力被人利用，然而在這場運動中被喚醒（或朦朧地被喚起）的人的權利觀念、社會民主觀念和對新的社會真理追求的欲望却是當權者所永遠無法利用的。這些種子在寒冷的季節也許會僵埋在土下，而春暖之日它們必然會發芽、成長、開花、結果，為下一個冬天之後準備更多的種子。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不正在這周而復始的「春、夏、秋、冬」中變得越來越美的嗎？

爲了把大家擺出的浩瀚的社會現象引向更

深的理性思索，各系學生會經協商決定在「五四運動三周年紀念日」的晚上，召開理論講演會。不知爲什麼，這場行動竟遇到了上至校黨委、下至各系總支的一致反對。記得北京西單民主牆上有一幅漫畫：一輛寫着「中國」字樣的吉普車，華國鋒與胡耀邦搶着操縱方向盤，并回頭問坐在身後的鄧小平：「往哪開？」鄧小平茫然地看着前方說：「走走看看！」那輛破車的排氣管噴着股股濃煙，人民汗流浹背地在後邊推，車子還是走不動。原來在那些輪子和轉動系統下，卡着許多「中層幹部」……

這幅漫畫可以說非常生動地描述了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社會狀況，我認爲中國現階段的「一黨政治、等級授制、權力集中、終身任職」政治架構就是一台效率極差的破車，這種架構原理，主體上還是封建主義政治模式，并不在於司機的技術如何。中國歷史幾千年，總是打碎一次，又用同樣的原理造一台新車。除了第一個司機（開國創業者）還能湊合開一陣子之外，總是越走越毛病越多，轉動裝置的不合理，急劇地產生越來越多的官僚主義廢料，而機件之間的摩擦和污垢的阻塞，不得不浪費大量能源（人材），於是又打碎，同樣再造一台。中國共產黨人設計的新汽車結構基本上沒有突破封建主義政治原理，難怪剛建國就遇上了這麼多的困難。大工業時代的世界是封建主義告終的時代，土造的「解放牌」是無法與「本茨三〇〇型」相比的，更不屑說航天飛機了。

「四、五」講演會頂着「黨」的壓力召開了，會場正中是一幅被夕陽染紅了的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大型粉筆畫。會場中來人不多，學生們害怕，總覺得在黑暗中什麼地方有一種無形的棍子在揮舞。可悲呀！我們的民族！大家帶着悲痛的心情唱起了「龍的傳人」：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龍，
它的名字叫中國，
遙遠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都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有人哭了，爲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爲了那不能實現的理想，更爲我們的子孫仍不能擺脫的劫難。我們唱、我們哭、我們呼喊、我們犧牲……

……同學們來了，默默無聲地和着那「龍的傳人」的旋律，他們不怕……

……我走向鐵窗，扒着那欄杆仰望夜空，古老的傳說還在銀河兩岸閃爍着，那對不幸的情人——牛郎和織女仍然沒有走到一起，而孤獨的老人星還是跪在南天空蕩的星際中，我想起了童年看星星的時代……

……故鄉，夏夜的西瓜地，挑出最甜的西瓜把小肚子脹的圓鼓鼓的，而後在爺爺的破草蓆上躺成一個「大」字。

黃河的夜色是迷人的。蝸蝸與河水奏着「小夜曲」，微風與柳條隨樂起舞。輕烟是從爺爺那裝着乾豆葉（那時的農民抽不起烟葉）的烟袋鍋中噴出的。爺爺的嘴巴真怪，吸進去的是烟，而冒出來的則是無窮無盡的故事：

「從前……」每個故事都是這樣開頭的。
「……有個傻女婿要去瞧岳父。臨走前媳婦交代他：『到家裏可不要說傻話，咱爹喜歡山西木匠做的檀木家具，你可以多誇幾句。』」
傻女婿見了岳父：「喲！岳父大人這茶桌乃是檀木做的呀！」

「不錯！」岳父高興地捋着鬍子。
「像是山西人做的！」
「正是！」岳父想：我這女婿並不傻呀！
童子看茶之後，傻女婿了 瓷茶盅說：「岳父，這茶盅也像是檀木做的，大概也是山

西手藝！」

岳父皺起了眉頭。這時岳母出堂相見。

「哎呀呀岳母大人身體真如檀木所做，也像是山西人做的吧！」

……
有一次，我看見一顆流星瞬間而去，急忙問爺爺那顆星是誰，記得他說過「天上一顆星，人間一條命」。

「那是一個不願安份守己的星，胡跑亂撞，最後落個了短命的下場！」爺爺說。

不知爲什麼，我看不起滿天那些循規蹈矩的星斗，雖然不知道那流星爲了什麼而殞身，但却感到它神秘、新奇。

……演講會越開越熱鬧，辯論的中心議題集中在「四、五」運動的意義上，中文系一個同學在發言：

「我們不同意華國鋒同志及中央一些人對「四、五」運動的說法，認爲「四、五」運動是黨領導下的一切反「四人幫」的運動。什麼反四人幫或擁護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完全是事後政客的扯淡，除了幾個文革中失去權力的「老派」集團子女呼喊了幾聲之外，廣大人民群眾其實是借着懷念總理的哀情來發洩對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不滿……」

高飛談了他在「四、五」之後坐監的情景：「……在獄中聽說粉碎了『四人幫』，心情并不好。我們從文革開始被打成『老保』時就與所謂的『新崛起體系』鬪，這一幫子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是，復辟了的『老派』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文革中揭露出的大量事實證實，他們本來就是一班子腐化的、欺壓人民群眾的官僚主義份子，這也正是『老派』復辟後黨風和幹部作風急劇惡化的根本原因……」

另一些同學同意高飛的觀點，認爲鄧小平搞「四化」不應當依靠這一幫子僵化的官僚主

義老頭子。我認爲鄧不可能不靠這批人，否則他無法上台，這批人是鄧小平統治體系的基礎，但鄧真要「改革」，最終是不可能不踢開這批老朽的。一個人要踢開自己的統治基礎通常是不可能的，毛澤東在文革中改朝換代的嘗試，就是在革新與統治利益的矛盾中失敗的，而鄧也將陷入如下矛盾：要統治就不能不改革，而改革又必然觸動統治集團的利益。因而，統治階級所進行的改革，最終都將在與統治階級利益的衝突中失敗……

「你認爲新的統治階級已經形成了嗎？」政治系一個學生問我。

「關於我國現階段階級的重新分化和形成問題，我在『疑問與想法』中曾探討過，由於政治學術思想史中階級的概念很不統一，而目前中國的階級關係還沒有清楚地顯露出來，雖然以執政黨爲基礎的國家官僚階級在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占有權和支配權方面具有特殊地位，但這個階級中的權力分配，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事物中的作用以及消費資料的分配方面都有很大差異，最上層的政治家其狀況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和資本家還要好，而這個階級的最下層則與工農群眾差不多……」

一個農村來的學生打斷了我的話說：「什麼差不多，當個生產隊幹部就比社員油水大得多，如今還是『大小當個官兒，強似賣大烟兒！』」

「……關於我國現階段的階級狀況，我們準備抽時間開專題討論會，我想我們還是圍繞『四、五』問題繼續發言吧！」我糾正了話題。

「我發現這樣一個問題：鄧小平大規模地鼓吹『四、五』運動的作用，但爲什麼不重用參加『四、五』運動的積極份子，例如北京『四、五』運動的知名參加者××、×××，南京的×××，我們鄭州二、七廣場事情中被迫

害的×××以及今天在座的高飛同志……」歷史系一個北京學生說。

高飛接過來說：「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鄧小平從內心清楚地知道『四、五』運動的實質是什麼。在那場魚目混珠的潮流中，經過文革激盪的各路『豪傑』，各種人物都有，造反派、保守派、逍遙派、觀望派，雖然他們在文革初期爲中共不同的政治集團所利用，但經過文革的教訓最後大家趨向了共同的道路；中國的希望不能寄託在任何一派官僚和政客身上，無論他們是保守的還是所謂開明的，是打了『文化革命』的旗幟還是換成『改革』的旗幟，其根本都還是要實行對國家權力的專制獨裁，這一點大家是已經不再抱希望了。」

而鄧小平也清楚地知道『四、五』派這種思想，但是他認爲中國的問題不是制度問題而是人的問題。毛澤東不行，毛澤東的那一幫子人不行，而只有鄧小平行，因而他的改革實際上是要用自己的一幫子人來實行舊制度。那麼，他當然不會欣賞我們這些帶有強烈民主意識的新生力量啦！而且說句良心話，我們參加『四、五』運動，完全是信仰的召喚而不是權力的引誘，不被重用恰恰證明我們對中國共產黨的現狀認識是正確的，而若被重用那倒反常，倒顯得不可思議，中共目前已經很難吸收具有新思想和具有獨立精神的社會人材了，這也決定了它的改革，它自身的中興之不可能性并加速它的老化……」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呢？」外語系一個稚氣的女孩子發出了一句簡單而又最複雜的問話。

整個會場靜寂下來。窗外，不知是哪裏的女孩子嗚聲嬌氣地和着錄音機在唱：

……人生難得幾回醉
不歡更何待

來！來！來！

再乾一杯吧……

雖非商女，亦不知民族落伍之辱，可憐的胞兄胞妹們，還有那十萬萬純樸而愚昧的父老兄弟們。不知是誰嘆了一口氣。

我望着牆上那緋紅色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慢慢地站了起來，感慨而悲愉地說：「同學們！我想我們這一代人，並不是也不應該是像父母告訴我們的那樣，是生長在蜜糖罐中的。一個社會的進步，一個民族的崛起，不可能經過一場革命就什麼都完成了，中國社會前景并不樂觀，但也不悲觀，現實就是這樣：中程導彈

與牛車並存，電腦和鐮刀都在使用中，若要問

，我們應當怎麼辦？我想舉這麼個例子來回答，假如在歐亞版塊的最東部需要建築一座新的時代的大廈，那麼我們這一代需要將腳下的這個深坑先填起來。雖然大家都想做這建築物頂層的那輝煌的標誌——如艾菲爾上的星杆或由神手中那火炬，但目前的中國需要的是奠基石。所以，我們應去奠基，在那最陰暗和最潮濕的大地之下，將未來光輝燦爛的高大建築——崛起的中華背負在身上。也許在後人的油畫和圖片上看不到我們的影子，但站在宏偉頂樓上的子孫一定會想起在他們的腳下，有一些前

輩馱着他們，就像那些馱着兒子的慈祥的父親，他們會送給我們一個值得欣慰的甜美的微笑和靜靜懷念，這還不行嗎……

……同學們都低着頭在想什麼，他們一定在想未來那個光榮的時代，陽光、花和民主制度下的孩子以及她們的聲笑……

我雙手緊緊地抓着獄窗的鐵欄柵向天空張望着，天快亮了吧？（待續）

耿晨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日

訪女作家叢甦談世界 ● 人物專訪 ●

筆會與中國現代文學

李昂整理

前言

世界筆會(PEN INTERNATIONAL)自一

九二一年在倫敦成立以來，不僅在國際文字交流方面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在維護世界和平、爭取作家人權等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貢獻。本屆筆會世界代表大會於五月中旬在日本東京舉行，大會除了主題討論之外，還討論和通過一些保障作家人權、爭取創作自由的提案，其中有關於聲援魏京生和台灣「美麗島事件」被捕作家的提案。因此，本屆筆會引起了海內外民運人士的普遍注意。爲了讓對這方面有興趣的讀者，能更詳細地了解本屆筆會的情況，我們專訪了剛從筆會回來不久的叢甦女士。

對海外文藝界稍有了解的中國人都知道，叢甦女士不但是當今著名的「現代派」作家，

並且爲人熱心正義，性情開朗。因此，在國際文藝界的社會活動中，她很自然地成爲一個爲大家歡迎的活動家。

叢甦女士早在六十年代，就和白先勇等青年作家，成爲當時台灣「現代文學」的主要代表。後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取得英國文學碩士和哥倫比亞大學圖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她先後發表了《中國人》《君王與跳蚤》《想飛》等等五部文學著作，現任美國洛克勒圖書館館長。叢甦女士自一九七七年起即爲國際筆會會員，八一年又被選爲世界流放作家協會美國分部秘書。本屆筆會，叢甦女士是做爲世界流放作家的代表參加的。

吳儉祥：叢甦女士，聽說您參加筆會已經好幾年了，相信您對筆會的發起和發展一定很

了解，您是否能先介紹一下筆會成立的時代背景？是誰成立的？以後筆會又是以怎樣的形式來活動的呢？

叢甦：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因爲戰勝國對戰敗國實行嚴厲的懲罰政策，同時戰敗國亦有強烈的復仇心理，所以一次大戰雖然結束了，但一些國家之間的關係却繼續惡化，民族之間的矛盾也在尖銳化。這樣下去只會爲人類釀成反復無窮的戰爭，直到把整個人類文明全部摧毀爲止。有些人認爲，爲了挽回這種世界，爲了使人類能夠和平共存下去，必須先治好國家、民族等關係上的傷痕。那麼，首先民族之間就需要有彼此重新的了解和認識，國家之間亦應建立新的關係與溝通。在這種時代背景下，筆會於一九二一年在英國倫敦成立了。

筆會的創建者是道遜蘇格特夫人(MRS. C.A. DAWSON SCOT)。約翰賈爾司沃斯(JOHN GALSWORTHY，一八六七—一九三三)是筆會的首屆會長；賈爾司沃斯是一個小說家，他的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一系列描寫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 PERIOD)的小說(THE FORSYTE SAGA)。他在一九三二年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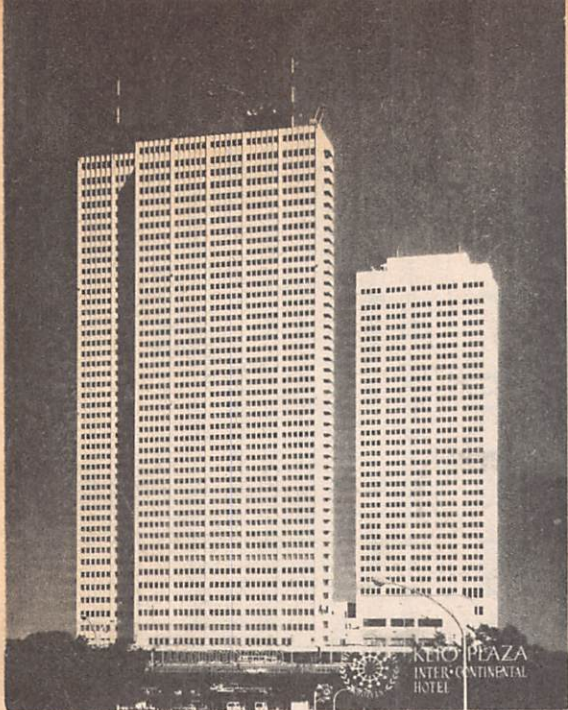
筆會 (PEN) 的本意是詩人、散文家或編輯，和小說家 (POET ESSAYIST OR EDITOR AND NOVELIST) 的協會，由五十八個成員國組成。東歐很多國家有代表，但是蘇聯沒有代表，而是由東德代表克拉希 (H. KEISH) 作為發言人。

筆會每年舉行一次大會，主要由會員國的正式代表組成。同時也有很多小會，即區域性會議，小會的多寡一般根據情況的需要而定。大會的會議地點是一年換一次。如去年的會址是委內瑞拉，明年的會址可能在漢堡，但尚未最後決定。筆會大會的官定語言是法語、英語。這次因日本是東道主，日文也作為大會正式用語。

李昂：請問筆會的宗旨是什麼？

叢麴：筆會的宗旨都已清楚地記述在其章

本屆世界筆會會址：日本東京洲際大飯店。



程上。

第一，各國文學在其風格和形式的根源上有它的民族特色，但在它的本質上應是無國家和民族界限的，應是宇宙性的。另外，不管它處在任何政治和國際上的騷擾下，它都應始終在國家之間保持溝通。

第二，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特別在戰爭時代，作為人類偉大遺產的文藝作品，都應當受到國家的保護。

第三，筆會會員在任何時候，都應以他們善於理解、長於互敬的天賦來影響社會；會員應盡最大的努力去消除民族、階級和國家之間的仇恨，並為實現人類和平共存的理想而奮鬥。

第四，筆會聲明維護言論及出版自由，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內的壓制、剝奪言論自由的行為。

吳儉祥：看來筆會不僅僅是一個學術方面的團體，同時也很強調維護人類和平，保障人權及作家的責任等。這次東京會議上的主題是什麼呢？它的概況如何？

叢麴：大會於五月十四至五月十八日間在日本東京召開，為期五天。與會者來自世界上四十九個國家正式代表約七十多人。中共代表團有十五人，正式代表四人；台灣二十一人，正式代表為兩人。

這次會議的第一個主題是「文學在核子時代的作用」。因為將近二十年前筆會在日本開過，而這一次日本又是東道國，所以他們為此頗感榮幸。他們認為這是一次多年難逢的大好機會，所以他們對大會的籌劃非常好，對每個正式代表的待遇也不錯。不過他們總是在「核子時代的文學」(LITERATURE IN NUCLEAR AGE) 方面大作文章，因他們是二次世界大戰中核子武器上的受害者。他們講

他們為什麼受害，並展示了長崎、廣島被襲時的照片，然後又組織旅遊團到東京的博物館等地去看，反正總是以核子受害者的姿態出現，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平。因他們在談及他們當時的行為時，他們並未提及珍珠港事件。也沒有提及南京大屠殺。大會代表不好公開揭東島事件的因果內幕，當時有一個菲律賓代表講了一句頗為耐人尋味的話：「各位代表，在二次世界大戰中，菲律賓也有我們的長崎與廣島」。當時我也接着說：「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我們中國南京的大屠殺也是我們的長崎與廣島」。

最後大家都認為吃了人家(指日本人)的飯而不好意思，結果還是把日本筆會主席亞蘇希以諾 (YASUSHI INOUE) 選為國際筆會的副主席之一。

大會的另一個主題是「作家與人權」。因此大會還討論了幾個議案 (RESOLUTIONS)，如聲援波蘭作家的提案，要求中共釋放魏京生提案，及要求台灣當局釋放美麗島事件人士的提案等。

吳儉祥：要求釋放魏京生和台灣美麗島事件中作家的兩個提案都是誰提的呢？它們的產生動機，醞釀過程如何？

叢麴：關於魏京生的提案是我代表流放作家的名義提出的。因禮拜四就是正式代表會議的最後一天，所以我在禮拜三晚上就擬出了提案的初稿，其內容是：

筆會流放作家遞交議案

大會代表請世界筆會會長致電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在日本東京的第四十七屆國際筆會全體代表要求立即釋放身心被嚴重摧殘的活動家兼作家魏京生。

然後我拿給大會秘書長看。他看後感到措詞太強硬，因為筆會主席不久要到中共去訪問，同時也怕中共不易接受，所以我又改了一下，提出第二稿。內容正是：

在日本東京的第四十七屆國際筆會大會代表托請筆會會長在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際向貴國最高領導人索詢活動家兼作家魏京生健康狀況的資料。

這樣一改，會長就同意了，然後我就在第二天的會上提了出來。

吳儉祥：當你提出這個議案時，中共的代表反應如何？

叢甦：我提出這個議案的那天，中共的四個正式代表都缺席，據說他們事先得到了消息。不過我們則要求會長在訪問中共時直接向鄧小平先生探尋魏京生近況。

至於有關美麗島事件的提案，是瑞典代表所提。瑞典代表不信任台灣代表和中共代表，所以會和我商量過。我希望他們縮小所要求釋放的人員名單，以便增加提案的可行性。然而他們認為，若只在提案上要求釋放一兩個人，其他的人則會感到難過，所以他們沒有接受我的建議。同時我還指出，提案中求釋人名單中有非作家，可能會受到台灣代表的非議（後來果然如此），這個也被他們否定了。

這個提案提出後，台灣代表要求將此提案推遲一下，因他們考慮在蔣經國就職之際提出此事不太適當。（總統就職大典將在五月二十舉行）。瑞典代表則要求大會會長立即發電報給蔣經國，要求釋放獄中的林義雄、黃信介等人士，但台灣代表堅持推遲，所以決議電報在五月二十號以後再發。

李昂：爲什麼一個西方的國家會提出一個有關中國人的提案？他們是否對台灣當局在人權問題上有特別的了解？

叢甦：從筆會歷史上來看，每一個筆會成員國都可以認領坐牢的作家。當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瑞典代表就認領兩個有關的作家，即陳菊和呂秀蓮，但陳菊並非作家。至於爲什麼瑞典代表會提出這個提案，則是完全出於人道主義的動機。絕不是瑞典代表與台灣當局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

吳儉祥：這次大會，海峽兩岸都派這麼多代表參加，看來他們還是相當重視筆會的存在。除學術交流外，是否還有其他的目的？

叢甦：當然他們很重視筆會的了。也許他們想趁此機會來了解一下世界新文學上的發展。不管他們有什麼目的，我認爲他們的參與本身就是個好事。

李昂：因你講這次大會的另一個主題是關於「作家與人權」，所以，我想這個主題無論是對中共或是台灣，都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問題。派代表來傾聽一下國際間對這一主題的議論，以便檢討各自的得失，這也許是雙方的目的之一吧。

叢甦：我想，不管一個國家有多大，蘇俄也好，美國也好，當然中共亦不例外，他們都害怕國際輿論的壓力。

吳儉祥：您和海峽兩岸的代表都有接觸嗎？對他們雙方有何看法呢？

叢甦：我是屬於世界流放作家美國分部代表。和西方作家交往較多。當然，和大陸、台灣的代表也有接觸。一般來說，我覺得中國人，在國際場合中，不喜歡單獨地受人注視，而喜歡以小組或小群的形式出現，也許是因語言上的障礙。尤其中共的代表總是一起行動。

叢甦：巴金是本會邀請的八個貴賓之一，也是最年長的。因爲日本正打中國牌，所以巴金所言所行頗受日本各界捧場。不過有人認爲巴金的演講詞並不太好。當巴金談及他會以自



THE 47th INTERNATIONAL P.E.N CONGRESS IN TOKYO, JAPAN
MAY 14-18, 1984

己的生命來拯救一個曾在廣島遇難的女孩時，一個英國代表說：「一個偉大的作家不僅敘述真理，而且要履行真理」。

當我到台灣後，聽說兩岸代表在會議期間曾有往來，中共代表有人主動去找年輕的台灣代表，並進行頗爲特殊、密切的交往，好像帶

有一種政治性的交流。中共代表宣揚他們的統一祖國的宗旨，台灣代表則以國民黨的反統戰宗旨作為宣傳的內容，同時還希望中共代表能到台灣去參觀一下。

吳儉祥：台灣代表這樣的表現很好，比「三不」政策進步得多了。就像在這次的奧運會中，兩岸的運動員亦將公開接觸，交往總比不交往好得多，儘管意見不一致，但總會增加彼此的了解。

李昂：東京大會剛結束後，你們這些代表還有什麼其他的活動嗎？

叢甦：十九日大會結束後，有些代表們去參加會後的旅遊節目，我却要到台灣去，許多人問我為什麼不在日本旅遊。因他們知道台灣即將有蔣經國就職之事，所以在那個時候去台灣也成了一個較敏感的事情。其實是他們不理解這完全是一個巧合而已。

吳儉祥：你在台灣有些什麼活動？請你談一下好嗎？

叢甦：當我到達台灣後，黨外一些報館要求我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但我拒絕了。他們會問及關於美麗島事件的提案是不是我在東京會議上提的，但被我否定了。不過我却講了有關魏京生的提案，所以有關魏京生提案的新聞，第二天即在許多黨外報刊刊載了。因考慮到蔣經國的就職，我要求黨外雜誌、報刊不要立即刊出有關美麗島事件提案的新聞。

當我和台灣的黨外朋友談及黨外勢力和國民黨的對比時，他們認為目前黨外還沒有足夠大的力量來取代國民黨。一位號稱「黨外的黨外」人士則表示說：若是有勢力黨外取代國民黨，他們會比國民黨還壞。可見有些人對民主運動的前途持有極不樂觀的看法，不過我們還是應當肯定民主運動的必要性，因為假如沒黨外民主運動的壓力，那麼執政黨就不會主動的

改進，至少不會改進那麼快。如果把黨外勢力看作一種制衡的力量，那麼它多少還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吳儉祥：台灣在一定範圍內，還是有言論自由吧？

叢甦：一定的言論自由是有啦，不過有幾個禁區。如不能批評蔣經國，不能批評戒嚴法，不能談中共的「三通」和「美麗島事件」。

李昂：就像在大陸人民不能批評中共的「四個堅持」一樣。

叢甦：當我到台灣的第三天，我便隨朋友去看正在住院的國大代表周清玉，她是還在獄中的姚嘉文的太太，她已停止絕食。我和她講，我是不相信暴力革命的，也同時反對台獨。有的台獨分子就根本不要做中國人，我絕不贊成。但是我支持黨外的民主運動。她聽後也表示同意我的觀點。

至於台灣的國民黨，它和大陸的共產黨都有不少相似懲人法術，如台灣的國民黨有時喜歡給他的反對派亂戴帽子，譬如「台獨」、「匪諜」等。中共在大陸用的免費帽子當然也不少……

吳儉祥：反革命、叛徒、間諜、國民黨特務等等，太多了。（笑聲）

吳儉祥：我覺得任何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只應通過民主討論的方式來解決，而不應通過法律形式來解決。我曾問及一些台灣所謂的政治犯，他們之中有些並非政治犯，而是暴動犯、叛亂犯。

叢甦：不過你應曉得台灣已堅持很久的一個論調就是「台灣沒有政治犯」。

李昂：那麼你對此論調的看法如何？

叢甦：那就要看政治犯的定義是什麼了？根據兩岸多年來所實行的政治策略，顯而易見地不少坐牢的知識份子都是和他們持不同政見

的人。這樣地話，兩岸任何一方說沒有政治犯都是不能夠成立的論調。

叢甦：離台的前一天，我見到了中國國民黨秘書長蔣彥士先生。他是比較開明的官員。我請他釋放兩個人，就是林書揚、李金木，已在綠島坐了三十多年牢的兩位人士。據說他們是因二二八事件進去的，直到現在未能出來。他們本非作家，但我基於作家人道主義來為他們請命。我認為他們都是六十多歲的人啦，即使讓他們出來，他們也不會再造反了，假如國民黨能釋放他們，這將會對國民黨的形象有益無害。蔣彥士先生則答應幫我打聽一下這一事件，同時他還留下了我在美國的通信地址，他說一旦他有了結果便可以和我聯繫。

吳儉祥：你倒真是一個為民請命的作家。叢甦：後來蔣彥士又主動提及美麗島和高雄事件，他講高雄事件中的林義雄將有被大赦的可能，但他未透露究竟在何時釋放。（林義雄就是他的媽媽和兩個女兒都被殺了的那位）相當淒慘的。至於「二二八事件」，這是國民黨的「禁區」之一。但是我認為他們應該公開地正面地做歷史性的檢討與談論才對。因為政府對事情的真相越迴避，那麼人民就越發懷疑，結果是欲蓋彌彰。

李昂：海峽兩岸被隔絕幾十年來，雙方在文學創作方面都有很大的進展，那麼你對此有何看法？

叢甦：我曾看了一些大陸的傷痕文學，就文學水平來講，我認為有很多作品已達到了世界水準。其中很多已寫得相當好。不過中共的文藝政策如果不變，那麼大陸的文學創作將會受到很大的約束。如中共對這次筆會的東京會議所派的代表中，除以巴金作樣板外，像劉白羽等全是黨棍打手之類的人。中共為什麼不派劉賓雁、白樺等這樣的作家來參加呢？同時台

灣的代表中也有黨棍之流人物。而像陳映真、李敖、柏楊這樣的作家却被排在圈外。我認為兩岸都應真正實行百花齊放的政策，使人們能夠真正地自由創作，使作家有權力如實地描寫社會的各個層面，而不至於被亂扣帽子。

吳儉祥：自鄧小平重新上台後，從他在大陸所貫徹的經濟政策上來看，總的來說還是「放」。但在思想領域的政策，却是放放收收，像鐘擺一樣左右不定。最近在大陸開展了批判人道主義、現代主義、存在主義和異化論的運動，請問你對這些運動有什麼看法嗎？

叢麤：這還要回顧到一九四二年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既然在其文中肯定了階級文學，黨性文學，那麼任何人要寫人的普遍性，那就會與毛澤東的教條相抵觸。但我不認為人生下來就有階級性，人是應具有宇宙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懂有階級性。實事求是地講，工人階級中真的沒有壞人嗎？地主階級中絕無好人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

人的出生是一個偶發事件。一個偶發事件怎能決定處在極為複雜的社會環境中的個人的好壞呢？這是犯了一個極為荒謬的機械主義教條的錯誤。可是中共至今仍將毛澤東的文藝教條作為聖經來奉行，這樣我們對大陸的文學創作的前途就很難抱有樂觀的態度。

吳儉祥：實質上中共對文藝的政策仍是整個專制的體現。

叢麤：所以我的態度是很悲觀的啦。如艾青、巴金、曹禺等都受過中共相當的迫害，可是他們一旦重新被捧出，並成了既得利益者，他們就把過去的傷痛全部忘記，並且反過來替中共作傳話筒，打擊別人，更不敢講真話。實在是可悲。

至於人道主義，我曾在《爭鳴》雜誌上看

到了幾篇轉載批判人道主義文章。他們講的人道主義還是要注重它的階級性，而非宇宙性。如你若愛人就要愛他的階級屬性，否則的話就是濫愛了，這是根本講不通的邏輯。如工人階級是好的，所以你愛工人階級。那麼工人階級中就沒有壞蛋嗎？若有，那麼你愛工人階級，也愛那些壞蛋嗎？如果工人階級中能有壞人，地主階級中也能有好人，這就證明人是具有宇宙性的，而不應被階級來限定。肯定人的宇宙性，共同性，普遍性，這就是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

吳儉祥：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假如雷鋒在某一車站上遇到了一個需要幫忙的老大爺，而又不知道這個老大爺是地主、富農或是貧下中農，那麼雷鋒是否會幫助這位老大爺呢？假如知道了這老大爺是個地主或富農，那麼雷鋒是否應當打他兩拳呢？這實在是一個很荒唐的事情。

叢麤：至於現代主義，從技巧上我認為它有很多可行的地方，如當年我們一些在台大寫作的朋友們就被稱為現代主義者。我們在所辦的《現代文學》上就用一些現代技巧，譬如意識流，象徵技巧來創作。其實現代主義的許多內容，如象徵主義，在台灣來說，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對西方世界早已不算什麼新鮮的事，至少也有五、六十年的歷史了。不過對中國大陸的文學創作，還是有很多可取的地方。起碼是技巧上的創新與突破。

至於存在主義，它在兩岸都背了很多黑鍋，因為它被許多人曲解與誤解。存在主義中也有很多不同派別，但較有代表性的就是沙特的存在主義，具有積極的作用。沙特存在主義的中心思想是：生命本來就是一張空空的白紙，你有了行動以後，你才會有的內涵。他認為人並非生命本身的存在而存在，而應是因生

命的力量所產生並使其生命本身增加意義的行動的存在而存在。沙特存在主義對二十世紀的西方國家影響頗大。

存在主義比較頹廢的是以卡繆（CAMUS）為代表的，他的存在主義具有相當程度的悲觀性與無奈性。但沙特存在主義的影響在西方世界來說，遠遠超過卡繆的。

我認為中共不應禁止和攻擊存在主義，而應該公開討論並介紹。以真正了解存在主義的內涵。否則地話，人們更是搞不清，以致作出一些毫無根據的批評。

至於異化論，黑格爾和費爾巴哈早就談論過這個問題，後來馬克思在他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也談論了這個問題。從他們的一些哲學論述中可知，異化，就是人外化於他自己存在的本來形像。異化又可分為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異化等。特別在號稱社會主義社會的大陸，異化的存在更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如許多知識分子會去餵豬、養牛等，數學教授被迫去打鐵等，這就是異化。如中共一貫稱自己是人民的公僕，其實他們却享有比主人還高的官僚特權，而主人——人民却受着奴隸般的待遇，這就是政治權力的異化。另外，毛澤東當作神一般地被人崇拜，毛思想亦像宗教思想般被人信仰，這就是宗教和思想上的異化。然而中共目前却又不敢面對事實，硬說社會主義和中國沒有異化存在，同時還在打擊、批判對此敢講真理的人們。中共既然不敢承認問題的存在，那又怎麼能解決這些問題呢？怎麼能把中國建設好呢？實在是令人痛心。

吳儉祥：時間不早了，我們也已經談了很多問題。非常感謝你犧牲一下午的時間向我們提供了這麼多寶貴的資料和知識，我們希望將來能有更多的機會來拜訪和請教你。

叢麤：謝謝你們。

中國迅速發展經濟最有效的形式是什麼？

兆立

中國目前由官僚特權階層所控制的「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不但是「弊端百出、效率低下、浪費驚人」，而且使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寄生在這個制度上的官僚特權階層，壟斷了一切政治經濟的權力，享受種種物質上的特權，而在政治上剝奪了絕大多數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權利。這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我們是不能讓它繼續存在下去。

中國是需要變的。但是怎樣變呢？以什麼樣的經濟制度來代替這個「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呢？換句話說，使中國的經濟能夠迅速地發展的最有效的形式是什麼呢？這就是我與劉萬禎同志討論的焦點。我在《中國之春》第四期「還是計劃經濟好」一文中，主張「由下而上的由工人所監督和管理的民主的計劃經濟」。劉萬禎同志在《中國之春》第八期「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一文中，則主張「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如果劉萬禎同志的意思是：讓人民群眾由下而上地訂定一個符合於短期和長期經濟發展需要的計劃，然後有協調、有目的地依照這個計劃去生產，再以市場作為計劃的考核和生產的核算，將結果輪回到計劃的修訂上，我就百分之百地贊成他的主張，我與他之間就沒有什麼爭論了。

可是劉萬禎同志不是這個意思，他認為計劃經濟是「構成官僚特權體制的溫床」、「違反了經濟學原理中生產是爲了人類實際需要的

根本原則」、會「限制生產力」、會引起「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總而言之，他認為計劃經濟本身是原罪，是禍魁。

劉萬禎同志認爲克服以上這些現象的唯一辦法是推行市場經濟。他說，「商品生產的市場經濟」，「表面上看來很亂，很複雜，集夾著競爭的恐怖，也正是這些象徵經濟的飛速發展。另一方面，市場的供求關係……恰恰把他們串起來，自然調節他們之間的關係，自然克服他們之間的矛盾。」

他的這個說法使我不得不和他爭論了，因爲他這裏所說的「商品生產的市場經濟」事實上就是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商品生產的一般化。而這個商品生產的目的與原動力是利潤，爲了追求高額利潤，資本家就要互相競爭，就要爭奪市場。這樣一來，生產就變成盲目，就成爲無政府狀態。一些本來利潤高的工業部門，由於大家要擠進競爭，生產出來的商品太多了，因而賣不出去。於是資本力量比較薄弱的企業就不得不停工或減產，引起大批工人的失業，也連帶地引起了種種社會的問題。這就是劉萬禎同志所說的「亂」、「複雜」，與「競爭的恐怖」。

生產過多的商品，由於賣不出去，它們的價格就被減低。另一方面，企業的停工或減產，使市場上的商品的數量減少，原先賣不出去的商品又有了顧客，這樣，市面又開始繁榮。這就是劉萬禎同志所說的「市場的供求關係……

自然調節他們之間的關係」。

但是，「市場的供求關係」能夠「自然克服他們『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嗎？不能夠的。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是不會消除的。生產過剩、工廠停工、工人失業，及經濟危機等等現象，一定會經常地而且週期性地出現。

可是，劉萬禎同志在他的文章中爭辯地說：「我們現在大可不必就心生產過剩的問題：如果國家真正地做到生產全面過剩，中國人民也就真正富強起來了。」他的文章以美國資本主義爲他的「市場經濟」的典型，以爲只要推行商品生產的市場經濟，中國就會達到全面的生產過剩。

其實，問題不是這麼簡單，美國資本主義之有今天的發達，自有它的客觀的歷史的原因。自從一七七六年美國的獨立戰爭以來，它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在這兩百多年中間，它經歷了一八一二年與英國爭奪北方領域的戰爭、解放南方黑奴的內戰、十九世紀下半葉向西部的擴張，以及向世界問鼎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才達到今天的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地步。我們可以說，美國資本主義的歷史是不斷地擴大市場的歷史。

中國的資本力量何嘗不想在中國的領域之內擴大市場，發展商品生產呢？不幸的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出生的太晚了，它在清朝末葉開始發展的時候，整個世界，包括自己的國家

在內，早已被帝國主義者劃分為勢力範圍了。自從鴉片戰爭到一九四九年這段期間，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與農村的半封建的土地關係，國產的商品在市場上競爭不過舶來品，在農村又因無地的、窮困的農民太多，打不開銷路。所以，資本主義始終沒有辦法在中國蓬勃地發展起來。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頭幾年，中共本來是在「勞資兩利」的政策下，繼續讓資本家掌管大部份工廠和企業的管理權。可是客觀局勢的發展強迫中共統治者的主觀的願望。資本家不但用金錢來腐蝕中共的負責幹部，並且進行盜竊資材、貪贓枉法、投機倒把等不法的活動。當這種進攻達到威脅中共政權的存在的地步，它才通過「贖買政策」把資本家的工廠和企業收為國有，並且把斯大林在蘇聯所實行的計劃生產搬過來應用，這就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的起源。

如果現在倒回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的市場經濟，中國會達到全面的生產過剩嗎？不會的。事實上，所謂生產過剩不是生產品真的多到沒有人買，世界上有那麼多窮人，那裏會有生產品太多的道理？它是價錢太高，很多人買不起而已。

如果中國現在走上資本主義的軌道而把國家的大門大開的話，它就會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舊路。很多企業就會因為商品在市場上競爭不過舶來品而倒閉，大批工人就會因此而失業，窮人的數量會大量增加，貧富不均的現象就更會惡化。這那裏會產生全面的生產過剩的現象呢？

所以使中國能夠迅速發展經濟的最有效的形式，就不應該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計劃經濟的本意是要克服資本主義的種種

弊端，它要消除生產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它要使經濟資源的分配按照社會所決定的優先次序，而不是按照盲目的市場力量與利潤的規則。它要解放生產力，它應該是使經濟繁榮的必要手段。

不過問題是由誰來決定這些優先次序。基本上說來，只有兩種決定優先次序的方法：一種是由上而下的強加給群眾（生產者及消費者）的官僚方法；另一種是由下而上的經過群眾的權力機構由生產者及消費者自己來作決定的民主的方法。

中共官僚層所控制的「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就是第一種方法的一個主要的例子。從劉萬禎同志的文章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個方法是非常浪費、非常沒有效率。它不但使計劃失調，而且有系統地窒息工人階級的創意力。在中國目前的具體情況中，它過份地重視重工業及輕視輕工業，它過份地重視公共的積累及輕視人民的消費，再加上官僚階層的特權享受佔有了一部份的國民收入，因此這個方法使一般人民的生活長期以來得不到改進。劉萬禎同志稱這個方法為「國富民強」的道路，其實，操縱國家機器的官僚特權階層是「富」了，但是人民大眾的財富却沒有什麼「增加」。

第二種方法就是我所提出的「由下而上的由工人所監督和管理的民主的計劃經濟」。這個方法並不是第一個方法在「行政管理形式」上的改變，它是在政治內容上的徹底改變。當經濟的計劃是由生產者與消費者自己所組成的權力機關民主地決定的時候，它就會以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為前提，使重工業、輕工業與農業之間的投資的資金的分配，以及使積累與消費之間的資金的分配，有適當的比例。為了防止這些代表及管理人員變為官僚，權力機關還會規定這些代表及管理人員由生產者與消

費者選舉產生，而且隨時可以被後者所撤換，同時他們的薪金不得高於工人的工資。

我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過中國是需要變的，但是往那一個方向變呢？如果照劉萬禎同志的意思發展「商品生產的市場經濟」的話，這就表示向資本主義的方向發展。其實，在官僚層之內，特別是它的負責生產管理的一翼之內，就有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因為他們為了追求穩固的社會地位、收入及特權，就想與某一企業或企業集團有永久的聯繫。換句話說，他們有把他們的企業或企業集團變為他們的私有財產的趨勢。這樣就可以保證他們的物質特權和社會地位永遠穩固，而且還可以保證把這些物質特權和社會地位傳給下一代。中共官僚層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密切聯繫，更加深了這個趨勢。我們可以從趙紫陽在最近訪問美國及加拿大時，專門與資本家應酬，看出一點端倪來。

但是，這個向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一定會受到工人階級的反抗，因為工人階級不願意失去經過了他們多少年的奮鬥所建立起來的工作權利與工作保障。這個發展只有經過一個社會制度上的反革命，打破工人階級的反抗，將政權轉移到資產階級的手中，才有可能。我想，劉萬禎大概不希望中國走這條道路。

如果中國要往前走，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要實行「由下而上的由工人所監督和管理的民主的計劃經濟」，就需要在政治制度上有徹底的改變，使政權從官僚特權階層的手中轉移到工農群眾（即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手中。不過經濟制度的主要結構，如集體財產制、計劃、對外貿易的壟斷，及某些市場機能的殘存是不能改變的。這個具有新的政治內容的現有的生活方式，就是迅速發展中國經濟的最有效的形式。除此以外，沒有別的道路。

《毛澤東書信選集》與胡喬木

遲耕

中共中央為紀念毛澤東生辰九十週年而發行的《毛澤東書信選集》，是繼《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之後，官方出版的毛的第六卷正式文集。《人民日報》的長篇評介文章稱這本三十萬字的書信集是「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的重要文獻」。相信這本「毛選」不會比不久前發行的《鄧小平文選》更暢銷，大陸的新時代可能對它不屑一顧。但是，鑒於毛的歷史地位并未最終確定，他的形象仍在當前以至相當時期內對中國政治產生某種影響，因此，對這本文集仍有研究一番的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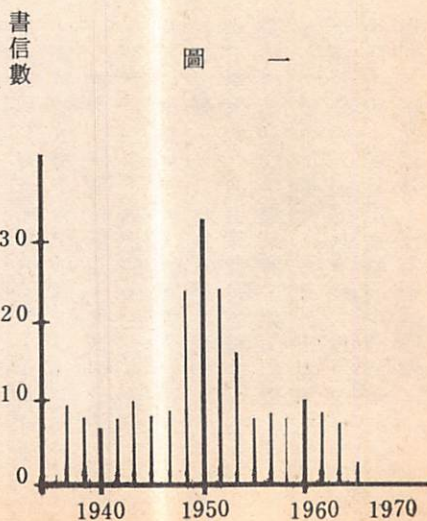
通常，帶有私人性質的書信要比正式著作更富於個人特色，更能反映作者的人格和風貌，但是，如果從一大堆信中精心挑選一小部分出來，那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據報導，現收存的毛澤東書信共一千七百餘件（包括二百件「短信」），「書信選集」選載三百七十二件，約為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二。縱覽全書，不妨說，與其相信這些信件的代表性，不如更相信它反映了選編者的意向和需要。

選集內所收書信，除二十年代八件外，其餘三百六十四件選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六五年，正好三十年，即長征結束到陝北起至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這三十年的信件；每年約選十封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建國前後三年（一九



四九至一九五一）選得最多，五〇年達三十二封。五九年之後選得甚少，五九年至六五年共選四十三件，佔總件數的百分之十二，五九年是黨內發生建國後第一次大論戰的一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被毛打下去。而文革期間至七六年病逝，一封信也未選入。《人民日報》文章解釋說：「『文化大革命』期間書信很少，這次都沒有選入。」

圖一顯示各年選信的多少，頗有象徵性，它的起伏同中共對毛澤東的官方評價大致吻合，這一評價的要點是「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即肯定毛建國的功績，而毛發動的文革只是一場災難。



但是，選集的「出版說明」中強調：「這本集子，對於學習和研究毛澤東思想，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有重要的意義。」如果說這「意義」包括毛澤東「功過」的經驗教訓和中共歷史上的成功和失敗，那麼選集的選編就在若干重要時期和事件上掩蓋和粉飾了歷史。

黨內鬥爭是毛澤東畢生投入的事業，尤其在最後近二十年內是他主要的工作和嗜好，也是他留給世人用以觀察極權制度的最有價值的記錄。可以肯定，毛一定有不少的書信涉及這些曾經多次驚天動地的鬥爭，但是，這樣的書信，選編者竟一封也沒有選入，六百多頁的書信讀完，你看不到中國曾有過反高饒、反胡風、反右派、反彭德懷、中蘇爭吵、四清、文革等大鬥爭，甚至「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也不留痕迹。延安整風僅在一處略為提到。

有些曾經公開發表或非正式發表的著名的信件也未收入，如五九年八月給張聞天的信，五九年四月關於農村問題的黨內通信，六一年七月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信，五九年九月給詩刊編輯部的信，六六年給江青的信。

試問，一系列重大事件淘汰得如此乾淨，

粉飾歷史

對研究毛和黨的歷史，有何真實性可言？顯然，文集的選編者有意給已經褪色並出現裂痕的一尊偶像披上一縷外衣。可謂用心良苦。

欲蓋彌彰

按收信人身份分類，書信數如下：

黨內同志——一百二十八件

文化學術人士——八十五件

親友——八十二件

親戰人士——七十七件

《人民日報》評介文章說毛在國共合作時期的書信「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語言生動，文字優美，堪稱文情並茂之作。有的甚至可以作為範文，選入語文課本。」過去對毛選的官方評論是不可能作這種非政治性的頌揚的。這本書信集正是塑造了一個有人情味的，溫文謙遜的、從善如流的毛澤東形象。誠然，毛不僅會寫文章、會做詩，也有他的私生活（過去發表過他的「情詩」，但這本書信集卻沒有選一封情書，也沒有一封給江青的「家書」），他是神，也是人，公眾當然樂意看到他作為一個人的真實面貌。比如馬克思的信都收在「全集」中，未作取捨，人們可以從中尋到一些著作中沒有的東西。文化史上出版書信全集的著名人物不乏其人。

但是，毛的這些精選的書信都給人以欲蓋彌彰之感。比如五六年二月致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信中說：「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當時有位蘇聯學者對毛評孫中山世界觀有不同看法）衆所周知，毛在整肅黨內與黨外人士時也一貫說要區別學術與政治，結果區別了多少？同時，這封信是否意味着非學術的政治問題就不能對領導

人有不同意見？

關於「民主黨派」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同民主建國會主要負責人黃炎培的通信，共收十七件，（為書中收信最多之人）黃對毛十分崇拜，常向毛匯報思想和學習馬列心得，為毛器重。一九五二年黃已七十四歲，提出一個要求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報告，被毛批為「太激進了一點」，但仍稱贊他「思想前進甚快」，並任為副總理。後又出謀改造資產階級用「無痛分娩法」，為毛所婉拒。最後黃官至人大副委員長。書信集編織毛與黃的友誼的同時，正是毛不斷教訓民主人士的時候，五七年毛叫嚷：「梁漱溟、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毛選五卷三五五頁）「長期合作共存」之心何在？

所選與文化界人士的通信也無不尊師重道謙敬有禮，如五八年給周谷城的信：「我對邏輯無多研究，不敢有所論列，問題還在爭論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適宜。作序的事，不擬應命，可獲諒解否？」但毛插手文化界的爭論還少嗎？這位建國後曾要蘇聯給他派理論助手的天才領袖，不僅把蘇聯的哲學、政治經濟學批得體無完膚，而且連坂田的基本粒子學說都插了一手。

最荒唐的是，被《人民日報》稱贊的毛六一年代的書信反映了他重視調查研究的思想，文集選了致田家英、鄧小平，張平化等人的信件，彷彿毛最重視大躍進，人民公社中發生的問題。這有什麼意義呢？事實十分清楚，彭德懷，劉少奇在那時候先後同毛發生分歧，正是因為他們掌握了調查資料，進而反對毛的盲動狂熱，毛脫離了調查研究，也不信任別人提供的資料，以致屬下不敢給他報憂。（現有多篇回憶錄提及這一點）接着，六二年十中全會，毛

就以階級鬥爭為號召，發動了對務實派的全面進攻。

書信集在欲蓋彌彰的同時，有時也不經意地流露了毛的某些思想實質，僅以四三年四月致何凱豐信為例。這是關於延安整風的唯一的封信。信中談到整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問題時說，目前還是讓它暴露的時候，目前不宜動手。這與五七年反右的「陽謀」手法如出一轍。信中又談到「我的思想」還沒有成熟，「不是鼓吹時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斷去鼓吹，不宜當作體系去鼓吹，因我的體系還沒成熟。」可見後來的個人迷信運動，是孕育已久的，文革中毛厚顏宣稱，沒有個人崇拜不行，正是延安的鼓吹慾望的承繼發揚。這封信足以揭穿那些把毛的責任推到林彪江青身上的巧言粉飾。

胡喬木的政治資本

《毛澤東書信選集》的出版，也許給我們提供了一點線索，以觀察中共高層的內部動向。這本書在編輯的技術方面，也存在不足之處，首先是信件沒有註明收發地點，這對嚴肅的研究是一大缺陷，九百餘條註釋規格不統一，且過於簡化，人名有的缺註，重註方式各異。

引人注意的是註釋中，似乎有意突出胡喬木的位置。選集中選了致胡的信八件，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六一年。在此期間胡任毛的秘書，如果加上前後的任職時間，估計胡任毛的秘書不少於二十年。註釋中本可以「參見本書第××頁」的一般方式作註，然而却重複地註了十二次「任毛澤東的秘書」。

書信顯示，胡深得毛的信任，與毛關係甚為密切。在任秘書期間並兼任過新華社社長、新聞總署署長、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要職。七五年鄧小平復出時，曾倚重他及胡耀邦，人

中國人的形象 是誰改變的？

王亦令

象了。」以及「凡是炎黃子孫，不管持什麼護照，不管立場是什麼，對中華民族的自豪感應該有。」

然而，我完全不同意鄧小平的如下論斷：「新中國的成立，改變了中國人的形象。」鄧氏口中所謂的「新中國」，當然是指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把海外華裔人士地位的提高，歸功於中共建國，那是大錯特錯，壓根兒不是那回事。

首先，不管你歸罪什麼樣的路綫干擾，或者推諉幾人幫造成的浩劫，這都是你們自己窩內之事，總之是你們建國三十多年，使中國在國計民生方面，與世界各國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加大，莫說比不過先進國家，甚至比不過某些當年的戰敗國和殖民地。你們建了國却治不好國，憑什麼「改變了中國人的形象」？這豈不是毫無根據的瞎吹胡謔嗎？

我沒有在世界上到處跑，但我在美國却是從東到西各處跑過，確實知道至少在美國的中國人地位是提高了，與上代大不相同。美國各公私機構中，華裔人士當主管已非稀罕事。所有的名牌大學中都可看到華裔教授、系主任，甚至當校長。全美前十名首富，就有中國人。上述這一切華裔人士，都是憑學問、憑技術、憑本領，靠自己勤奮努力，當然也不負他（她）們血管內優秀的炎黃血液，而出人頭地的。沒有什麼中國政府給他們撐過腰。鄧小平想把這些華裔人士的成就，攬到中共的功勞簿上，真可謂「貪天之功，以為己有。」

鄧小平更斬釘截鐵說：「改變中國形象的不是滿清，不是北洋軍閥，也不是蔣氏父子。」這句話裡的「滿清」和「北洋軍閥」早已煙消雲散，可以撇開不談，若說「蔣氏父子」，我認為不可一筆抹煞。我從未到過台灣，而國民政府在大陸崩潰前夕的貪污腐化無能，我是

印象深刻的，所以我對傳聞蔣氏父子到台灣後如何如何，只能存而不論，我無意對台灣三十年來的施政置評。然而，有一點明擺著的活生生的事實是：近年來在美國大有作為、為我民族揚眉吐氣的華裔精英分子，幾乎清一色都是在易手前的大陸或是在台灣成長及受基礎教育的。這個事實大概沒有什麼可爭辯的餘地吧。基於這一點，隨你如何數落蔣氏父子這也不好、那也不是，但退一千步、退一萬步看，在他們治下，至少培養了大批人材，保存了中國的根本命脈。反觀共產黨統治下，起碼有十年之久大肆摧殘文化，斷傷了國家命脈，貽誤了億萬青年在人才的大好光陰，坑害了整整一代的青年！如果到今天還不對此痛心疾首，深自愧悔，反而口吐狂言，則真不識人間尚有羞耻事矣。

我並不反對任何人——包括鄧小平在內——稱頌海外華人的成就和今天的地位，但我堅決反對中共自欺欺人、厚顏居功。這也許並不全是鄧小平的過錯。是那制度害了他。他也許並不存在心吹牛、說大話，可惡的是數十年來，中共開動了全部宣傳機器，散佈「新中國地位空前提高」的諸般神話，吹噓中共是全世界的革命燈塔，世界各國非「帝」即「修」，都是窮途末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日中天，「風景這邊獨好」。謊言重覆三遍尚且能夠成爲真理，何況不斷嘮叨了三十多年之久？難怪連鄧小平也信以為真，像服食了大麻一樣，輕飄飄起來。

時至今日，如果中共真想勵精圖治，那就必須趕快拋棄一切政治迷幻藥，不要再自我陶醉了。

今天是七月一日，是一貫自詡「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的誕生紀念日。秀才人情紙半張，謹以此文，作為賀禮。

（甲子六月寫於美國加州樓雲閣）

鄧小平在會見香港議員時，發表了若干宏論，其內容業經官方透露，世人都已知道。諸如什麼「中國收回主權的立場堅定不移」、「港人治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以及「香港議員並不代表香港民意」之類的論點，外界評議已多，本文不擬涉及。我在這裡只打算討論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近年在世界上地位提高，是誰之功？

我絕對同意鄧小平的上述三句話：「中國人不是低能的。」「你們在世界上到處跑，可以看到，黃面孔的人不再是被欺負、被侮辱的對

對大陸經濟的淺見

丘岳

中國大陸自一九七九年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改革、整頓以來，雖然不斷遭遇到從「左」面而來的干擾，但時至今日，大體上說來是成功的。而五月十五日趙紫陽總理在「六屆人代會第二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更進一步地確定了容納自由經濟、提高生產效率、追求利潤，以及明確提出一個國家，兩種體制的構想。

雖然，確立上述的觀念和構想，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安撫被「九七」問題弄到人心惶惶的港人，意味着對台灣拋出新的統戰策略。但是，同樣確保了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漸漸走向開放。

事實上，為了配合六屆人大所肯定的經濟模式，國務院在較早前已作出開放十四個港口城市，引進外資加速發展的決定。而在五月十日，則作出「關於進一步擴大國營工業企業自主權的暫行規定」。該規定主要是增加企業自主權，在自銷時可在國家規定價格的上下百分之二十的範圍內自行定價。企業自行確定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廠長（經理）、黨委書記由上級任命，廠內中層幹部由廠長任免，並包括自行招工、晉級和開除職工及對獎金自主分配等。

大陸的企業在上述規定公佈後，即表示是給國營工業企業鬆綁擴權。以往廠裏的股室長由上級委任，他們穩坐「鐵交椅」，永遠是幹

部，級別和職務只能升，不能降。現在由廠長（經理）任免，則「鐵交椅」已被砍掉。

特區的開放，容納自由經濟發展、企業自主權的擴大，實質是逐漸放棄過份的中央集權所實施的計劃經濟，讓權力下放，使地方企業能大展拳腳。加上個體經濟戶的大量湧現，政府對此，不但不予以制止，相反却不斷在黨報上、輿論上加以肯定。摒棄以往一切都「統」的作法，相信定能帶來經濟的發展。

不過，大陸的工農業發展，仍面臨着很大的困難。由於放寬了農村的經濟政策，自由市場一片興旺，去歲農村的平均每人收入較八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點七，增至人民幣三百零九點八元。雖然該收入和先進國家的農民收入對比還差得很遠，但畢竟是一種好的轉變。去年農業總產值中，種植業的比重，由過去長期佔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下降為百分之六十三；副業的比重由百分之七左右升到約百分之十五，漁業比重則保持在百分之一，仍然比較薄弱。種植業比重下降而副業比重上升了一倍多，表現了已徹底拋開了毛澤東所提出「以糧為綱」的典型保守思想。

但是，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生產效率提高。在人口眾多的家庭，將出現過剩的勞動力，在整個農村，勞動力過剩將達到數以千萬計。而由於工業發展尚屬緩慢，農村中過剩的勞動力，大部份不能以轉而從事工業生產來求出路。因此，祇好以個體戶的形式從事商業或

城鎮小手工業，這樣又加速了那方面的飽和。這些失業者加上每年大批的高中畢業生，成為一支浩浩蕩蕩的失業大軍，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近年來，大陸殺人、強姦、搶劫、放火、爆炸、貪污、盜竊及拐賣人口等罪案增多，青年沒有出路實在是一大因素。而單是去年八月至今年二月，已約有六千人遭處決，近五萬人入獄。

為了解決人口過剩，大陸提出了節育及「

集體收工后，張玉堂一家又到自留地淋花。



只生一個孩子」的口號。這個運動在城市中頗能收效，然而在農村，其收效甚微。這除了因為固有的封建思想觀念外，主要原因是「包產到戶」，只能對勞動力強的家庭有裨益，勞動力弱的家庭，本能地反對這一政策。因為現時農業機械化仍是一片空白，農民主要靠雙手去工作，勞動力弱的家庭，吃「大鍋飯」實在比「包產到戶」要好。因此，節育盡管推行，在農村却不能奏效。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實在頗費心思。

在工業方面，雖然已有了很多改革和措施，但是却存在幾個致命的弱點。去年國營企業的虧損，國家損失達一百億美元。

今年二月廿四日，人民日報在一篇題為「努力開創提高經濟效益的新局面」一文中就指出：「一方面能源、原材料不足，建設資金缺乏；另一方面，各種消耗指標很高，資金利用率低。在流通領域中，一方面有些商品收不上來或賣不出去，造成積壓和浪費；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這些商品又供不應求。」這兩年來，大陸的能源生產已由下降轉為

上升，但增長速度很慢，能源的緊張局面沒有緩和。在開發能源和交通建設方面，規模很小。大規模的南海油田開發，到目前雖打了數口井，但仍未見油面，何時能產油，仍是一個未知之數。

根據資料顯示，能源消耗，指標很高，先進地區與落後地區之比，相差極懸殊。例如，億元產值耗標準煤量，上海祇是二萬多噸，江蘇、浙江、天津要三至四萬噸，而最高的地區竟達到廿五萬噸。一百元人民幣資金，實現的稅利，上海是七十五元，最低的省竟不足五元。

商品不能流通，除了因為收購價格過低，農民寧可自己把產品拿到農貿市場賣外，工業產品因按計劃指標生產，其質量、款式追不上銷售者的需要，而做成大量的貨品積壓。此外，亦因交通落後，產品不能輸往邊遠地區及交通費的漲價所造成。

來自「左」的方面干擾仍十分大，現時卅餘至四十開外的企業中層幹部，大部份是「文化大革命」中入黨升職的。這些人被清除出黨

的並不多，他們思想上受「文革」左毒影響甚深，他們是既得利益者。由於出自維持自己利益的本能，因此他們便指責目前經濟改革是離經叛道；指責發展個體經濟是背棄公有制。他們不希望企業自主權擴大，不願有任免制，因為這無疑會打破他們的「鐵交椅」。

另一方面，阻力同時來自於習慣努力。不少官高位重的幹部卅多年來早已在安樂窩中消磨了鬪志，他們最大的心願是安享晚年，不希望有重大的改變。因此在談到「左」的教訓時，慷慨陳詞；談起改革，口頭上積極擁護，但一接觸實際，便顧慮重重，裹足不前。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大陸的改革新派在對待經濟已採取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且可以肯定，祇要這種開放政策繼續推行，定能獲得較好的成績。但是，工農業發展仍面臨極大的困難，改革仍受到多方面的阻力。如何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相信是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對《科學民主主義提綱》一文

的一點不同意見

●讀者來信●

朱明

貴刊十一期上發表的「科學民主主義提綱」一文，不但全面系統地歸納和分析了我國社會史的結構與現實。並且比較符合當代民運志士的思想觀點。但我個人對於其中一句的兩個字，即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對這「浩劫」二字，提點我個人的認識和建議。

中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共產主義在中國動蕩的客觀存在，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

。即使中國共產黨不搞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也會出現另外的一個什麼運動。這是共產黨四十多年來的實踐已證明了的。它總是周期性地三、五年，七、八年來一次，它的生存規律是不運動就有被推翻的危險，所以，只有不斷運動才能相對地保持他的穩固性。為此，毛澤東也不得不發起這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提法是錯誤的

。我不認為是「浩劫」。當權者以「浩劫」作為壓群眾保自己的護身符。如果說「十年浩劫」就是強盜打劫了十年，那麼，廣大的群眾參加了文化大革命都成了「浩劫」份子。而這個浩劫的頭子又是誰呢？這個提法的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為此，我建議：在科學民主主義提綱中，可否刪去「浩劫」二字。改用「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比較好。或者選用更恰當的名詞來取代之。

以上建議供參考，有不當之處請指正。

中國留法學者 朱明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

台灣當前政治問題僅在於自由民主不足嗎？

政光

近年來台灣言論尺度開放甚多，有關政治性批評或建言常見於報章雜誌及議會中。其論點多為台灣當前體制、法統與政風問題。筆者以為政治是社會各層面發展的綜合表象，單以法政角度來探討台灣政治上的問題而忽略社會、文化、歷史、經濟等影響深遠的因素，則分析未盡周全。不過台灣興起的民主言論似乎多只針對政治制度與執政國民黨作為而發。果真台灣政治問題全是來自民主自由不足嗎？是制度不夠健全合理嗎？那麼一些與政治利益無關的事項，諸如衛生、交通、環境清潔應無問題發生了？衆所周知，台灣交通之混亂，世界聞名。環境污染、公共場所不守公德也頗嚴重。這是否在說明社會上很多問題的產生是與政治之外的原因有關？即使僅就政治問題而言，國民除需建議批評外，是否也應負有責任呢！

西方日本究竟何處戰勝我國

以近代各國為例，少有社會進步繁榮、科技經濟發達的國家却在政治上黑暗不修。反過來看，經濟、科技落後的國家却多是政治社會混亂。在二者之間還有一類的國家，其民主程度不差，但其它方面却乏善可陳。可見進步國家的產生是有賴多種條件的配合，政治是其中重要但非唯一的要項。

百年來中國不斷遭受西方和日本經濟、軍事侵略，執政當局無不思革新振作。自清末「洋務運動」、「變法維新」乃至中華民國成立後均多次師法西方措施以圖強。到底西方和日本強過中國之處何在？是船堅砲利？是科學技

術？是議會憲法？以上這些先進國家勝過中國的有形建設是「結果」，中國真正落後的是缺乏西方和日本進步的「原因」——現代化的精神。我們以往只承認外國物質、制度領先，却拒絕檢討社會習性的腐化頹敗。是故不斷自外國引進新制度、新科技却始终發揮不到應有的水準，且也很難在本國生根。

近代西方文明的演進受經濟發展的推動極大。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中日兩國在作法上有極大的差異。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始，便大量翻譯歐洲法政、經濟著作，並頒佈「教育敕令」，大力推展全民教育。同樣以發展經濟來說，日本有關「經濟史」與「經濟思想史」的著作、譯本很多，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起源、背景、過程及對政治的相互影響都有詳細的介紹。使文化背景殊異的日本人民對認識西方社會進步的因素大有助益。與日本相比，中國這方面的譯述太少。縱然在今天台灣，有關這方面的譯述、學者仍極其有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以往只是在抄襲模仿西方的制度，並不明瞭其進步的真正原因與動力。對於發展現代化的國家，也只以為僅需要科技與所謂的民主制度。我們追求的是西方建設的「形」而未學其「質」，反觀日本不但學「形」，又吸收了西方長處的精髓再配合固有文化，因而自創出一番成就。對於西方民主制度，中國的執政當局了解其歷史、發展過程、優點缺失有多少？國民認知的程度又若干？是否也如同對西方經濟史一般的陌生呢！

社會習性有背民主理念

「民主」，簡單的說，便是以多數的「民意」為「主」來治國。這種型態下的政治體制能否運作良好與民衆的學養、民主水準有關係。無可諱言，中國近代的社會習性確有可議之處，以致我們在經濟、社會、科技等各層面也遇到如政治問題般的困境。若干國人的傳統習性確是有背民主理念。

(一)守法、公德不足——在自由民主的國家，「守法」與「公德」是維持紀律的要素。到過美國、日本的朋友可發現，當地人民在公共場所均有凡事自動排隊的習慣，強行插隊不是遭人提醒，就是受人注目輕視。反觀國人這方面作法如何？久為人詬病的乘車爭先恐後、隨地吐痰拋紙屑、不守交通規則比比皆是。在團體中，少數人為自己方便或突出個人而破壞規章制度。真令人感嘆國人紀律性、公德心之不足。當然守法精神之不足，執法不嚴是促成之原因之一。少數違法者僥倖未受懲罰，久而久之守法的多數國民就會發生動搖。不過守法精神之可貴在於自動自發成爲良心榮譽；嚴刑重法是初期過渡的手段，靠恐懼鎮壓來控制並無長久之效。至於鑽法律漏洞、投機取巧雖明法無法禁止，但此應如同西方人重視「誠實」的原則視爲道德操守之一環。

(二)派系糾爭——綜觀歷史，中國政治上結黨營私、派系鬥爭之多各朝均不乏記載。宦官太監之爭、文臣武將之爭、大臣儒生之爭、新派舊派之爭、王位繼承之爭，不但有礙國家安定，朝代的衰微亦與此有關。社會上省籍之分、同宗之分、校友親戚之分多所常見。本來「

「合群」是人類天性，但國人却容易將派系轉為相互鬥爭傾軋的集體工具，各派系間形同水火不易相容。在民主體制下，若各黨派集團只以本身之利害為出發，彼此攻訐缺乏寬宏容忍的度量、異中求同合作共榮的胸襟，則對任何團體組織並不有利。

(二)團體感不高——從觀察學校社團活動中可發現，大多數的社員對團體事務並不太熱衷。大家常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吃虧」、「坐享其成」的心理，吝於付出心力也少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俗語說：「一個和尚打水吃，二個和尚挑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又云「一個中國人勝過一個日本人，三個日本人勝過三個中國人」。諷刺國人不能團結，人多不是力量的整合而是力量的加速渙散。如果多數的份子缺乏熱心與實際的行動，只靠少數主事人推動團體不但事倍功半，日久也減低了團體的功能。待利益有關的事件來臨時，因缺乏團體力量來反應，最後受害的還是團體份子本身。從另一角度來講，多數人平時對團體事務不關心，可能導致少數人把持團體以行私人之慾，造成多數人利益的損失。在民主社會中，構成力量相互約束平衡的各政黨、自治團體、中立性組織（消費者聯盟、學術協會、慈善機構）都需民衆積極參與支持方能發展茁壯。也唯有團體力量的累積方能構成總體社會國家的進步。

四公私不分——國事不是私事，既是為民

這種公私不分、意氣用事的態度，對於原本應理性超然的議會政治絕非助益。

(四)特權意識——國人長久以來認為從政即身份地位不凡，殊不知官員議員是為民服務、為民公僕，不是特權階級。若干議員獲選後，作風行為即有所不同。輕者自認高人一等，儼然特權姿態出現。重者與黑社會勾結、經營不法或是為自己事業圖利，以公濟私。反觀美國議員若有違法行為受法律制裁為選民所唾棄。議員涉及敗德事件，亦有被議長傳至台前，當全議會同僚之面予以申斥，政治前途大受影響。而當前台灣具有特權意識的議員並非全屬國民黨籍，非黨籍議員亦有在其中。

(六)分析研究不足——國人在儀器設備投資鉅大的自然科學上的成就遜於西方日本，那麼社會科學如文史、經濟理論、行為科學上是否領先？其實落後更遠。平心而論，我國人對於精密分析、創新研究的精神並不普遍。不僅自然科學需要分析研究，政治亦需同樣的功夫。施政計劃、議案的擬定應出自研究，提案建議為何而來、有何根據、方案的評估、技術性的考慮、考核的評估不宜僅憑人為的觀察、常識性的反應，應以數據為本，具體證據作為基礎。如此得出的議案較為客觀，更具說服力，可減少各說各話、無從查證的弊病，一些不必要的爭端也因此容易平息，同時議案的本身也更具建設性。

美國議員絕大多數具有大學教育程度，並曾擔任州或聯邦行政機構職位，或歷練企業管理的工作，具有相當的學養行政能力。相對而言，台灣地區議員平均水準不及美國高，是故台灣議會政治水準遜於美國。惟近來逐漸有高度專業訓練出身的議員進入政壇，是為一進步現象。

加強民主教育

中國有近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中華文化的輝煌博大至今為世人所稱頌。今天談到這些實在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我們祖先為我們留下這麼多的成就，使中國人擁有足以自豪的文化寶藏。憂的是現代的中國人準備留下什麼給後代子孫展示？難道還是祖先傳給我們的藝術、建築與烹飪？

建設現代化的國家，需要均衡性的發展，才不致成為畸型的社會。我們的國家社會能否



●台灣反對派領袖全登發被捕後，黨外人士繼續示威，並引起衝突

長久穩定，是否只繫於政治制度的轉變？中國的未來是以政治制度的成敗來決定？民主制度就是勝利成功的保證？筆者以為過去我們所失敗的正是過於強調制度的移植，却疏忽民主文化的紮根，國民所熟悉的是歐美民主名詞，却瞭解歐美民主精神有限。如果我們再不重視此點，民主很難在中國壯大。因為沒有足夠的、多數的高水準議員與國民，整個民主的品質不易提高。在位在野的政治人物術德心胸不高，中國政治上的惡性循環依然無法根除。如何造就高水準的民意代表與國民？這根本的辦法就是在於——加強民主教育。

所謂的民主教育是現代化知識與精神教育中的一部份，三者分別近似於我國「處群體」、「求學識」與「修身」的概念。三十餘年來台灣的教育是偏重於「智育」，對於增進國民科技知識和繁榮經濟上確有重大的貢獻。但「群」育與「德」育則效果不彰。因而導致台灣當前經濟發展迅速，但社會、文化、政治的進度配合不上。相反地經濟詐騙、暴力犯罪、仿冒抄襲、享受奢華却日趨風行。可謂智慧提高，但道德却未同等地提高。在面臨經濟升級轉型的期間，有關法令、人才、企業組織，瓶頸有待突破。這些問題不是光用錢與科技就能解決的，人的觀念想法須儘速革新才是解決之道。

影響民衆的教育力量來自學校、家庭、社會教育，尤以後者為活生生的教材，也是社會風氣的具體反應。很明顯地，現存的這三個教育體系並沒有提供有效的民主教育，而黨外言論刊物著重於政論批評，也沒有注意民主理念的引進。如果說檢討施政缺失，使民衆瞭解什麼是不良政策為目前黨外功能的話，那麼下一階段的工作應是教導民衆：(一)什麼是較好的決策。(二)如何去比較各決策的考慮因素、效果差

異。(三)歐美日本民主發展史。(四)先進國家以往如何處理政治上的實際問題。此刻的重點應是以思考查證性的概念，逐步取代「民主的」、「自由的」抽象層次了。再進一步的發展應深入及(一)專業技術普遍通行於決策形成，(二)中國、西方政治機構功能的差異調整(歐洲國家的體制亦有獨特之處，不宜忽略)，(三)比較中西文化與民主政治的價值取向，(四)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良好民主社會。黨外組織若能發揮其影響力於監督、教育民衆之上，並且以新的政治風範為民表率，提升本身的意境層次，則自長遠看來不僅有助於席次的獲取，也可促進中華民族邁向民主的速度。執政的國民黨同樣也須付出心力來改進民主教育：(一)在長期之中，宜在國民教育內加重「群」育的份量，使學生有健全的態度來從事任何團體性的活動。(二)自高中開始，介紹西方民主發展及思想史，使年輕一代認識西方民主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特色。(三)在社會教育方面當前可借重大眾傳播媒體開闢民主教育節目。(四)印行中央民意機構的質詢會議及預算審核經過的書面完整紀錄發售，使民衆有機會了解議會中各方意見是如何地表達。(五)選定時間，以電視轉播中央級議會質詢的過程，以便國民能比較官員、民意代表的表現及與歐美議會之不同。

結語

如果將國家比喻為人體，則有識之士如同人腦指揮中心前瞻未來的方向，下達命令給居左右腿的黨外與執政黨行進。二腿一致行動方能產生有效的動作，缺一腿則成跛行癱瘓。但構成全人體血液肌肉的國民素質更亟須不斷地更新強化，方能源源不斷輸送活力養份供雙腿運作，否則人體徒具肢骸並不能發揮力量。台

灣的政治問題表面上看來似是民主自由不夠充份、革新幅度不夠大，但真正的核心在於民主教育不足、民主文化未能深植人心。如果未來黨內黨外仍只作著政治地盤的爭奪，攻訐性的指責，却不關心在根本上如何幫助全民對民主自由的體認、培養正確的參與態度，那麼隨時間的流逝，我們不能假定國民的民主素養自然與時間成比例成長。在今天民主意識普遍萌發之時，在台灣的所有政治力量應該特意積極採取措施來促進民主教育的強化，不宜再拖延。

部份人士謂：在台灣國民黨與大陸共產黨在推行民主的成績與誠意上是「五十步笑百步」，大同小異。實際上見過近年台灣生活者會瞭解，今天在台灣的國民黨已不是一九四九年前大陸時代的國民黨了。「五十步笑百步」，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國民黨已領先對手五十步了。台灣與大陸所面臨的政治問題並不盡相同。簡而言之，台灣民衆的期望標準是與歐美日本特別是向美國看齊，所以難免會有所失望。很少人認為以三十五年的時光，台灣工業技術能趕上歐美日本，那麼三十五年就能及上先進國家的民主水準？課題是再多久才能趕上？透過什麼步驟來達成？這個答案是值得我們共同深思考量的。

中共的功過各人均有看法。有一點不爭的事實，是中共長久以來忽視荒廢了教育與知識，使人民知識、人格、生活教育開了倒車。「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計」，斷喪民族生機的生長真是影響深重啊！中共今天正想在各方面恢復建設，教育的「質」和「量」上準備怎樣作呢？是只強調科技，壓抑人格、民主？如果中共只想以經濟、科技的現代化來支援國防現代化，成為共產軍事帝國，對外「宣揚國威」、對內加強控制，如此並不是全中國人民之福！

旅美雜感

王魯生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失望中死去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國作家、新聞記者。她可能是中國人最熟知的美國作家。當年曾寫了幾本有關中國的書，替中共吹噓捧場。一九五八年她得罪了蘇共當權人，便被蘇共驅逐，於是便乾脆投靠了中共。

一九七〇年她去世時，周恩來對她給以厚葬，以報答她替中共吹噓的功勞。

最近美國蘭登出版公司出版了關於她的第一本傳記，是她侄兒替她寫的。傳記中引用了她晚年的好多信件。在這些信中，安娜一再對親友說，她對共產主義極為失望。她死前曾去信給她的一位知心朋友說：「我對這些（共產黨的）罪惡二十五年前就知道，我所以不說出來，是因為我相信共產主義，希望有一天共產黨會變好。」可惜她沒等到共產黨變好，就去見馬克思了。

由她的信件判斷，她也像很多中國年青人一樣，當年曾為共產主義欣喜若狂，但後來却發現自己的狂熱蒙蔽了正確判斷，不免感到受了共產黨領導人的欺騙。但「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她只好在灰心失意中死去。

凡是在美國替共產主義吹噓的華裔人士，都應該讀一讀這本傳記。

人貴表裡如一

高雄市有一位議員，經常在議會中講道德，說仁義，指責警察在取締色情營業方面不夠積極，疏忽職守。

市民一定認為該議員是個議員樣板，值得大家稱頌。實際上他對警察的指責是一種掩護——掩護他太太明開飯店，暗營色情。

今年六月八日警察查到張太太所經營的八克拉餐廳在地下室經營地下舞廳。因證據齊全，張議員縱算趕到現場，也無能為力了，只好接受勒令停業。

表裡如一，言行一致是政府官員最基本的品德，這種議員怎能為民喉舌？

聯邦制的優點

爲了替中國的統一設計，近來很多人提出了聯邦制。我不知道這一制度是否爲共產黨及國民黨所接受，不過這一制度的確有甚多優點，最近發生的兩件事就是最好證明。

最近，全麻州，甚至全新英格蘭地區的熱門音樂都在眼巴巴的等待邁可·傑克遜到法可司堡（Fodorough）來演唱，但法可司堡城的三位市政委員却一致通過拒絕把他們的沙利文球場租給演唱會用。俄國人正罵邁可·傑克遜

出賣了靈魂，一聽大爲高興，但所有的新英格蘭歌迷則群起而攻之，大罵這三位市政委員。你知道邁可·傑克遜嗎？假如你不知道，這證明你對熱門音樂孤陋寡聞。他是目前全世界最紅的歌星，今年史無前例地獨得八項「歌樂美」獎。他的「驚心」（Thriller）已登上「金氏世界紀錄」，成了歷史上最暢銷的一張唱片。

不能聽這麼一位歌星唱歌，不但歌迷大罵，甚至很多政要及麻州議員也對三位市政委員大加批評。

大家雖大聲吵叫，但麻州州長說他絕對不使用州長權力推翻三位市政委員的決議。

再以新罕布什州來說，數年前州長決定要在海邊一小鎮設立煉油廠，但該小鎮鎮民却投票反對，州長也只好作罷。

以上兩件事證明了美國聯邦制優點，同時表示州長尊重地方人民的意見，絕不濫用上級長官的權力強迫人民，強迫地方政府。

無論在大陸或台灣，當地人的意見是不被尊重的。無論是原子發電廠還是賽馬場，只要政府決定建，小老百姓豈敢阻止？大陸及台灣的領導階層看到美國州長的這種作法，不知有何感想？

台灣也有弱小民族

今年六月九日的「中報」用半頁的篇幅轉載了「前進周刊」一篇「王玉雲家族迫害外省人」的文章。

不問這件事有百分之幾的可靠性，但在台灣長大的人們都了解這種事件絕對有其可能性。

由這一事件，我不禁想起台灣也有一個弱小民族，這個弱小民族就是大陸人。台灣人士一直喊叫台灣人受壓迫，實際上

他們忘了大陸人才真正是弱小者。在台灣當權的大陸人也不過是一小部份人。大多數的大陸人都是在艱苦中過日子。台灣人大半都有土地，因國家政策及土地的漲價，台灣人都成了財主，但大陸來的人則相形見拙。

筆者有很多台灣籍的親戚朋友，同班同學也一大半是台灣籍，所以我絕非挑撥省籍之間的感情，只希望台灣主義者及不僱用外省人的各種公司行號應以公正合理為原則，不要因省籍作為任用的標準。假如以籍貫為用人標準的話，在美國的華裔人士可能全部失業。

大家都認為美國有種族歧視，我却認為美國政府及各界已做得差強人意。假如黑白問題發生在中國，情形一定比美國更糟，不知各位讀者同意否？

宗教領袖應以身作則

統一教是最近崛起的宗教。因為這一宗教的作法與正大宗教不同，所以令人側目。台灣已把它定為邪教，不准設教。美國為一宗教自由的國家，所以統一教擁有很多信徒。

宗教都是以拯救人類的今生或來世為目的，應以潔身自愛為宗旨，教主更應以身作則，盡力擺脫世俗人的欲望。

很不幸，統一教教主文鮮明却不知檢點，因逃稅罪名被美國最高法院判刑，最近就要入獄。

文鮮明先生是韓國人，站在黃種人的立場來說，我們對他非常同情。又因為我們同是黃種人，我們也希望文鮮明先生多多潔身自愛，以後不要再逃稅。

宗教首領都應該是清心寡欲的。如不能做到此一地步，就無法率領徒眾了。

共產黨和國民黨真願要

一部公正的民國史嗎？

中共費時七年，將於明年完成並出版「中華民國史」。國民黨一看共產黨棋先一着，於是立刻急起直追，動員了五六百歷史學家，將出版「中華民國建國史」。將與中共的「中華民國史」一較長短。

在這兩本書沒出版之前，雙方的御用歷史學家便開始互相攻擊，台灣的歷史學家說中共在篡改歷史，中共則說國民黨掩蓋事實。由雙方的攻擊看來，我們就知道「中華民國史」及「中華民國建國史」的出版仍是政治第一，事實則居次要地位，大家不免各說各話。

我們知道中國的確需要一部公正權威的近代史及現代史，但一直到現在這部歷史尚未出現。

中國沒有公正的近代史或現代史，便不是說中國沒有公正的歷史學家。而是這些歷史學家不敢說實話，因為一說實話就可能惹上殺頭之禍，當年台大歷史學教授吳相湘因在他寫的歷史中說了一句實話，結果遭國民黨開除黨籍，從此便被列入黑名單。大陸上的歷史學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就更慘。

共產黨和國民黨雖互相攻擊彼此所寫的歷史不公正，讀者們也知道他們不公正，那麼我們不禁要問：共產黨及國民黨真願要一部公正的民國史嗎？

筆者敢打賭。共產黨和國民黨絕不是真心要一部公正的民國史。假如他們真願要一部公正的民國史，筆者建議共產黨及國民黨各出資五百萬美金，讓海外歷史學家寫一部中華民國史。也開放書禁，讓所有的中國歷史書自由進口，讓人民自由閱讀。

筆者並不是說海外的歷史學家全都比大陸

及台灣的歷史學家高明，但他們至少受過學術自由的薰陶，也敢公正大敢地說真話。歷史不是頌詞，也不是宣傳品，它的價值在於真實。歷史如失去真實性，便是垃圾。共產黨和國民黨那麼多金錢、時間及精力製造一堆垃圾，實在是太大的浪費。

共產黨和國民黨敢接受這一挑戰否？如敢，就請出錢讓海外的歷史學家寫中華民國史。

消除「三信危機」

要先從領導階層做起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承認大陸上有「三信危機」，看起來有知過必改的計劃與勇氣。

「三信危機」的形成，可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原因也極為複雜。不過消除三信危機的方法却甚為簡單。這就是當政者要言而有信。

任何政權如沒有固定的政策，朝令夕改，後起的當權派推翻前任當權派的成就及政策，人民便無所適從，對政府失去信心。要使人民對政府產生信心，當政者一定要言出必行，不可隨一時喜怒而行事。

但最近中共領導階層在香港問題的處理上却加深了人民對當政者不信任。

前國防部長耿飜及前外交部長黃華皆公開表示中共將來不駐軍香港，沒想到鄧小平先生忽然大喝一聲「胡說八道」，把耿、黃二人的承諾推翻。

依常情判斷，中共接管香港後，香港絕無力起而造反，或「反攻大陸」，所以中共駐不駐軍實在是件小事，但獲得世人的信心才是大事。鄧小平先生的一聲「胡說八道」不但喝破耿、黃二人的膽，也喝破了海內外華人的信心。

中共高喊四個現代化，應該知道實行現代化的第一步驟是建立科學的行政管理，而科學

行政管理最重要一項是分層負責。我們希望中共在香港問題上把職權劃清，不要大家七嘴八舌地全來「胡說八道」。

台灣的戒嚴法

台灣的戒嚴法一直為在野黨派及旅美華人所詬病，最近由於美國眾院外交委員會舉行聽證會，所以又變成美國華文報紙上的大新聞，中國時報並把它以頭條新聞刊出。

戒嚴法是戰爭或非正常時期的法律，對台灣來說已經不適用，我們希望國民黨能把它加以分析、刪節、或歸納於其他法律之中。其實台灣目前在執行戒嚴法時已經與剛開始時不同，何必仍留其名而受海內外攻擊？

最近新聞上任應有一番新作為，我們希望新閣在戒嚴法上也有革新的勇氣。

患近視眼的越南領導人

在中越反目以前，中共的確全力支持過越南，說中共是越南的大恩人絕不誇張。

因有蘇聯在背後撐腰，越南在利用完中共後便與中共反目，最近更變成死敵，邊境上的戰火終日不斷。

從客觀的立場上說，越南與中共交惡雖乘一時之快，但最後越南總會吃虧。第一、越南與中國雖不同文，但却同種（同為黃種人），同種人不應自相殘殺。第二、越南與中國為近鄰，蘇聯則遠離越南，越南與中國戰團在地理上就處劣勢。第三、中國不會永遠衰弱，蘇聯不會永遠強盛，有一天形勢轉變，首先吃虧的是越南。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希望患近視眼的越南領導人，重新考慮他們的政策。中越應

該是好鄰邦，不應該敵。

遊踪汽車公司的善行

美國每年大約有上百萬的少年離家出走。這些離家出走的孩子前途多是凶多吉少，小部份淪為娼妓竊盜，大部份在饑餓邊緣上掙扎。

大多數孩子離家出走的原因是一時氣憤，當他們第一晚徬徨無依地在街頭或車站上挨餓受凍料，才後悔自己逃出家門，但却囊空如洗，沒錢付車票。

美國的大長途汽車公司之一遊踪（Hartline）最近開始了一項非常令美國父母及青少年激賞的措施，叫「免費回家」（Operation Home Tree）。凡是流浪在外的孩子，都可免費坐遊踪的長途汽車回家。

筆者談到這則新聞非常感動。中國人多批評美國社會是一個冷酷的工業社會，實際上他們社會上有很多極富人情味的事，「免費回家」就是一例。

「貴妃醉酒」不是國歌

編輯先生：
貴刊第十二期「漫話中國國歌」一文，談及海峽兩邊的國歌。其中提到李鴻章在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時，以「貴妃醉酒」作為清廷國歌。若當作笑話，亦未嘗不可。然而，此事決非事實。倘若我們查一下歷史，即會知道，中國在滿清時代，并未派代表參加過奧運會。再者，清朝的國旗是黃龍旗，并非什麼龍鳳旗。中華民國成立時，國旗是五色旗（紅、黃、藍、白、黑）象徵五族共和，國歌是卿雲歌。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中國才用現在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至於國歌，原文是國父

具有表情的機器人

白逸鴻

近日讀報，聞及歐美、日本的科技神通廣大，所製的機器人，除沒有表情外，幾乎與真人一模一樣。然而，我又繼續想到，中國「偉人」的「偉大」——相信歐美的偉人也會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為他們製造出了一種具有表情的「機器人」。

這種「機器人」，也與歐美、日本的機器人差不多。不同之處是歐美的有思想而無感情，中國的有感情而無思想。頭腦簡單，用處却更大。他們如西方的機器人一樣，能為主人做許多事；如吹喇叭、做工、打仗等等，而且比西方的機器人更聰明，更能領會主人意圖。甚至不要主人的指令，只要主人使一下眼色，他們就心領神會。

這就是偉大的中國「政治家」及他們的打手——「理論家」、「作家」們的傑作。將人變種為「機器人」的傑作，自稱高明的洋科學家豈不嘆為觀止乎？

向黃埔軍校學生的演講辭，四字一句。國父在向學生詳解中苦口婆心，希望學生以救國救民為念，內除強權，外抗帝國主義。立意不為不正，用心可謂良苦。後國民黨，以為國父上文足以警世，因此譜為曲子，作為黨歌。以後廢止卿雲歌，又找不到更好的，遂以黨歌代國歌。國父一生為中國之繁榮強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惜國民黨的繼承人，未能忠實奉行國父之「三民主義」，以致國歌、國旗最後僅用於台灣一隅。……

走筆至此，諸感雜陳，無怪乎古人有「臨表涕泣」之語。

讀者 克珍謹啟

楊蘇 死因 判明

劉理新

名，馬廷准領事却在楊蘇自殺時，對外宣稱說楊蘇係因神經衰弱而自殺。

每次與楊蘇在一起，不管是因公因私，談正事或聊天，他那種開朗爽直的個性，是我所結識交往的來自國內駐外人員當中，最令人覺得真實可親的人。我會與他提起這件事，他也表示：在國內的環境中，由於各種因素，除非生死至交，否則，說真話的機會實在太少太少了，並且很容易對自己造成傷害。當時，我會問他爲什麼？他只簡單的說：這問題太複雜了。總的來說，應該歸結到制度上。由這句話，讓我多少瞭解到他對現行制度的看法，亦由於這句話，使我確認，他的確把我當真正的朋友。因此，愈加令我感動。

悼念大阪領事館前副總領事楊蘇逝世一週年。

光陰荏苒，春去秋來，時序匆匆，去年六月二十七日楊蘇自殺死亡距今，已屆週年，世事紛擾，人海茫茫，想人們早已把楊蘇之死淡忘了吧！與楊蘇爲友，雖談不上兩肋插刀，但在這種人情險惡的社會裏，朋友之間能彼此信任無已，使我不能忘懷，尤其他又是走得不明不白，叫我如何能輕易淡忘呢？

去年五月四日，楊蘇曾參加大阪領事館所舉辦的關西地區華僑青年會排球賽及乒乓球賽，楊蘇憑他精湛的球技，獲得了乒乓球賽第一

運份子，他認爲海外留學生搞民運，基本上對中國朝向自由法治邁進，具有正面的意義和價值。指導者應以健康之心態去面對現實，不應動輒禁絕打擊。

二、楊蘇與華僑接觸頻繁，在金錢和女人方面有麻煩。

三、楊蘇被派駐日本後，目睹資本主義社會之繁榮進步、民主與法治、自由和人權，對共產主義失去信心，並表示不滿和絕望。

四、楊蘇對台灣表示過度之關心。

以上幾點分別被人彙報後，均被登記在他的檔案中，楊蘇本人絲毫不知。直到得知要被調返國內才發覺有異，但已太晚了，等進一步知道檔案中的真象後，那種幻滅感，凡是來自國內的人，大概都能體會，也能明白。再沒有什麼東西，會比檔案資料更影響個人前途的了。楊蘇當然更清楚這一點，回歸的雖是親愛的祖國，可却由於人爲的不合理，造成不公平的社會，在專制的國度裡，沒有權一切也就完了，楊蘇已略有地位，加上過慣日本的生活，想到回去後又要挨整，真是暗無天日。況且，這些致命的小報告，還是出自那些天天見面，口喊親密戰友的同事之手，豈能不萬念俱灰，而在臨回國前一個禮拜，毅然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

楊蘇之死，由於對制度不滿，連帶讚許改革者之行動，又說了真話，絕望與恐怖使他走上輕生之路，該係其自殺之主因。

謹以此文，略表對故友楊蘇追思之忱。

有。綜合所得之內幕，現在總算對吾友之死因，有所掌握，謹在此提供讓社會大眾瞭解：

一、楊蘇不只一次在私下表示他很同情民

一個台灣人對中國統一的意见

喬志揚

中國之春編輯先生大鑒：

「中國之春」一月號，刊載了李瑞駿先生「統一中國問題淺見」一文，李先生「歡迎公開討論」。首先，我很同意文首編者先生的按語，那就是持與作者相同意見的人，可能不在少數，尤其是長期離開中國，而又回國「走馬看花」式訪問的海外華人。作者自稱「四十年代留學美國，而後定居，前後卅三年」，顧在「無條件的愛國熱忱下……作一個不偏左右的忠實報導」，我看了幾遍李文，深覺得其癥結就在「無條件的」愛國熱忱上。把李文從頭看下去，似曾相識，很像葉劍英「九條」的翻版。或許李先生言之無心，真的出於一片「熱忱」，文章看到最後，李先生終於點出本題，他在提出的「解決辦法」中，其中之一，竟然就是「信任葉劍英的九項建議」。

李在文中又說：「我這次旅行，訪問了台灣、大陸、香港和美國的各地同胞，他們都想早日投入祖國懷抱」，不知李先生是研究那門科學的學者，這個「他們」是代表多少多數呢？其不知所云，簡直到了口無遮攔的地步。旁的不說，香港的大多數的「他們」，對一九七七年大限的反應如何呢？是一夕數驚，徬徨無主呢？還是「都想投入祖國懷抱」？

中國分裂卅幾年，凡是炎黃子孫，包括國民黨和共產黨中真正愛國憂民之士，無不渴望國家的全歸一統。但統一問題，套句毛澤東的

老話，「不是請客吃飯」。從近處看，是關乎台灣一千八百萬人，在那一種制度下生活的問題。從遠處看，又何嘗不是決定中國未來到底該走那條路子的關鍵時刻！

筆者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妻子是大陸河南人，對國共談判這個問題，可能比李先生更有資格說幾句話。固不論李文提出的「九條」式的「解決辦法」，是不是鏡中花，水中月，有沒有投入實際的可能，筆者沒有資格申論。僅想以一個台灣省人的立場，說幾句心中的話。

國民黨在台灣執政三十多年，政績有譽也有貶，世人已有公平論斷，無容贅言。在台灣的一千八百萬同胞，筆者看不出有幾個「他們」，願意去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生活。

共產黨口口聲聲要和國民黨「兩黨」談判，「兩黨」合作，依然是一派獨裁、專制的口吻，完全沒有把「人民」放在眼裏。今天台灣內外情勢的發展，國民黨的處境，確實處在一個十分尷尬的局面。很多台灣人擔心，如果國民黨一旦放出談判的空氣，將會造成台灣人心騷動，資金外流，物價波動，貿易停擺，等等潰敗現象。更有甚者，國、共兩黨現階段的接觸，必然引致同胞的疑慮，一種受國民黨愚弄、欺騙的心理，將如洪流般在同胞的心裏盪漾開來，一發而不可收拾。海外的台獨份子，必藉機煽火，與風作浪，搞獨立、搞分裂，甚至

擁幫立派，自相殘殺。到時候恐怕就非國民黨所能控制了。共產黨兵不血刃，登陸接收可也。一千八百萬人，只有乖乖地的，「無條件的」接受「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同胞，不願走上這條悲慘的路子。而這樣的結局，難道就是海內外的中國人所希求的嗎？

國民黨在台灣卅年，之所以能建設成這個局面，因素固然很多，依筆者看來，其中一大因素，是給硬逼出來的，是羞恥心和恐共感所交織激發的結果。若非海峽對岸有共產黨在那裏虎視眈眈，成績恐怕要打个折扣。再看，共產黨這四、五年來，也搞經濟特區、搞吸收外資，農村搞分田到戶等措施，若說是受了台灣某種程度的啟示，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國、共兩黨的分區而治，是我們中國目前特殊情況下，獨一無二的兩黨政治形態，而此制度雖不同，到底產生了某種程度的相互制衡作用。只要中共現代化的步調穩健前進，不要再節外生枝，亂搞運動，逐漸建立法治秩序，給人民基本自由，適度還政於民，期以十幾、二十年的時間，必會以新面目呈現在世人面前。只要形象改變了，台灣同胞對中共的恐懼心理，將逐漸消除，統一形勢自然形成。

筆者是無黨無派，在台灣世代務農，現在美國開間小店謀生，絕對用不著順著那一黨的氣候說話，不過憑良心發表一點意見罷了，還請李瑞駿先生及其他高明指教。

此祝

編安！

謝謝！

喬志揚 謹上

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

(上接35頁)

物。尤如百年前的洋務運動：原目的在於鞏固加強滿清朝廷的統治，却導致了維新運動乃至辛亥革命，最後推翻滿清皇朝。「異化論」很可能發展成爲一種徹底衝垮共產主義者賴以生存的唯物辯證法理論。

爲了消除新洋務運動所帶來的危害，中共

近年來發動了整黨和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運動的結果，立刻妨礙了剛剛發展、改善的經濟，迫使中共領導人不得不命令反精神污染迅速利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這種欲止而欲行的態度，又一次打擊了中國人民對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展經濟的信心，也用事實證明了異化論的正

「共產主義運動的

自我批評和重新評價」

● 譯文專欄 ●

譯者小引

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自我批評和重新評價其實是「古已有之」的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與他們的戰友或論敵的論爭中發展自己的學說的。但自列寧之後，一切與當權的「黨閥」持不同政見的人都被稱爲「階級叛徒」(如列寧之謂考茨基)、人民公敵(如斯大林之謂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而「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或「走資派」則是毛清除異己的催命符。

其實，許多對「正統馬克思主義」或「黨的路綫」提出批評的人都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有的是對束縛共產主義運動的僵化或過時的教條提出修正，有的是強調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的人道主義傾向，有的是試圖使用馬克思本人不斷提倡的「科學批判精神」，對共產國家中的腐朽現象進行批判……

對長期接受毛式馬列主義教育的中年知識份子，涉獵一下共運內部的這些自我批評或重新評價是很有益處的。因爲平心而論，這類批評大都能一針見血。正如魯迅所說，因爲從舊營壘中來，反戈一擊，往往能擊中要害。其中最鮮明的例子——繼托洛茨基之後——大概應算是南斯拉夫的米洛夫·吉拉斯(一九一一—

(政論摘譯)

余力

了。

吉拉斯年青時是進步學生運動的領袖，二次大戰時是鐵托游擊隊中的英雄，戰後任鐵托政府的副總統，至一九五四年始因提倡「民主化」被開除出黨。之後，他在「新階級」(一九五六)一書中對二十世紀的共運——特別是共產國家的領導階層——提出犀利的抨擊。因爲公開發表這些批評，他被列入獄五年(包括三年苦役)，至一九六一年始獲釋。

昔日共產黨的游擊英雄和領袖，吉拉斯如今成爲敢爲自己的信念受苦的使徒。讀者可以不同意他的見解，但他的信念的眞誠是不容置疑的。八十年代的讀者可能會覺得他立論過於簡單或不夠嚴謹，或者會覺得他語多重複，調子亦因刻意模仿「共產黨宣言」亦有些刺耳。但他的主要論點——社會主義所有制其實是政治官僚集團所有制——無疑是非常之正確的。

此外，他對他本人所屬并曾領導的那個新階級的許多心理特徵的闡述也非常之中肯。譯者認爲，該書對於從事共產黨國家內的民主運動人士來說，實爲必讀之物。茲摘譯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中的一些片段，希望能引起讀者對這本書的興趣。譯文中的小標題爲譯者所加。

確。新洋務運動不可能導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單一結果，伴隨着外國科學技術的引進、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整個思想、文化、政治的重大變化。

「論變成新階級的共產官僚集團」

36 與以往的革命不同，在消滅一切階級名義下進行的共產主義革命建立起了一個新階級的絕對權力。此外，一切都是空話和幻想。

37—38 在蘇聯和其他共產國家，一切事情都與革命領袖們——包括其中最傑出的如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所預見的不同。他們曾預言國家迅速消亡，民主得到鞏固，但一切適得其反。他們曾預言人民的生活水準將迅速提高。但在這一方面，情形幾乎毫無變化；而在東歐各國，生活水平甚至下降。無論在哪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絕對跟不上工業化的速度。他們曾相信城鄉、腦力與體力勞動之差別會逐漸消失；但實際上，這些差別加深了。共產黨人的其他預言——包括對非共產世界形勢的估計，都不會實現。

其中最大的幻想是關於蘇聯的工業化、農業合作化和消滅資本主義所有制；當時曾以爲這將導致無產階級社會的建立。在一九三六年，「斯大林憲法」曾宣告一切剝削階級的消亡。——資產階級和其他更古老一些的階級是消亡了。但取而代之的，是歷史上從未見過的一個新階級。

自然，與以往的統治階級相似，這個新階級亦相信其階級權力之建立和鞏固將爲全人類帶來自由和幸福。但與以往的統治階級不同，這一新階級更粗暴地推遲這一幻想之實現。這一個新階級建立起比以往任何階級更徹底的統治

，而其階級偏見和幻想也相應地更加強烈。

這個新階級——更準確地說是政治官僚集團——具有以往一切統治階級的全部屬性。同時，它亦具有其獨有之特點。比方說，這個階級的起源就有其獨特之處，雖說其本質大致與其他統治階級相似……。

44 在其他非共產國家中，官僚們亦組成特殊的社會集團，但他們並不擁有共產官僚集團那種權力。在其他國家，官僚集團受命於通常是選舉出來的主子，但共產官僚集團並無此種主子凌駕其上。非共產國家的官僚們可以算是資本主義經濟的行政管理人員，但共產官僚集團却是一個新階級。

正如一切其他有產階級，這個新階級的存

在可由其財產權及其與其他階級的關係所證實。同樣地，任何人若享用此種財產權帶來的物質福利和特權，即可視作新階級的成員。

正如「羅馬法」所確定：財產權即使用、享有和支配產品之權利。共產官僚集團使用、享有和支配國有化的財產。

如果說享有財產權所帶來的物質福利與特權是屬於有產階級的標誌，那麼，這一新階級享用國家財產之特權正表現在他們享有的收入與福利中——因為他們享有的收入與福利遠超過他們的勞動所應得的報酬。在現實生活中，新階級的財產權表現為黨對國民收入的分配、工資、經濟發展以及一切國家財產之絕對支配權。這就是為什麼普通老百姓覺得黨的官員是非常之富有而不必工作的人。

由於種種原因，私有制不利於新階級的政權的建立。此外，私有制的破除亦為國民經濟改造所需。這樣，新階級寧可通過一種特殊的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去取得它的權力和特權，並由此形成了他們的意識形態和習慣。借助於集體所有制，這一新階級以國家和社會

之名義行使管理與分配之權…… 45。

45 剝奪共產黨人的集體所有制意味着摧毀這一新階級賴以存在的基礎。要求他們放棄權力而讓工人們參與工廠管理和分享利潤——這正是資本家們由於罷工和議會制被迫讓工人們分享的權利，意味着剝奪他們對財產、思想和政府的壟斷權。這將是民主自由的開端和共產黨專權的結束。除非上述的一切發生，重大和本性的變化不可能在共產主義制度中出現——至少在認真地關心社會進步的人們看來是這樣。

P 46 新階級的財產權就是行政權。上自國家機構和經濟企業，下至運動團體和社會福利機構，一切管理都由黨的所謂「領導核心」壟斷。處於領導地位自然就享有由此而來的種種種種特權，而黨的「領導核心」就是全權的剝削者和主子……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政權實質上等於「使用、享有和支配」全民財產。誰掌握政權，誰就直接地取得特權和財產。因此，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權力或從事「政治工作」就成了渴望過寄生蟲生活的人的理想和目標。

P 47 革命前，參加共產黨意味着自我犧牲，被稱為職業革命家是極高的榮譽。如今，黨取得了政權，黨籍就成為屬於特權階級的標誌。長期以來，共產黨革命和共產主義制度隱瞞其真正本質。新階級的作為一直被各種漂亮的社會主義空話和集體所有制所隱瞞。其實，所謂「社會主義所有制」不過是現實中的政治官僚集團所有制的招牌……當代共產主義運動的本質正是這一新階級的存在。 P 47

〔論新階級的一些特徵〕

P 59 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階級能像這個新階級那樣團結一致地捍衛自己和自己的財產——

壟斷的集體所有制和極權主義的政權。

從另一方面來說，這個新階級却又最富於幻想和最不自覺。每一個資本家或封建領主都知道自己屬於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他們通常都相信這一社會階層的歷史使命是給全人類帶來幸福，而沒有這一社會階層天下將會大亂。屬於新階級的共產黨員也相信如果沒有他的黨，社會將會退化。但他通常並不意識到自己是屬於一個新的有產階級，因為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個有產者，也並不考慮自己享有的特權，他只覺得自己屬於一個有明確目標、態度和特殊使命的團體。這就是他所能見的全部。他無法看出自己同時還屬於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一個新的有產階級。

公有制鞏固這一新階級的地位，但同時也使這個階級的成員不自覺其階級本質；並且，它的每一個階級成員（亦即有產者）都幻想自己屬於一個特殊的運動，其目的是消滅一切階級。

與其他有產階級相比，這個新階級與它們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亦有不少差別。它像資產階級那樣貪婪，但缺乏其節儉和效率。它像貴族那樣排他，但缺乏其高雅和騎士精神。但這個階級亦有其優於其他階級之長處。因為它組織嚴密，它能作出較大的犧牲，也更富於英雄色彩；它的個人完全服從集體——至少，目前流行的理想要求這種服從，甚至在它追求其階級私利時亦如此。因此，這個階級比任何其他階級都更有能力進行物質上或其他形式的冒險。又因為它擁有全民族的財富，它更能懷着宗教式的狂熱去追求自己的目標并催令全體民眾跟隨。

這個新階級並不等於政權。但政權造就并幫助這一所有制的發展，因為使用、享有和支配公共財產是黨和黨的高層領導所享的特權。

黨員們感覺到這種權力，知道對公有財產的控制會帶來種種特權，於是，寡廉鮮耻的野心，口是心非、奉迎拍馬、明爭暗鬥，全都不可避免地日益增加。陞官發財的野心讓官僚主義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痼疾。因為共產黨員變成了有產者，因為通向權力和物質財富的路只對「忠於」黨、「忠於」社會主義、忠於新階級的人開放——無原則的野心必定成爲生活的常態和發展共產主義的主要方法：：P 61

P 61理論上，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爲最高領導人，正如拿破崙軍中的每一個士兵的背囊都有元帥的權杖。要獲得成功，唯一的要求就是對黨或新階級絕對忠誠。新階級的基層廣大，但愈接近頂峯，組織就變得愈冷酷、狹窄。要到達頂峯，不僅需要向上爬的野心，更需要理解和發展理論的能力、對反對派進行鬥爭的堅定、參與黨內鬭爭的機敏和靈活，以及鞏固本階級地位的才能。參加競爭的人很多，但獲選的極少。新階級雖說在某些方面比較開放，但同時亦比其他階級更具有排他性，因爲新階級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是專權，其排他性也就被官僚等級制所強化。

歷史上從未有過一種政治制度像共產主義那樣對其忠誠份子廣開大門，但通往頂峯的路却從未如此艱辛和要求如此慘重的犧牲。一方面，共產主義運動對一切人開放，另一方面，它又極端地排除異己，甚至對自己的追隨者都缺乏容忍精神。P 62

〔壟斷公有制和自由〕

新階級本能地感到公有財產其實是本階級的財產，而「社會主義」、「社會」或「國家」財產等名稱不過是法律上的虛構。新階級又覺得對其絕對權力的任何削弱都會損害其財產

權，因此，新階級反對任何形式的自由——表面上當然是爲着捍衛社會主義所有制。任何對新階級的壟斷行政權的批評都令其心驚膽顫——尤其是當此種批評能揭露其行使和保持權力的手段——因爲此類批評可能導致其權力的喪失。

這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重要矛盾。法律上，一切社會財產屬全民所有；但實際上，只有一個階級爲其私利管理這些國家財產。這種法律與現實情況的脫節使社會主義經濟關係變得曖昧而不正常。同時，這種脫節又使領導階層言行不一——因爲它的全部作爲不過是鞏固其財產權和政治地位。

要解決上述的矛盾，新階級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損害。別的統治階級也無法解決這一矛盾——除非其對政權和財權的壟斷被剝奪。當一個社會有較多的自由，統治階級總會被迫放棄其對財產權的壟斷。換言之，當統治階級對財產權的壟斷被擊破，社會總會獲得某種程度上的自由。

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政權和財產權幾乎總是被同樣的人所控制，雖說這一事實被法律詞藻所掩飾。在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和資本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雖說前者被後者剝削。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法律規定每個人都有同樣的財產權——因爲表面上全民擁有國家財產。但實際上，只有一小撮行政官員享有財產權——因爲他們壟斷了行政管理權：：

P 67法律上的公有制和實際上的新階級所有制之矛盾是使共產主義制度受到批評的一個基本原因。這一矛盾不僅招致外界的批評，它同時還腐蝕新階級的成員——因爲其實只有一小撮人在享受特權。這一矛盾的深化必將導致共產主義制度的改變——無論其領導集團是否願意。其實，這一矛盾的表面化正是新階級進

行種種改革——尤其是「自由化」和「權力下放」的真正原因。

P 68 每當人民察覺新階級管理國家財產如同其私產，新階級就必須進行某些改革——爲的是保存其權力。這類改革通常被稱爲「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民主」的進一步發展。每當上述的法律上的公有制與實際上的新階級所有制的脫節表現得太明顯，改革就成爲當務之急。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新階級是必須不斷地鞏固其政權和財產權的——即使是爲此必須背棄真理。它必須不斷地證明自己正在成功地建設一個新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人幸福、平等、不受剝削。但新階級無法避免其日益深化的內部矛盾，因爲它既無法使其財產權合法化，又無法在放棄其財產權時繼續保存自己的階級地位。因此，它總是被迫提出些抽象或不切實際的任務去爲自己權力的強化辯護。

新階級擁有有史以來最廣泛的權力，但它又最缺乏遠見，因爲它的階級觀點建立在虛假和不安全的基礎上。同時，由於這個階級組織嚴密、孤立，但又擁有專制權力，它就不可能避免地對自己的階級作用和其他群眾的作用作出不現實的估計。

完成工業化之後，這個新階級的作用就只剩下強化其權力和劫掠其他民衆。它不再建設，它的精神力量已被黑暗所蒙蔽。

這個新階級所領導的革命可算得上劃時代的成就；但它對人民的統治確實是人類歷史上最可耻的幾頁。人類將會驚嘆這個階級的規模宏大的壯舉，但亦會因其使用的手段之卑劣感到慚愧。

當這個新階級退出歷史舞台——它必定會退出，人們將不會感到太惋惜。因爲它排除異己、鎮壓一切，這就不可避免地爲自己準備了可耻的敗亡。

（余力譯，八四年六月）

在厄運中相逢

五歌

我所投稿的雜誌社，轉來一封寄自美國的讀者來信。拆開一看：

老師：您好！

看這稱呼，分明不是讀者，似乎是我的學生。可是我沒有學生在美國呀！從來沒聽說過，我教過的學生之中有誰去了美國。即使有人去，也不會和我通信。我在國內任教二十幾年，確實教過不少學生，但是批我者有之，抄我家者有之，關我牛棚、償我拳腳者有之；和我做朋友者，一個沒有，怎麼會有學生給我來信？

可是他親切地稱我「老師」，不是學生，是誰呢？看看後面的署名：小青。

這個名字，似熟而生。在我的腦海中一時怎麼也撈不起這個名字來。還是看內容吧。信寫得很長，字體很小，內容不少，熱情洋溢。

「老師，我聽說您出國了，但不知您去了哪裏。看到您憶舊的文章，認出了您。您又把我拉回到「插隊的歲月」裏……」

啊，小青！集體戶的小青！他不是我的學生，而是一位青年朋友——一名上海知識青年。啊，他去美國了！

看看他那清秀的蠅頭小字，玩味著他的親切話語，我的眼睛濕潤了。透過朦朧的淚水，彷彿回到了十幾年前，看見一名知識青年，站在一座孤墓前面，埋頭拉小提琴。墳頭埋在一棵枝幹剛毅的青松之下，背景是一個小。遠眺是白雪皚皚，峰巒重疊的高山。琴聲悠揚、深沉，如怨如訴，因衆山共鳴而傳至很遠很遠

……

一九七一年，我因歷史問題被押送到邊遠的山區，去「插隊落戶」，「接受再教育」。

由於「問題嚴重」，「態度又惡劣」，結「案」很晚，在牛棚關的時間最長。送我去「插隊」，也是到最遠、最窮的山區。我落戶的那個山溝小村，「插隊幹部」只有我一人，沒有第二家。但是却有一個集體戶，住著一批上海青年。人數不少，十七名。據社員說，原有十八名，去年一名上大學去了。他們是一九六八年來的，已經是第三年了。山區的生活，比一般農村更苦。住茅屋、睡土炕、吃粗糧，沒有娛樂、沒有消遣，沒有任何文化生活。忍受這一切，就叫做改造；改造好了，就有好前途。因此同學咬緊牙，在這裏忍著、挨著。天不饒人，一九六九年關災，一九七〇年又是一個歉收年，除去挨苦受凍，又遭到餓鬼的襲擊。本來就絕望潦倒的上海青年，就更加精神頹喪了。他們知道，張春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們趕出了上海。想回去？除非做夢。要反抗嗎？他們雖然年齡小，但也明白，他們所處的時代，是沒有反抗餘地的。可是他們也不甘心被宰割，而採取了特殊的反抗方式，——他們不理睬什麼「集體戶規章」，自己安排生活日程。他們用家裏寄來的錢，買農民的雞、鴨、鵝，宰之烹之，大吃大喝；錢花光了，就捉農民的狗，大擺狗肉宴。他們舉辦通霄舞會，通霄達旦抱在一起跳舞。最後，他們居然掀起一個「戀愛和同居運動」，打破了男女寢室的界限，

一對一對地睡在一個炕上，一個被窩裏。時代宰割他們，他們也無情地嘲笑了時代。

但是這裏有一對青年却完全不同。他們本來就是一對戀人，男生叫小青，女生叫小燕。這都不是他們的本名，而是來這裏之後獲贈的「別號」。小青是因為不怕凍，好似山林裏的冬青，一年四季，青蔥翠綠，所以叫他「冬青」，暱稱「小青」。小燕是因為初到山溝，依然高高興興，又跳又唱，像個小燕子，所以叫她小燕。

到山溝第一年，他倆和同學們一樣，和大家一起行動。可是當大家的行為過份時，他倆便分離出來，走自己的路了。他倆不再參與同學們任何活動，而振起精神，開始讀書了。他倆都帶來許多書，小青還帶來一把小提琴。讀書之餘，小青拉琴，小燕唱歌，頗有情趣。看到他們「離群」，同學們便冷嘲熱諷，說什麼的都有。他倆不理睬，當做耳邊風。後來同學們的情緒越來越壞，吵鬧不休，他們便跑到附近的山坳裏去，在那裏學習。上午學半天，午間回來吃飯，下午再去。倆人帶著兩個小櫥，坐在那棵松樹下，搏命奮鬥。疲勞時，就娛樂一番，再繼續用功。同學們不知他倆去了哪裏，聽到飄來的歌聲和琴聲，才知道他們在山裏讀書。後來天氣冷了，落了大雪，山坳裏不能再讀書了，他們便借馬信的小屋。馬信五十多歲，單身一人，住在馬棚旁邊的一間小屋裏。看到他們這樣用心讀書，熱情歡迎他們。從此他倆每天坐在馬信的小炕上，天天刻苦學習。

同學們不理解，為什麼還要讀書？「讀書做官論」早已被批倒、批臭，甚至連教書的人也不再讀書——全國各級學校全部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佔領，讀書不但毫無用途，反而會惹起麻煩。可是小青和小燕却若

痴若愚，珍惜每個小時，埋頭讀書。這是怎麼回事呢？

小青的父親是一位工程師，祖父是一位科學家。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祖父平生相信「非科學和民主不能救中華」。父親繼承了祖父的思想，又把這個信念傳給了小青。母親是一位音樂教師，把琴藝傳給了小青，所以小青帶著書和琴來到山溝。

小燕的父親和小青的父親是同學，也是一位工程師，不幸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母親和小青的母親是同事，是一位聲樂教師。小燕家和小青兩家大同小異。兩家都住在學院的宿舍，兩人上一個幼兒園，所以自幼兒園起就是同學，直到一九六六年初中畢業。小青是獨生子，小燕是獨生女。小燕的母親早就託附小青多多關照小燕；小青的母親壓根兒就把小燕當做自己的孩子，經常叮嚀小青，多多幫助小燕。小青大小燕一歲，確實像個小哥哥，對小燕十分關心。文化大革命大串聯時期，學生們都乘此搭免費火車到全國各地旅行。小青和小燕一起去了四川。一天黃昏，登上峨嵋山看雲海。小燕瞧著眼前滾滾的白雲，忘了白雲覆蓋著的是萬丈懸崖，伸手要去抓雲，小青手快，一把將她抓了回來。小燕驚後知險，擁抱著小青，把頭伏在他肩上，久久不離開。從此，倆人感到了愛情。

小燕到山區集體戶來之前，她母親哭了幾個夜晚，後來是小青安慰了她，她才安心一點。她信任小青，看他很成熟。她一再託附小青：「小燕就交給你了！」

文化大革命以來，小青一直和小燕在一起，事事關照她。不僅給了她深厚的情誼，而且把他的思想也傳給了她：「讀書永遠有用，一定要讀書，要升學！國家不會總是這樣，總有一天會改變！」他的思想感動了小燕，行動鼓

舞了小燕，所以小燕發誓和他一起讀書。

可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小燕也一天比一天懂事。她越來越感到，她沒有前途，沒有希望，——她和小青不同，她的父親是右派份子，在集體戶「政治排隊」的名單上，她的名字排在最後。莫說升學，就是進城做工，也沒她的份兒。這個精神壓力一天比一天大，壓得她再也不想唱、不愛跳了。小青看她情緒不好，百般鼓勵她：「不要看現在，要看將來！現在的一切都不正常，總有一天要改變！」小燕相信他的話，但却擔心有朝一日他去升學而離開她。她不敢往前想，一旦他走了，她會怎麼樣？她希望這一天不要來，她怕！

然而這一天果然來到了。一九七一年夏天，全國各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他們的集體戶分到一個名額。錄取的原則當然是那張「政治排隊名單」，但是排在前面的那些「根正苗壯的紅五類」，早已把功課忘得一乾二淨，而且和書本結下了難解的冤仇，因此沒人感興趣，他們一心一意等著回上海工作。最後經過評議和審核，這個機會終於落在小青名下。這個機會的到來，連小青自己也沒估到。太快了！

他被錄取到本省的一間大學。當他接到入書通知書時，他欣喜若狂。但與此同時，一個頭大的問題出現在腦際：小燕怎麼辦？這不只是出於愛情，更是出於責任。長久以來，他在心中對她擔負著責任。當天，他和小燕談了一天，晚間又一直談到三星西下。他安慰她，鼓勵她，向她發誓：他永遠永遠愛她！非她不結婚！小燕爲他高興，更爲自己悲傷。她感到她的人生之路絕了！她的眼前一團漆黑。她沒有一點希望可以安慰自己。升學？絕無可能！解放军和工人佔領的大學，絕不會向右派子女開門！做工？大家都想回上海作工，幾時能輪到

她頭上？即使堅持到最後，能回上海嗎？張春橋能否允許黑五類的後代再回上海！但是這一切，她都不願意說給小青聽。當她的悲傷達於極點時，她把頭埋在小青的胸前，哭了起來，越哭越悲傷。小青用盡了一切語言安慰她，她不說話，只是哭。時間過了很久很久，她方抬起頭來，望著小青說了一句話：「你去吧，不要掛念我。」

小青走了，剩下小燕孤獨一個。她好像洩了氣的皮球，遭了霜的秧苗，再也振不起精神來。小青每星期都給她來信，但滿篇熱情的信，對她毫無影響，只令她更感到絕望。集體戶更亂了，同學們的精神更加墮落。沒有人同情她、關懷她；却有人嘲笑她、戲弄她。她對集體戶感到厭煩，想離開，却没有去處。

許多人回上海去了。有人去玩，有人去「走後門」。她也想回去，——三年沒見父母面了，她很想念。可是她知道，回去一趟，需要大筆路費，父親沒有工資——還沒摘帽；母親的工資只有六十幾元，往返車票就要一百多元，家裏那有這筆錢？況且回去做什麼？她想念母親，母親更想念她。可是回去她能安慰母親嗎？倘若告訴母親，絕無可能再回上海，豈不更叫母親難過！可是不回去看母親，母親一定知道小青上大學去了！沒有人關照她了，母親不是更掛念？唉！人生原來是這般痛苦！

回上海的同學回來了。有人確實「走後門」成功了，雖然花了一大筆錢，但總算可以回去做工了。沒走成「後門」的人也高高興興地回來了，——聽說不久就來招工，不走「後門」也有希望回去。但是對於小燕，却只有駭人聽聞的消息：招工當然不收「五類分子」的子女，即使走「後門」，也沒人敢開「後門」，那是「階級路線」問題！這個消息，好像在小燕的頭頂打了一錘，把她求生的希望徹底打碎

！有人議論，像她這樣的人，只有永遠留在山溝。那些「根正苗壯的紅五類」說：「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也不能全都回去嘛！」小燕聽到這些話，令她感到她被人踩在腳下，被人狠狠地踐踏，而她不能呼救，也不敢，——她沒有權利；她更不能逃走。逃到哪裏去？哪裏都是一樣的階級路線，階級鬥爭！啊！時代是這樣無情！人們是這樣慘酷！生在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意義？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末，也就是我進村滿一個月那天晚上，小燕失蹤了。同學們發覺她失蹤，是第二天早晨看到她的被褥整齊地擺在炕上——昨晚她沒回來。於是去問馬信，馬信也沒見到她；全體出動，找遍了全村，未見踪影。有人推測她回上海了。一位同學專程跑到公社公共汽車站去打聽，售票員說，這兩天沒有知識青年買車票。後來我的房東張老伯說，昨晚看到她朝東山走去。可是恰巧夜間落了一場鵝毛大雪，整個山區變成了一片林海雪原，到哪裏去找？

一個星期過去了，沒有任何消息。公社知識青年辦公室給小燕的母親拍去電報，回電說：小燕未回上海。同學們給小青拍電，小青急忙趕回來。走到村裏，只在集體戶喝了一碗水，就朝東山進發了。這個小村，四面環山，中間是盆地，回音很強。春天布穀鳥叫一聲，都在盆地上空迴盪很久。那天黃昏時分，我突然聽見有人在東山高聲呼喚。走出屋門，分明是有人呼喚小燕。「小：燕……」那聲音悠長、悽慘、悲憤，四面八方發出回響，在盆地上空迴盪、激盪。許多人都走出屋門，向東山張望。

晚飯後，聽說小燕的男友小青來了，在東山呼喚就是他。我出於教師的職業感，本想把小青找到家裏來，安慰他一番，這似乎是我應

盡的責任。可是我不敢忘自己的「身份」——我是來「接受再教育」的，少惹麻煩啊！我立刻放棄了這個念頭，坐在家裏，沒敢出門。

天黑了，全村熄了燈，社員們都已沉沉入睡了。忽然有人敲我的門。開門一看——

「我是小青！」

小青到我家來了！我不解其來意，頗有幾分緊張。可是他深深地向我鞠一大躬：

「老師，您好！」

他的禮貌，令我深受感動。文化大革命以來，沒有一個學生再叫我「老師」。客氣一點的，叫我「老×」；一般就直呼姓名，和獄吏喊囚犯無異。突然這般熱情地叫我「老師」，並深深地鞠一大躬，這令我忘了自己的「身份」，似乎我又恢復了教師的尊嚴，站在我面前的似乎不是陌生人，而真正是我的學生。我緊握他的手，拉他坐在炕上，從暖壺裏給他酌上一杯熱水。在微弱的煤油燈光下，我看到一張普通青年的面孔，他像無數青年一樣普通，沒有任何特異之處，只是眼睛裏有智慧，眉宇間有思想，沒有同齡人的稚氣，沒有紅衛兵的野性。

「不幸！不幸！」我想安慰他。

但沒等我講下去，他便講了起來：

「老師，這不是一個人的不幸，這是一代人的不幸！不，不祇一代，還有你們上一代，比我們更不幸！」

我立刻感到，這話講得太深了，出格了，越出安全線了！我沒料到，他會講出這樣深刻的話來，他的思想大大超過了他的年齡。我很想聽，但又不希望他再講下去，二十年改造的經驗是，凡兩人談話，總要考慮後果。可是他一口氣講了下去：

「老師，請你們原諒吧！我們上了當、受了騙、做了許多糊塗事，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

，現在受到良心的譴責！」

「老師，我們總算醒過來，總算明白了，你們不是敵人，你們無罪！破壞國家，塗炭百姓的人才真正有罪！」

「老師，我們太愚昧了，把封建皇帝，當做革命家來崇拜；把封建主義，當做社會主義來信仰，多虧那位接班人逃跑，戳穿一切！」

他越說越激動，所談越來越深。我看到新一代終於覺悟了，我感到無限的欣慰。——但是我不願他再談下去，無論如何這是不安全的。我乘隙扭轉了話題，問起他和小燕的家庭來。他坦誠地做了詳細介紹，尤其是他對小燕的愛情，毫無保留地談了出來。我理解，他對小燕的愛情，是無可補償的，小燕的失蹤，對他的打擊太大了！我看出來，他以最大的毅力壓制著悲傷。

「已經發生的不幸，往往需要更大的理智。」我安慰他。

不料他却吟出斐多非的名句來：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

這一夜，我就留他住在我的小屋。屋子雖小，只我二人，我們談得很晚很晚。——他不能入睡，我也極為興奮，我萬萬沒料到在這邊遠的山溝，遇到這樣一位青年。他的傾心之談，令我想到魯迅的名句：於無聲處聽驚雷！

第二天早晨，吃過早飯小青便回去了。

這一年夏末的一天，幾位社員到東山取採磨菇，在一個偏僻的山溝裏發現一堆屍骨。集體戶的同學們聽到之後，急忙跑去認領。骨骸已經不全，根本無法辨認，所幸在屍骨附近發現一隻鞋子，才斷定這是小燕的遺骨。

我當日跑到公社去，給小青拍了電報。第二天小青就到了，揹著一個背包，還提著他的小提琴（我不明白為什麼還帶提琴來）。走進

我的小屋，放下提琴，便邀幾位同學一起，奔東山去了，我也隨同一起去了。這個山溝十分背靜，就是夏季，還有一股冷風。小青不顧一切，他把屍骨收到一起，裝進背包，就揹回來了。

村裏買不到棺材，也不准做——山林政策不准伐木。小青跟馬信要了一個木箱，把屍骨裝在木箱裏；在他們曾經讀書的山坳裏，在那棵松樹下掘了一個墓穴。下午同學們抬著木箱，小青拿著他的小提琴，為小燕安了葬。沒有任何祭祀。但是當墳頭堆起來的時候，小青舉起小提琴，拉出一曲哀樂來。文化大革命以來，幾乎每年都聽幾次哀樂，人們的聽覺早已麻木了。但是小青奏出的哀樂，却深深地感動了在場的每個人。這隻新曲，還不見經傳，却感人肺腑，是小青專為小燕創作的，哀樂裏滿含著愛與恨。大家都默默地站在這座新墳之前，流下了熱淚，幾位女生難以自控，嗚嗚地大哭起來。這個即興的儀式持續了很久很久。最後，大家從附近摘了許多野花來，撒在墳頭上，才依依離去。同學挽著小青，小青還不時地回頭張望。

此後每年夏天，小青都來一次，為墳頭培土之後，總要拉一陣提琴。直至我離開這裏，回到省城去。

回城後我和小青沒有任何來往，雖然他就讀的大學和我任教的學院相距不遠，但那是一紅色恐怖——達於極點的時候，城裏不同於山區，大家都知道，要十分謹慎才是。後來突然聽說他被捕了，據傳是「四·五」那天他正在北京出差，當晚去天安門觀光，並未參與行動。但因吳德實行大包抄，把許多觀光者也抓了去。直至四人幫垮台，也沒聽到他的消息，以為他已經遇難。

今天接到他的信，恍如隔世。萬萬沒想到

他能去美國。我想他既然已經出來，就不會回去了，一定在海外奮鬥一番，不料他在信中却說：

「……海外需要有人奮鬥，國內更需要！我適合於在國內奮鬥，我一定回去，我離不開那塊土地，……」

啊！新一代已經成熟，他們對未來已經有自己的安排了。

煙

無名草

點燃一隻苦澀的烟捲，騰起幾縷淡藍的烟圈，我彷彿在燃燒著自我，生命像烟捲一樣漸漸縮短。

燒盡了往日的愁苦哀怨，燒不盡我對你的眷戀——遍體鱗傷的祖國呵，你燃燒在我的心間。

動物園隨筆——老虎

無名草

額頭的「王」字代表地位和尊嚴，可誰也不懼怕你，好奇地聚集在你面前，斑斕的毛皮像小丑的彩衣，供人們觀賞，增添孩童的笑顏。

滿腔的焦慮取代了凜凜威風，眼光無奈而沮喪，不再猙獰兇殘，看到這牢籠中的百獸之王，我相信總有一天會鏟除封位，消滅特權。

我是一朵小花 無名草

我是一朵野花
不肯寄生於主人的籬下；
我和姊妹們在山坡上，
花開時燦若雲霞。

我喜歡蕭蕭的秋風，
吹我到半空中飄撒；
我喜歡悠悠的流水，
帶我去漫遊天涯。

天上的白雲是我的夢，
舒卷自如，窮盡變化；
谷底的幽靈是我的伴，
芳香只埋給樸實的泥沙。

清晨，冷露沾濕了我，
昏暮，山風纏繞着我；
這樣寬濶的大自然呵，
何懼風吹雨打，霜欺雪壓。

也許有人恨我們顏色過多，
具有自己生命的骨架；
不像那些效顰的塑料，
只配裝飾在單調的花插。

一年一度我開了又謝，
冬去秋來我在希望中發芽；
在這喧囂的世界上，
我悄悄地，只是一朵野花；

我是一朵野花，
我願開在祖國的萬戶千家；
待真正的春天來時，
再細把江山描繪。

牆

華旒



今年初，國內一友人來信告及一傳聞：
廣東某縣城一堵宣傳牆，在大年初一場坍塌，壓死一百多人。由此，我想起國內許許多多的這樣的牆……。

一堵大牆

山一般地

屹立於小城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它崛起於

中共「九大」召開的前夕

一位軍人走下吉普車

又著腰指點了一番

於是，從「牛棚」押來一隊隊奴隸

以鋤頭夷平

這廢圯的花圃

這是要「限期完工」的

這是「向毛主席表忠」的

建築隊日日夜夜忙碌

誰管地基之下的浮泥呢

誰管合縫灰合不合格呢

於是，牆閃電一般立起來了

飛簷驕傲地指向天空

四面是向東的葵花浮雕

基座是很整齊的波浪

華貴的牆，氣派恢宏的牆

睥睨著

低矮的宿舍的破舊屋頂

凹凸不平的大街

接著，在腳手架上

在巨大的幕布後面

宣傳家趕製了第一件傑作——

「偉大領袖」微笑着

揮動翻雲覆雨的巨手

向著糧食店前長長的人龍

向著破衣垢面的南下乞丐

向著數不盡的游行、口號和鑼鼓

向著所有虔誠的、惶惑的、惡毒的眼神

於是，牆成了巨大的鏡子

對著北京的詭譎的風雲

圖畫和標語頻頻改動——

勇敢而絕對的肯定

更爲勇敢而絕對的否定

否定之否定……

牆頻頻地自打嘴巴

可是，它沒有義務臉紅

連回聲也只傳到

對面那位天天打瞌睡的

售貨員耳邊

而且，何必爲諸多變幻詮釋呢

只要揚起大刷子

蘸上上好的公家報銷的油漆

每一次神聖的革命

只意味著添一道漆

牆，成了愈來愈厚的書了

後來，莊嚴的牆之下

竟成了喧囂的市集

每天，趕早市的菜販

占上一個好攤位後

靠著牆根睡，任蒼蠅爬上臉

炸豆腐角的老頭

吐著著牆，黑煙熏著牆

牆的背陽處，

商人在做秘密交易

媒婆在導演羞澀而快捷的「相親」

駕駛拖拉機的農民

破口大罵牆阻擋了視線

春節，美麗的春節

幾萬人湧進了小城

街上的人比春天的秧圃還稠密

牆，更加華貴，更加絢麗

像一道堤，分開人的洪水

二十四丈的金龍在人海上游

每一次騰挪都激起波浪洶湧

勇敢的青年們爬上了牆

黑壓壓一片晒在簷頭

晃動著錚亮的尖頭皮鞋

展覽著最時行的領帶與西裝

「龍來了！」

勇敢的人們向牆上擠，

向牆頭爬，一批接著一批

可憐的牆，搖晃了

「轟隆」一聲塌坍

彷彿一個螞蟻窩被粉碎了

嗚呼，牆！以一百多年輕的生命

殉葬！

一九八四年春於舊金山

稱「鄧小平拉二胡」。七六年批鄧時，胡耀邦頂住了，胡喬木却動搖了，認罪檢查。鄧再度上台時不計前愆，使胡喬木再度竄上高層權位。胡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儼然以中央最大理論權威的身份行事，八〇年反自由化以來，直至最近的反精神污染，胡都十分活躍，扮演紅衣主教角色，執意識形態牛耳（他寫關於異

秋



一旦

此刻，我坐在窗前給你寫信。窗外，一株印第安那州的松樹，橫斜著的枝幹，佔去了大半個空間。在枝極間翻飛跳躍的小鳥，不斷地啾啾。極目望去，在這藍天的盡頭，太平洋的海水，洶湧澎湃的浪濤，正一層層地激蕩在我的心頭。按時差算來，萬里之外，此刻也許正是你熬夜工作的時候。那透過紗窗散發出來的柔綠燈光，那投射在窗前美麗而熟悉的情影，那整潔而靜謐的房間裏飄送出來的海棠花的幽香，那一疊疊學生作業和教學筆記上留下的一行行端莊秀麗的字跡。這一切美好的記憶，都使我彷彿又置身在你的身旁。

啊，那是一個多麼美好而令人難忘的時辰！在一個春寒料峭的早晨，你冒著車窗外簌簌飄落的細雨，不辭三、四個小時山區公路的顛簸，來到我下放的村子。你說你是為送大姐回四川去而來的。然而我們心裏都明白，你正是為了一償十多年前的宿願，專程來看望我的。站在車站的木柵後面，我們揮動著手臂，望著車窗裏的大姐，坐著輻輳遠去的火車在我

化和人道主義的總結文章並非偶然。）這本毛信選集正是他反污染炙手可熱時的作品（他無疑是最高審編者）。一個可能的推測是，他以為毛這個偶像中共是不可能打碎的，若果，這將是他作為毛身邊二十年親信的最大的政治資本。如果鄧力群是反污染的前台主將，那麼支持他的後台，首先就可能是胡喬木，而胡耀邦

們面前消失之後，我們緩緩走向車站外的河灘。雨後初晴，嘉陵江裏漲起了黃色的泥漿，在山峽中吼叫著，奔騰著向西沉去。可能是羞澀，也可能是過度的相思，也可能是二百多公里的乖隔和十多年的離別，使我們感慨萬端，但却又無語相向。在鐵路邊的一條小石坪上，我安放了兩塊平平正正的石頭做為我們的坐椅。我們坐下來，望著眼前滔滔的江水，在雨後的斜陽中泛起點點浪花，匆匆地向前奔馳。我們仍然沉默著，互相傾聽著心的砰砰的跳動。

此時我仍然深深地記得，我望著你的面龐，依然是我記憶中那個美麗的輪廓，然而，那昔日的紅潤，却換上了蒼白；那昔日的白晳，却點上了斑點；那昔日晶亮閃光的眸子，似乎只剩下了深沉。只是你那雙纖細秀美的手，依然像往日我握過的那樣溫柔。從敘述中，我才知道，你已經病休了一年多，目前仍無法上班——呵，一別十多年，儘管我對你是魂思夢索，朝夕懷念，然而，我却無從打聽你的境況，更無法探望你的病體。我多麼為自己的無能和怯懦而感到深切的內疚和悔愧！

夜幕降臨了，遠山消失了。只有百米外的火車站，閃爍著紅紅綠綠的信號燈。周圍沉浸在廣袤的動盪中。我們回憶起二十多年前勞燕分飛，人各東西的離別，回憶起十多年前一次難得的會晤。我歎息著，你的影子像天邊的流星，曳下了一道絢爛的光影，然後就長時期地

的非毛傾向便自然成了胡喬木的對立面。在傳出項南將取代鄧力群任中宣部長時，我們對二胡之爭是可以拭目以待的。總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毛澤東的態度，相信仍將是中共內部鬥爭的或明或暗的一個焦點。

消逝在無邊的夜空中。你却說，每當夜晚，你都會長時間地凝望著天空中那一顆最璀璨的北辰，用它來寄托對我的懷念。這懷念中，寄寓著多麼深沉的相思和多麼殷切的期望啊！你知道我聽後是多麼的感激和欣喜——因為，你過去總是絮叨著對我說：「你有卓越的才華，你應當煥發出奇異的光彩」。

然後，我們回憶著從童年到青年時期八年的同學生涯，回憶著兒時，你塗著粉紅的臉蛋，穿著綠色的綢裙，娉娉嫋嫋，登台表演的情景；回憶著中學時期我們同台演出，巧扮父女的笑劇；回憶著我們坐在同一間教室裏的前後座位上，無休無止的交談，海濤天空的議論；回憶著同學們對我們的戲謔，回憶著蓮花池畔的倒影，北城牆頭的幽會，菜花田邊的漫步，和梁山山頂的登臨。講到這些，你說，這麼多年來，你在夢裏，還常常盤桓在這些山坳，在尋找失去的踪跡。而我也述說我常常遇見的夢境：在我們經常出沒的中學巷子裏，我不斷地徘徊著，趨趨著，只聽見你在圍牆內說話的聲音，却總是沒有勇氣推門進去看看你。我向你背誦了一首抄寫在你臨別贈我的照片背面的普希金的詩：

我曾經愛過你，
愛情在我的心裏，
也許還沒有完全熄滅。
但是，讓它不要再驚動你吧，

我不願再使你受到絲毫的憂傷。
我愛你愛得這樣真誠，這樣溫柔，
我希望別人也這樣愛你。

同時，我又背誦了一首題寫在你僅有的一幅彩色照片後面的，我的一首七律：

憶昔荳蔻花開日，青梅竹馬度春時。
三秋風月酬佳會，幾樹桃李證幽期。
一池碧波映倩影，萬家燈火照雙眉。
最是留連意返處，城北山南賦盟詩。

夜深了，我送你住進火車站附近的一間旅館，然後回到公社機關我的房間內。我久久不能成眠，於是，把當天的情景和感受凝成了這樣一首詞：

蘭陵王 春雨

春雨徐，柔條絲絲如縷。

青山外，盈盈雷聲，

正送來飛鴻輕鷺，

任山重水復，怎禁秋江漲綠。

心潮急，傳芭擊鼓，

爭迎你巫山神女。

縹渺去何處？

尋尋復覓覓，朝朝暮暮，

韶華再再隨伊去。

將千種風情，萬般相思，

都付與一江紅雨。

『錦瑟』可證否？

柳絮，伴笑語。

又風中比翼，江畔漫步，

彷彿青青年少路。

是來世重逢，夢裏相遇？

一撮輕煙。明月夜，又踽踽。

第二天清早，我站在嘉陵江橋頭上，迎接你到公社看我。你體諒到我負擔重，生活有困難，把五十元鈔票塞在我的抽屜裏，匆匆地洗

了臉就去趕車了。我含著滿眶的眼淚，急忙寫了這首詞作為回報，然後送你去搭當天的早車。我抹著模糊的淚花，望著你在車窗裏向我招手。我悵悵地望著汽車，緩緩地馳過一個弧形的大彎，爬上橋頭。我恨不能用我的眼睛，迫使它停在路上，不要離去。然而，這是徒然的幻想。載你的汽車已經消逝在來往奔馳的車群之中了。

歲月不居，時序如流。這一天離現在又是九個年頭過去了。從這一次所開始的我們之間又一次的邂逅，為我們的生命又增添了奇異的光彩，留下了更為難忘的記憶。讓我們共同珍惜這人類生活中最美的花朵，共同創造人類美好的未來吧！

緊緊地握手！

清明節于舊金山



小艇贊

區叔元 攝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地址：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寄上 _____ 幣 _____ 元，訂閱由 _____ 年 _____ 月（總 _____ 期）開始

北美地區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請 寄：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New York, N. Y. 10185

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 Bookstore

請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
好望角大廈21字樓3E2室

訂費 (每年)

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區 (港、澳地區)

機關：60 美元 200 港元

普通：18 美元 72 港元

學生：14 美元 60 港元

訂戶 贊助 200 美元或港澳地區 500 港

元以上之訂戶為永久訂戶

除北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區，另
加郵資：

航空：10 美元

平郵：5 美元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於全球

港澳聯絡站：

1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 1 2 號
好望角大廈2 1 樓3 E 2 室
電話：3 - 3 1 8 3 8 7

Hong Kong
Rm. 3E2 Goodhope Bldg. 21 FL.
612 Nathan Blvd.
Kowloon, Hong Kong

2 香港九龍尖沙嘴郵政信箱9 0 7 7 8 號

日本聯絡站：

日本國橫濱市鶴見區鶴見郵便局
私書箱5 2 號
Japan

澳大利亞聯絡站：

Australia
G.P.O.Box 376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歐洲巴黎聯絡站：

France
B.P. 84
75623 Paris, Cedex 13 France

歐洲西德聯絡站：

Germany
Gleiwitzer Str. 9
4800 Bielefeld 1 West Germany

歐洲荷蘭聯絡站：

Holland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el 020 999037

歐洲比利時聯絡站：

Belgium
P.B. 246
5000 Namur Belgium

非洲毛里求斯聯絡站：

已成立，聯絡暫經總部

加拿大蒙特利爾聯絡站：

Montreal, Canada
P.O.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P.Q. Canada H3B 3K3

加拿大多倫多聯絡站：

Toronto, Canada
P.O.Box 23 station G
Toronto, Ont. Canada M4M 3E8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Vancouver, Canada
P.O.Box 1259 Station A
701 West Hastings Vancouver B.C.
Canada V6C 2T1

美國紐約聯絡站：

New York, U.S.A.
39 Bowery Box 441
New York, NY 10002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San Francisco, U.S.A.
1827 Haight St. Box 100
San Francisco, CA 94117
Tel. (415) 751-7094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Los Angeles, U.S.A.
P.O.Box 17113 L.A., CA 90017
Tel: (213) 388-9707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Washington D.C., U.S.A.
P.O.Box 33306 Washington D.C.20033

美國休斯敦聯絡站：

Houston, U.S.A.
P.O.Box 42821, No. 806
Houston, TX 77042 Tel: (713) 879-7107

美國亞利桑那州暨圖桑聯絡站：

Tucson, U.S.A.
P.O.Box 42561 Sun Station
Tucson, AZ 85733
P.O.Box

美國匹茲堡聯絡站：

Pittsburgh, U.S.A.
P.O.Box 7122 Pittsburgh, PA 15213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站：

New Jersey, U.S.A.
P.O.Box 1679 New Brunswick, NJ 08903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Chicago, U.S.A.
P.O.Box 16061 Chicago, IL 60616-0061

美國波士頓聯絡站：

Boston, U.S.A.
P.O.Box 1136 Brookline, MA 02146

總部聯絡信箱：

Head Office
P.O.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Tel: (212) 429-6777

中國要民主！要法治！要自由！要人權！

中國民聯及中國之春簡介

- 中國之春是中國大陸留學生於 1982年 11月創辦的第一份民主運動刊物。
- 中國之春是北京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延續和發展。
- 中國民聯是 1983年底，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基礎上組建的海內外聯合運作的民主團體。其主體為中國大陸留學生。
- 中國民聯成立後，中國之春為其機關刊物。
- 中國之春和中國民聯的宗旨是變革中國專制制度，爭取中國大陸的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
- 中國民聯遍於海內外，遍於全世界，獲得了廣大留學生和海內外同胞的同情和支持。在國內，中國民聯已在各大城市建立了支部或聯絡網點；在海外，聯絡站遍於五大洲。

中國向民主制度轉變的大變革時代已經來臨！
歡迎您參加到這一歷史洪流中來！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中國民聯）機關刊物中國之春月刊（中文版）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通訊處：(美 國) P.O.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香 港) 中國之春書屋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
好望角大廈21字樓3E2室

■電 話：(美 國) (212)728-7008
(212)507-6442

(香 港) 3-318387

■定 價：(美) 1.50美元 (加) 2.00加幣
(香港) 6.00港幣

≡ BULK RATE ≡
≡ U.S. POSTAGE ≡
≡ PAID ≡
≡ FLUSHING, N.Y. ≡
≡ PERMIT NO. 355 ≡

ISSN 0735-8237

Lee, T.P.
Parkview Tower 1109
701 West Gate Ave.
St. Louis, MO 63130